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卷首语

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宣告了中华民族必将获得历史性新生，也宣告了中华文化发展新篇章的开启。在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文化蓝图：“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在构筑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智慧等方面不懈努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新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保证，更是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力量和智慧之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领导全国人民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从先进性、人民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等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深刻阐述，回答了为什么开展文化强国建设、建设怎样的文化强国以及如何开展文化强国建设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扎实推进地域文化建设，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点。经过十四年的探索和努力，《安康文化》已经成为陕南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阵地，在安康乃至省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语境中，《安康文化》将更自觉地扎根地域文化沃土，进一步增强服务地域文化建设的能力，努力为传播陕南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凝聚陕南文化发展共识做出新的贡献！

安康文化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办
安 康 学 院

刊名题写：萧云儒

《安康文化》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东红

副 主 任：戴承元 柯晓明

委 员：(按姓名音序排列)

蔡晓林 戴承元

柯晓明 鲁延安

刘继鹏 刘 强

向纪明 杨明贵

杨运庚 张永强

主 编：戴承元 柯晓明

副 主 编：蔡晓林 杨运庚

杨明贵

陕南文博主编：施昌成

编辑部主任：薛正华

编辑部副主任：杨海蓉

编 辑：李百富 张 霞

胡 阳 郭华芳

张 君 沙忠平

段延辉 何 花

美术编辑：邢中桂

排版、设计：李 静

出 品：《安康文化》编辑部

联系人：杨明贵

电 话：0915-3291018

0915-3261975

地 址：安康学院图书馆六楼东

E-mail: akwh4296@163.com

安康地情网: www.aksdq.cn

印 数：2000册

印 刷：安康文化印务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赠阅范围：安康市内党政机关、
省内外文化教育界

2019年第3期（总第55期）

富硒文化

安康秦汉古茶——走向世界的友谊之茶 鲁 琦 4

陕西汉阳陵出土茶叶的产地探讨 程良斌 5

汉阳陵茶叶产自安康 陈晓虎 李兆鹏 8

安康秦汉古茶诞生记 李兆鹏 11

茶与丝绸之路 丁 文 14

文化论坛

写字与书法

——兼议刘暘光的代表作 潘鸿宾 18

论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思想内核 杨明贵 22

汉中家谱、家训二题 冯岁平 27

“三沈”家训研究——以诗文、书信为中心 谭诗民 31

传统家规家训中的廉洁思想 王丽芳 42

民间文化

“紫阳民歌文化生态及功能研究”研究报告（上） 戴承元 46

石泉“二流子席” 洪 军 61

乡村记忆

任水情 张戏全 63

滨江长廊走来回 刘全军 64

舌尖上的陕南味道 巫其祥 66

镇坪的季节 胡裕成 69

文化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谁立言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回应人民关切、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价值的标准所在。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理论研究、社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做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学问，及时把握和反映群众心声，努力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灵魂工程师。当前要特别重视改进文风。理论要掌握群众，首先要能让群众看得懂、听得进。理论文章当然要有学理支撑，要用学术话语，但如果让群众无法理解，理论便没有生命力、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善于用生动的表达方式、鲜活的群众语言，阐明深邃的思想，揭示深刻的道理。

——彭菊花《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培根铸魂的作用》，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9月9日 第5版

《安康文化》目录

细雨霏霏上茶山 黄平安 71

陕南文博

安康沿革史话 方琛 72

金州人行古道及变迁 董自常 80

超然物外德如山 积利於民善成林
——观“藏一角”有感 牛谦才 84

从茶马古道上走出的紫阳先民 周平松 85

文化长廊

我替母亲上三线 李春芳 89

思想让文字熠熠生辉 钟长江 92

肩挑的岁月 惠军明 97

方志编修

浅谈二轮志书章节分类的精准
——以《岐山县志（1990—2010）》谣谚内容为例
陈平军 99

直笔著史续文脉 修志问道启未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安康市地方志
成果综述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101

文化信息

1、赵俊民调研中心城区图书馆规划建设（13）；2、安康市着力打造“乡村文化理事会暨乡贤读书会”特色文化服务品牌（45）；3、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开展安康民间丧葬习俗调研（68）



安康秦汉古茶——走向世界的友谊之茶

□ 鲁 琦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5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致贺信中指出，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希望你们弘扬中国茶文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交流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推进世界茶业发展，谱写茶产业和茶文化发展新篇章。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我市充分利用陕西省汉景帝阳陵考古发掘出土的2150年前“世界最早的茶”，积极同陕西省文物局开展合作，努力让文物资源“活”起来古为今用。通过及时组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和文化专家全面研究，形成了汉阳陵出土的“世界最早的茶”产自安康的共识。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物资源与产业结合、巩固提升中国茶文化地位、促进茶产业全面发展，我们委托中国茶叶研究所组建科研团队，围绕恢复创新“世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茶”开展深入研究。专家们秉承尊重历史、讲好故事、做好产品，坚持在继承中弘扬、在弘扬中恢

复、在恢复中创新的理念，在充分吸收借鉴传统红茶、黑茶和白茶技术工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安康秦汉古茶产品技术路线，成为新时代茶饮产品复古、创新、时尚的典范。

2018年11月5日，世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茶恢复创新科研成果成功发布，标志着该产品正式投放市场。安康秦汉古茶的诞生，将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茶之路焕发生机活力新的“友谊茶”，是开启文化与产业结合、促进世界茶文化产业再次飞跃的“文物茶”，是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茶”，也是普惠世界饮茶人群修身养性、实现天然补硒的“健康茶”。

我们要切实利用好“安康秦汉古茶”这项恢复创新科研成果，充分挖掘世界最早的茶文化与品牌价值，讲好秦汉古茶故事、落实好“五个一”工程，建好秦汉古茶基地、振兴美丽乡村，做好秦汉古茶产品、成为世界最好的茶，唱响秦汉古茶品牌、打造全国知名品牌，让安康秦汉古茶真正成为丝路瑰宝、世界之茶！

（作者单位：安康市人民政府）

陕西汉阳陵出土茶叶的产地探讨

□ 程良斌

2016年5月6日，汉阳陵出土的茶叶正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茶叶，现已在汉阳陵博物馆展出。这项研究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委托中国科学院进行出土物分析鉴定的，结果发表在英国《自然》周刊下属的开放网络科学杂志科学报告》上。研究人员利用质谱分析法，对一个木盒中的有机质遗存表面绒毛间的微小晶体进行研究，发现这些有机质遗存是茶叶，全由茶芽制成。伦敦大学学院中国文物和考古学国际中心主任多里安·富勒教授说：“这项发现表明，现代科学能够揭示以前不知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细节。在这位皇帝的墓葬群中发现茶叶一事让我们难得一窥非常古老的传统，使我们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科学证据显示，早在2150年前，中国古代皇室成员就喜好茶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永赢认为：这些都是芽茶，这一发现至少证明了汉代前期，茶叶已经出现在宫廷的饮食中，这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的茶叶标本。那么，汉阳陵出土的茶叶产于何处？

一、最早的文献记载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距今三千

多年前的公元前1135年，周武王联合当时居于巴地的庸、蜀、羌、牙、微、卢、彭、濮等民族共同伐纣，之后巴蜀所产之茶列为贡品。

巴国是我国最早栽培茶树、最早生产贡茶的地方。《华阳国志·巴志》原文如下：“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腹（今重庆奉节），西至棘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今彭水）。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苧、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园有芳、香茗。”巴国在今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一带。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水中上游为汉中郡辖区，在今安康汉江北岸（原中渡台）设西城县。汉承秦制，在安康设汉中郡治，西城治所西城阁已在今安康江北恢复建成。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立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①。从此汉中治所西迁南郑。

我国最早栽培茶树、最早生产贡茶的巴

安康文化 2019.3

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终止于公元前316年的战国中期，约有800年历史。巴国在陕西南部汉阴、安康一带活动，史称“此时巴子国都城已迁汉阴一带”^②。“巴族大部分唐虞时由汉中北迁时，部分仍留居在安康一带，时称鱼邑。巴子国封立，安康巴人归之”“巴国在今陕西汉阴至安康一带”“巴的东南是楚国”“巴国位于麇国之西”^③“周灭殷后，武王封巴国于今陕西汉阴县地，并封周宗室贵族去统治，赐爵为子，称巴子国”^④。据上世纪考古专家考证，汉阴城西沿的李家台古城镇遗址，很可能是巴子国都城遗址。古安阳县故城在汉阴汉江北岸阮家坝，古安康县故城先在今汉阴阮家坝，后在汉江南岸今汉阳坪，古汉阴故城也在今汉阳坪，今石泉县城则是东晋时晋昌郡及长乐县故城、北魏时的永寿县故城，今紫阳（古属汉阴）汉王城为昔日的汉阳故城，今紫阳白马石为昔日的宁都故城，从李家台古城镇遗址中发现有绳纹瓦、灰陶残片、细泥红陶、夹沙灰陶残片、红烧土块等，这些明显带有周代标记。西周巴子国是受封小国，城池不大，李家台古城镇遗址正符合这一特点^⑤。后来，巴国为秦国所灭，巴王被虏。

从考古发现看，在汉水上游地区的城固、勉县、安康等地都发现有巴文物。最有价值的是1986年安康市汉滨区王家坝商周遗址发现的史密簋，簋底铸铭文记载了在周王朝担任“师”之职的巴人师俗和在周王朝担任“史”职的史密，率领族人东征，受周王嘉奖的史实。

1973年汉中市勉县茶店子出土的“巴式铜矛”是巴族龙支系在这一带活动的佐证。

1974年安康月河北部出土虎妞镞于及巴式剑、戈、矛及青铜乐器，也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

巴国在今汉阴建都，西迁前以安康为中

心的古汉中，是古代巴人的活动中心，是我国最早生产贡茶的地方，是我国最古老的茶区。古代巴人的活动中心的史料证实，汉阳陵出土的茶叶产地应是我国最早生产贡茶的巴国，即今汉水中上游及其支流的大巴山区。

二、从贡茶芽的历史分析

唐代王室崇尚饮茶，贞元十七年（801）《通典》载：安康郡贡茶芽一斤。唐代茶区分布已十分广阔，有80多个州产茶，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14个省区。各地茶叶名品150多个，十分重视贡茶生产，其中特别点出陕西有金州茶芽、梁州茶及西乡月团3个名品。金州茶芽应是汉阳陵出土的茶芽的传统产品。

民国《紫阳县志》有“每岁充贡”“茶之原质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的记载。陕西省档案馆存有《贡茶事案》信票国家一级文物，清光绪三年（1877）正月，紫阳县知县唐清辅差遣衙役办理的《贡茶事案》信票，上书：“照上届贡茶数目严催采办，务于二月内申解”。信票还写明在紫阳境内麻柳坝、毛坝关、杈河及盘厢河等地采办春茶的具体数目。上述历代贡茶均为汉阳陵出土一样的茶芽。

“雨前一样是新茶，坡有阴阳性各差。齐焙白毫先人贡，香风吹出野人家”。这是清代紫阳县令江开的《紫阳竹枝词》，是安康历史上贡茶生产的生动写照。“齐焙白毫先人贡”这诗句点出入贡之茶，必是与汉阳陵出土的茶芽同样嫩度的茶芽。安康茶唐朝以前称巴蜀茶，早在公元前的周朝就是巴国贡品，唐代称山南茶，以金州茶芽作为贡品，清代统称紫阳茶，紫阳毛尖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紫阳毛尖应是汉阳陵出土茶芽、巴国贡茶、金州茶芽的传承产品。

三、据《陕西省茶叶区划》分析

陕西省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区域在哪里?据《陕西省茶叶区划》分析,茶树种植的北界在秦岭南麓800m一线。而最适宜区域在安康境内汉水、月河以南、巴山900m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带,由于有秦岭、凤凰山双重庇护,阻挡北方干冷气流的入侵,西部有1905m高的星子山挡住西来的寒流,南部大巴山缺口又能充分接纳南方湿热空气长驱直入,从而形成陕西省内农作物越冬条件最好,水热条件匹配最佳的亚热带作物生长区域,以紫阳、岚皋为例,其主要气象因子见表1。

表1 茶区气象因子表

县名	极端最低气温(℃)	≥10℃积温(℃)	年平均气温(℃)	最冷月(℃)	年降水(毫米)
紫阳	-7.6	4691.8	15.1	3.7	1127.8
岚皋	-8.4	4731.8	15	3.3	1004.1

安康市内极端最低气温比东部同纬度地区的江淮平原(蚌埠、合肥、南京)高6~12℃,比邻近的江汉平原(武汉、荆州)高7~9℃,比沿海的(沪、杭)也高1~2℃,比同纬度东部的信阳茶区(-19℃)、皖西的大别山茶区(-20℃)越冬条件显著优越。雨量分布也极有利茶树生长,冬季偏少,茶树生长季节雨量充沛,水热同季,≥10℃初日出现在3月下旬,4月份雨量开始激增为96.6毫米,5~10月份为118.6~196.5毫米,其气候相当于自西部内陆向东部沿海移动了1000公里,或向南偏了600公里^⑥。

四、根据品种资源推测

1981~1983年,省农业局经济作物处主持,开展了陕西省茶树品种资源调查,报告认为国内外罕见的紫阳无花茶,是生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材料。发现于紫阳县红椿区深阳乡平安村,保存在紫阳茶叶研究所的稀有

单株,不开花、不结实,不同于国内开花不结实的无性系品种。叶长12.8厘米,叶宽7.1厘米,叶面隆起,叶形为大卵圆叶形,命名为“紫阳一号”,是极其宝贵的品种资源^⑦。无花茶“紫阳一号”芽大、叶大、起泡,泡也大,叶片解剖构造栅状组织只有一层且松散,这是茶区古老的活化石,也可看出大叶种古茶树退化的表现。历史上紫阳老茶区有搭梯采茶的史实,至今紫阳、汉滨瀛湖仍有古老大茶树分布的痕迹,尤其是岚皋蔺河镇茶园村古茶树群是全国推广良种紫阳种中的原生态天然林下野生的紫阳大叶泡和紫阳楮叶种,是十分珍贵的资源^⑧。古茶区、古茶树,证实这里是古巴蜀茶区的中心地带。

五、建议

本文论证的巴国贡茶中心地带,是陕西省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区域,同时也是我国少有的富硒区,特建议测一下汉阳陵出土的茶叶的含硒量。如果是富硒茶,那就更确信无疑了!

注释:

- ①《史记·高祖本纪》
- ②何光岳《南蛮源流史》,《中华民族源流史》系列丛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
- ③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史学家杨东晨《陕西古代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 ④汉中市政府门户网站,2010年4月4日《陕南开发》
- ⑤李家成:专家学者论西周在汉阴立巴子国
- ⑥吕从中《岚皋—紫阳和洛川原两个农业气候优势的发现及其开发利用的措施建议》,陕西省气象区划
- ⑦程良斌《紫阳富硒茶研究与开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⑧岚皋县林下原生态野生古茶树资源调查初报,程良斌、谢利华等,《茶业通报》2015.01
(原文刊载于《安康发展》)

汉阳陵茶叶产自安康

□陈晓虎 李兆鹏

安康文化
2019.3

安康市位于陕西省南部，是全省重要产茶区，全市辖9县1区，其中9县区产茶；先后选育出紫阳群体种和陕茶1号两个国家级良种；国家认定“安康紫阳富硒茶”“平利绞股蓝”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安康自古就是贡茶之地。据史料记载安康产茶始于西周，盛于唐宋，名扬古今，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特别是2005年汉阳陵15号外藏坑考古发掘的距今2150年古茶，进一步印证了陕茶历史地位和安康贡茶之源。笔者从安康发展历史溯源提出汉阳陵古茶产自安康，愿同大家商榷。

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唐代茶圣陆羽《茶经》“六之饮”中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的记载，说明我国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把茶用作解毒之用。

一、安康古为巴国之地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史学家杨东晨在《陕西古代史》一书中说：“巴族大部分唐虞时由汉中北迁时，部分仍留居在安康一带。巴子国封立，安康巴人归之”。“巴国在今陕西汉阴至安康一带”，“巴的东南是楚国”、“巴国位于麇国（今湖北郧县、郧西

县、白河县一带）之西”。杨东晨先生在《论夏商周三代陕南的族国及其文化》一文中肯定地说：“周灭殷后，武王封巴国于今陕西汉阴县地，并封周宗室贵族去统治，赐爵为‘子’，称巴子国，占据安康及四川东部一部分土地。”

汉中市政府门户网站《陕南开发》一文中，追忆陕南历史说：“周灭殷后，武王封巴国于今陕西汉阴县地，并封周宗室贵族去统治，赐爵为‘子’，称巴子国”。国家级史学大家、中华民族源流史系列丛书作者何光岳先生在《南蛮源流史》一书中明确地说：“此时巴子国都城已迁汉阴一带”。

汉阴在1981年考古发现的城西北沿、位于月河与观音河交汇处的李家台古城镇遗址，出土的文物具有明显的西周时代特征。

最有价值的巴文物是1986年安康市汉滨区王家坝商周遗址发现的史密簋，簋底铸铭文记载了在周王朝担任“师”之职的巴人师俗和在周王朝担任“史”职的史密，率领族人东征，受周王嘉奖的史实。

1974年安康月河北部出土虎妞镞于及巴式剑、戈、矛及青铜乐器，也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中国名茶志·陕西卷》）

安康市境内出土的巴人代表性文物还

有：三皇时期的陶塑巴蛇，五帝时期“巴人淫祀柁柱”的夹沙红陶人面塑像，夏代巴式玉斧，商代最早进入“以人为本”的蛇巴濮人族人面纹青铜钺，呈现巴人图语“花蒂手”纹饰的西周时期青铜矛，体现“巴人以比翼鸟”的春秋时期双鸟纹青铜釜，显示巴人独特文化的战国时期巴人文字铭文青铜戈，象征巴国王权的战国时期巴王镀铬、镀碧宝剑等；单表虎巴遗物就有殷商时期的虎纹空首青铜钺，

西周时期的《史密簋》铭文“卢、虎会”，战国时期的虎钮罍于、虎纹戈、虎形提梁等，确证了文献记载的“虎之首帅在西城”。罍于，它是古代巴人的典型乐器，而安康出土的西周时期巴国罍于，钮为虎头，是稀世之宝。巴人的典型武器是“巴式短剑”，长约五六十厘米。虽然川渝湘鄂出土有巴式剑，但与安康出土的巴式剑比起来相对档次较低。安康有一巴式剑柄镶有红宝石和玉，而其他剑无。因此，史料和史证表明：安康是巴人的源流，其他均是巴人的分流，其他区域是先有汉水巴文化的影响后才有自己的文化定位。

二、陕西南部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安康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先生在《陆羽与荆巴茶文化圈》（刘勤晋主编《茶·茶文化·旅游》，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2004年《饮食文化研究》第2期）两篇论文中，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结合考古研究的成果，说明生活在陕南、鄂西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懂得种茶、用茶的民族，他们为中国茶业的发展有筌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生活在荆巴茶文化圈的古代巴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至少有两个支系：一是原居“湖北清江流域”的巴人。主要分布在今川

东、鄂西一带，廩君为著名首领。因以前居湖北长阳西北，后向川东扩展。二是陕西南部的巴人。据《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路史·国名纪甲》等著作综合分析，可以确认古巴国在夏代（前2070—前1600）之前就已在汉水流域立国。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为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由此可见，参与武王伐纣的是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巴人（巴师勇锐），而不是清江或川东的巴人。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最初承担向西周（前1046—前771）王室敬贡义务的是陕南的巴人而不是“清江的巴人”。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复（今四川奉节），西至夔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四川黔江及贵州道真、务川等）。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茹，园有芳蕝、香茗。巴族在西周初年成了宗周的封国，既然是封国及应当履行封国的义务：所以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物资，作为贡品敬献朝廷。因此，安康是最早敬献朝廷贡茶的地方。

三、安康千年鎏金铜蚕和汉景帝时代的历史巧合，进一步表明汉代安康农事活动的兴旺发达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很早就有关于金蚕的记载，比如晋代陆翊的《邕中记》就曾提到，在春秋霸主齐桓公墓中发现“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不可胜数”。这只汉代鎏金铜蚕的出土，不仅让这段文字历史记述得到了实物佐证，而且是汉景帝创造“文景之治”时代的有力印证。汉景帝即位后，他

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他恩威并施，还多次颁诏法律，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汉景帝创造的“文景之治”带来的社会繁荣，为张骞（前164年—前114年）出使西域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开辟了中国古丝茶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由此可以推断，安康在“文景之治”时期的蚕桑、茶叶等农事活动高度兴旺发达，汉景帝随葬茶叶来自安康并不是历史巧合，而是当时茶叶发展兴盛的重要标志。

四、安康茶叶发展的辉煌历史进一步印证了汉景帝墓葬外随葬品来自于安康

唐代陆羽《茶经》对山南茶区划分涵盖《茶经》：“八之出”记载茶叶的第一产地是山南，包括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六州。并详细记述：“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即今汉滨、岚皋、紫阳、汉阴、石泉沿汉江两岸山谷。《新唐书·地理志》载：“金州汉阴郡（包括除白河县外的今安康市各县区）……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麝香……”，朝廷将安康茶列为仅次于麸金（沙金）的第二位贡品。安康市各县已挖掘发现了隋唐及宋代的茶具，如汉滨区出土的隋代瓷水注，平利县西河乡出土的唐代青瓷茶水注。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周靖文的《宋代

的茶叶产区》一文写道：秦岭以南包括陕南在内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总产量的30%。宋熙宁七年（1074）实行“茶马法”，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旬阳县1981年在棕溪出土宋代“斗茶用具”釉油滴茶盏，这些出土文物是古金州茶事活跃的佐证。

清代，紫阳毛尖已成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清光绪三年的安康紫阳茶《贡茶事案》信票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陈椽《紫阳茶业志》）民国县志载：“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自古留下“谁语陕域无好茶，唐次纲贡紫阳芽”的诗句，兴安（今安康）知府叶世卓留下了“自昔岭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的千古佳句。

新中国成立后，安康紫阳富硒茶被农牧渔业部确定为全国44种名茶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开发出“紫阳毛尖”“八仙云雾”“龙安碧璇”“白河春燕”等多支名茶，曾占据西北市场的“陕青茶”，原产地在安康。特别是1990年安康紫阳富硒茶成为世界上首个通过专家科学鉴定的天然富硒茶；习仲勋同志赞誉“健康佳品，驰誉神州”，著名营养学家、陈云夫人于若木同志称赞“国饮新秀天然富硒紫阳茶”。

古代紫阳茶是今天安康茶区和汉中西乡、镇巴茶区的总称。因此，安康从古至今就是出好茶、出名茶的地方，只是随着宋代古代建都的迁移和近现代交通、人文、科教和经济的变迁，导致安康茶没有列入全国十大名茶之列，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安康茶的历史地位和从发展历史溯源汉阳陵茶叶产自安康的史实。

（原文刊载于《安康发展》）

（作者单位：安康市林业局）

安康秦汉古茶诞生记

□ 李兆鹏

从一则新闻嗅到的机遇

2015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专家吕厚远先生等，利用植物微体化石和生物标志物方法，对汉景帝阳陵第15号外藏坑发掘出土的不明植物遗存标本作进一步研究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植物标本为古代茶叶，几乎全部由茶芽制成，品质很高。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自然》周刊下属的开放网络科学杂志《科学报告》上，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可，充分印证了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中华区总裁罗文为其颁发了“世界最早的茶”认定证书。2016年1月13日，新华社西安分社、中国新闻网和华商报分别以《汉景帝阳陵的外藏坑随葬品中发现迄今最古老茶》《中国科学家发现最古老茶叶及1800年前的“丝路分支”》和《中国专家确认汉阳陵现中国最早茶叶：由茶芽制成》等为题进行同时报道。这条消息引起了安康市人民政府分管农业副市长鲁琦同志的高度关注，他指示安康茶叶专家要积极开展研究，考察论证这个世界最早的茶叶历史根脉和文化价值，思考如何利用这个宝贵文物资源助推安康富硒茶产业发展。

从地下文物到活宝贝的蜕变

经过前期多次反复论证、谋划、沟通和协调，转眼间就到2017年，7月4日安康市政府副市长鲁琦、孙矿玲带领市林业局、市文广局、市农业局等部门负责人到省文物局座谈协商共同开发秦汉古茶、共建丝路茶乡合作事宜，时任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及有关处室和汉阳陵博物院、汉晖公司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鲁琦同志提出：希望利用“鎏金铜蚕”和“世界最早的茶”这两件古“丝绸之路”上的珍贵文物资源，与省文物局开展全面深入合作，促进安康茶和蚕桑丝绸产业发展，提升安康乃至全省茶叶丝绸文化品牌效应和整体竞争力，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大战略。赵荣同志随即表示，安康茶历史底蕴深厚，近年来产业发展迅猛，省文物局将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大力实施文化创新，将文化和产业紧紧结合起来，把文化做活、把产业做强；将全力以赴与安康市政府开展合作，尽快签订双方合作框架协议，深入务实推进联合开发，为实现文化引领、产业带动，助力脱贫攻坚做出贡献，这次座谈会正式开启秦汉古茶合作发展新征程。决策明确方向，创新决定出路，共识凝

聚力量。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市长赵俊民主持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秦汉古茶开发利用工作，省、市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秦汉古茶合作事项落实、签订合作协议，成立股份制公司、开展产品恢复创新科技研究。

汲取古人智慧恢复创新产品

从汉景帝到现在已经过去 2175 年，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早已让生活中的一切物是人非，古人究竟如何喝茶？谁能够承担秦汉古茶恢复创新工作？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副市长鲁琦多次深入开展调研和分析论证，经过多方面沟通协调决定聘请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承担安康秦汉古茶恢复创新工作。中国茶研所承担任务后立即组建由茶学、茶叶加工、茶叶质量控制和文化文物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国顶尖研究团队，对汉阳陵出土茶叶实物的时代背景、

历史价值、文化内涵、饮茶习俗和茶叶种类、茶叶来源、茶叶嫩度、制茶工艺、保存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对安康茶树品种结构、产地环境、质量品质和产品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制定了安康秦汉古茶恢复创新研究技术方案。研究队秉承尊重历史、做好产品，坚持在恢复和继承中弘扬、在科技创新中发展的理念，采用安康市茶区生产的茶叶鲜叶为原料，充分借鉴绿茶、白茶、黑茶等传统茶类技术工艺，形成了秦汉古茶独特的制茶工艺和技术路线。

从专家品鉴到成果发布的提升

2018 年 5 月 17 日，安康市人民政府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博会开幕之际，举办了“世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茶产品研发座谈会”。来自全国茶届、考古和历史文化届专家们从各自研究领域，根据人类活动变迁、史料记载、朝代更迭、古代风俗和茶叶

生产环境等不同角度探讨古代产茶、用茶起源？汉阳陵出土的古茶叶来自哪里？如何开发利用等等，专家们谈论今、引经据典给出了答案——汉阳陵出土的“世界最早的茶”源自陕西、产自安康，为大家现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参加会议的茶届方面的专家还对试制成功的安康秦汉古茶进行了品鉴，对如何改进和提高产品工艺，以及如何利用好汉阳陵出土的“世界最早的茶”这个文物资源、开发出具有秦汉古韵味的好茶提出了宝贵意见。

中国茶研所研究团队在充分吸收杭州“世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茶产品研发座谈会”成果和专家建议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完善、改进工艺，形成安康秦汉古茶定型产品。安康市人民政府于 11 月 5 日利用 2018 第二十五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邀请全国知名茶学专家和历史文化专家在汉阳陵博物院对“世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茶恢复创新产品”进行了评审鉴定。专家组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安康秦汉古茶外形扁平端正、松紧适度、黄绿显毫、金银相间；汤色金黄明亮，香气清香带花香，滋味清醇甘甜，叶底嫩匀黄亮；具有“金银相间色、清醇甘甜味”的典型特征，陈宗懋院士赞誉“丝路瑰宝、秦汉古茶”，著名茶学专家段建真现场挥毫留墨“秦汉之地、古茶醇香”。随后，安康市政府同中国农科院和陕西省文物局、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科技厅和省供销社等部门共同主办了“世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茶恢复创新产品科研成果发布会”，新华网现场直播，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华网、新浪、搜狐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参与报道，并得到了茶届高度关注和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这款源自陕西、产自安康、出品平利的安康秦汉古茶的成功问世，对弘扬茶文化、发展茶产业、开

发新产品、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而深远的意义。

从初级产品向知名品牌迈进

安康秦汉古茶产品的问世只是良好的开端，好比是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何茁壮成长？如何长大“成才”？这是安康市政府着眼长远、持之以恒促进全市富硒茶产业发展的目标所在。副市长鲁琦同志在安康秦汉古茶评审会讲话时强调：我们将凝聚全市之力，加大安康秦汉古茶品牌打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古茶小镇建设等推进力度，做大做强安康秦汉古茶，力争成为丝绸之路的璀璨瑰宝，在较短时间内把安康秦汉古茶打造成驰名全国、享誉世界的名茶，一定会让世界上最早的茶真正成为世界上品质最好的茶，成为“一带一路”上新的“友谊茶”，成为弘扬中国茶文化的“文化茶”，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扶

贫茶”，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茶”，成为促进人类健康的富硒“健康茶”！这种立足产业、着眼扶贫、放眼健康，立足产品、着眼品牌、放眼未来，立足陕西、着眼全国、放眼世界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为安康秦汉古茶的发展壮大勾勒出了宏伟蓝图。当前，市茶业办充分发挥产业牵头作用，会同安康秦汉古茶发展有限公司、市林业局、市工商局、市农业局、市文广局和平利县人民政府积极申报“秦汉古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开展安康秦汉古茶品牌策划工作，制定《安康秦汉古茶品牌营销三年行动计划》、《安康秦汉古茶文化研究三年行动计划》，让安康秦汉古茶真正实现从最初的利用文化概念到恢复古茶产品、从生产产品到打造秦汉古茶知名品牌的方向大步迈进。

（原文刊载于《安康发展》）

（作者单位：安康市林业局）

◎文化信息◎

赵俊民调研中心城区图书馆规划建设

7月18日上午，市长赵俊民带领市级相关部门和汉滨区、高新区负责人专题调研城区图书馆规划建设情况。

在安康学院北校区图书馆，校长丁巨涛陪同调研并介绍了学院发展及图书馆建设情况。赵俊民指出，安康学院与安康的发展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校地双方有着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特殊关系，我市一直支持安康学院建设发展，安康学院图书馆不仅要服务好学院师生，还要更多地惠及安康市民；希望安康学院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公共服务职能，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加快高校图书馆市民化，让高校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更多地服务地方群众。

赵俊民还走访了兴安西路、兴安门、龙舟文化园、安康高新区四处24小时图书馆，亲身体验并详细了解了图书馆运转情况。他强调，建设24小时图书馆是我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对打造书香安康、彰显文化气质、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市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市区两级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主动适应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因地制宜规划，加快建设好24小时图书馆，补充图书馆容量不足，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要。要进一步彰显人性化、富有特色化、提升便捷度，方便市民就近阅读，积极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张骞）

茶与丝绸之路

□丁文

安康文化 2019.3

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条横贯欧亚的大路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因此被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但据唐朝经济状态分析，华方丝路贸易应当是丝绸、瓷器、茶叶三位一体。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云：“蕃客、胡贾，及阿拉伯、波斯等处来华的外商，他们主要贩运各地珍宝……非中国所产的东西来华，把中国的金、银……茶、瓷器、纸笔、药品等运回各地；同时唐政府对他们只征很轻的关税，甚至连关税也免除，并得在中国买田宅。”唐政府大力扶持外贸事业，优待外商，这也有利于茶叶的出口。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征收茶税，当年始收入40万贯，当时的税率是“什一之税”，茶叶总价值当约400万贯。茶价平均每斤50文计算，加上不征税的贡茶、礼品茶、自饮茶，以及逃税的走私茶，粗略估计全国茶叶总产量在80万担—100万担之间。按唐德宗建中元年人口总数大约2300万，人均约合4斤。到唐宣宗时（846—859）“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年茶税收入达80万贯，茶叶总价值约800万贯，全国茶叶总产量在160万担—200万担之间。唐宣宗大中十

三年（859）估计全国有3300万人^[1]，人均约合5.4斤。2006—2008年全国人均茶叶消费量为1.2斤，与唐宣宗年间的人均茶叶消费量相比不足其1/4。显然，唐人是喝不完那么多的茶叶的，富裕的就上市交易。傅筑夫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说：“茶以外其它农产物的商品性过程在唐代还不显著，只有茶的商品化过程最为典型。”^[2]茶叶在唐代不仅仅是内销，还用于外销，如沿丝绸之路输往唐朝版图之外的西域各国（今甘肃部分地区及新疆地区）、中亚乃至东南欧。

唐长安城的“西市”（创建于隋，初称利人市）是当时国际性的商贸市场，是帝国经贸交易的主要场所和最大的物品集散地，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经济、文化特区性质的城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已准备了足够的发展外贸的条件，有接待机构，有管理机构，有商品集散地，有市场，有经营者，有消费者，有茶俗的传播者。当长安茶风弥漫成比屋之饮时，丝绸之路成为茶叶流通的管道顺理成章。

唐朝时期西域人知茶，间接地说明了丝路上已有茶叶贸易。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 Sakh，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中国与土耳其商人在边疆贸易时，茶叶是首先输出商品之一。今见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当时中国茶叶有所记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渴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叶子还多，也略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3]

丝绸之路开凿甚早，初以丝绸、瓷器为主打产品，茶叶加入当在中唐以后。期间发生了茶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陆羽首创“煎茶法”，改变了初唐时期落后的饮茶习俗，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获得了唐人的普遍认同，形成了“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4]的兴盛局面，并且成功地培育了大唐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饮茶之风，《封氏闻见记》总结说：“（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谈及初唐及中唐茶叶生产情况时指出：“茶……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5]自丝绸之路畅通以来，丝织品历来是中西民族贸易的基本内容之一，丝绸之路何时加入了茶叶的元素？据情理推之，唐建中年间是个节点，提得太早似乎不大可能。

唐朝盛行饮茶之风，此风也逐渐向回鹘民族蔓延，回鹘“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6]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正说明茶马互市始于唐与回鹘的交往。对西北茶马互市作出重要贡献的明代名臣杨一清认为，“自唐世回纥

入贡，已以马易茶”，肯定茶马互市始于唐朝。安史之乱后朝廷为了固边急需大批马匹，《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万匹。边关设有交易场所，如今陕西宝鸡专区的陇县，历史上是唐丝绸之路上茶马互市的重要交易点。

当时唐朝和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茶叶。《藏史》载：“藏王松岗布之孙（即松赞干布）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中原与藏区的茶马交易，唐代名茶大批输入藏区，首先成为吐蕃上层人士的时髦饮品，并以囤积茶叶显示富贵。据《唐国史补》记载，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使者神秘地说，这是“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不以为奇，平静地说：“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皮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灏湖者。

开元（713—741）年间吐蕃与唐在赤岭、陇州等处互市，双方的交换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

自丝绸之路畅通以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丝绸之路提供的交通便利条件，在客观上促进了回鹘民族成为中外国际贸易的中转角色。中国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20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唐代变文王敷的《茶酒论》，内云唐茶是“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就茶马互市而言，宋代比唐代有更大的驱动力，因为宋朝的茶叶产量是供大于求，必须发展外贸以解决茶叶的积压问题。宋代茶马互市有多大规模呢？就以南宋为例，李

安康文化 2019.3

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蜀茶》云：绍兴元年“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川、秦八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万余马匹的要多少斤茶叶呢？按每匹80斤的平均数，丝路上茶叶的流通量在百万斤以上。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明确指示：“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明史·茶法》。按“洪武永乐年间旧例，三年一次，番人该纳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一匹。”

朱元璋极力推行“以（茶）制戎狄”政策。到宪宗时明确提出了“茶、马，国之要政”，进一步强化了朱元璋的主张，继续实行“贱马贵茶”政策。明御史刘良卿曾言茶马贸易之利时认为：“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持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明人谭修约16世纪所撰《滴露漫录》云：“茶之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

《明会典·茶课》记载：弘治十八年（1505）陕西茶课“共五万一千二十六斤一十五两五钱”“令汉中府属金州、紫阳、石泉、汉阴、西乡五州县岁办，分解各茶马司”。万历“二十二年，定茶易马，上等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马每匹七十斤，下等马每匹五十斤。”二十九年（1601年），巡按毕三才，请汉中府西乡五州县仍输本色，每岁招商报中500引，可中马11900匹。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陕西巡茶御史使毕三才奏：“请令汉中五州县仍输本色，每岁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马万一千九百余匹。

由于明朝不断加大茶马交易的力度，造成边茶的大量积压。杨一清《茶马疏》披

露：“三茶马司见（现）贮之茶，计每岁易马之费，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宁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课茶，又日增月益之，以致积久腐烂。如近日监察御史刘希龙所奏，烧毁者三茶司共二千万二千余斤。几把火烧了1200.12万公斤（约12000吨），实在是茶马经济过热所致。

清代茶马互市较前朝逊色。茶马贸易的规模有多大呢？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言，“茶马旧额万一千八十八匹，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康熙四年，虽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仍准互市”。清朝前期每年11088匹，后又增加2000匹，共13088匹，需要茶叶百万斤之巨，涉及陕西七府一斤，蜀茶入陕的运输量不比前朝，但也十分可观。

茯茶因在“伏天”加工，故称“伏茶”，也作“茯砖茶”。清代、民国时期陕西泾阳亦有茯砖茶加工厂。陕西茯茶便于携带、运输和储藏，又兼具消食解腻等特点，非常适合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人民的生活习性。茯茶也因此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顺着丝绸之路销往俄国、西番、波斯等国家，深受各国人民欢迎。“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茶马》，真实记录了湖南黑茶在中国古代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大雅·绵》和《颂·豳风·七月》是古代流传于陕西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其中“董茶如饴”和“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两句有新的诠释：其中的“茶”指茶叶，这是古代周原地区出产茶叶的书证。原生古茶树北传在特定的某个时期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茶树是亚热带作物，随气候变暖，是有可能在陕西关中西部生长的，也有可能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当年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地区志书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敦煌县志》说“敦煌县有野茶”，《高

台县志》说高台有“茶，野茶也，生于祁连山中，味苦，间有采者”，《山丹县续志》说山丹县“茶自官曰府茶，亦曰黑茶”，《山丹县志》说“康熙十一年，参将石福径山中，见多茶树，遣僮往牧马，随地采制市之，阴获厚息”，《平罗记略》记载平罗产“黑茶”，《镇原县志》记载“神翁洞口有香茗”，《华亭县志》记载“产蔓茶一种，土人犹南贩马”，清人裴景福1906年撰《河海昆仑录》卷2记载：“闻新疆古城奇台属茶树沟一带，野茶树长二三百里。天山冰雪，产茶必良。惜土人摘焙不精。余得数饼试之，色绿而微嫌青气。若焙植得法，当不减湘晋。内外蒙古、哈萨克均耐茶以活，若就地取材，官制官售，大利也。”——可以这样说：甘肃、新疆有茶树存在这是丝绸之路的馈赠。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西安将是“丝绸之路“陆地线的起点和基石。这也是新一届中央为中国谋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新丝绸之路的建成也将使得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西安产生影响力的地域将是西亚、中亚、东欧一带，辐射人口为30亿左右。“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打通动脉绘制亚欧经济新版图。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中国茶曾经火了一把，今日陕茶也应抓住机遇参与进来，实现陕茶的新突破，走向国际，再造中国茶之辉煌。

笔者的结论是：以长安为起点的北方丝绸之路是联系长安和祖国大西北并直通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沿途的市镇又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将丝绸之路两侧甚至更远地区的城市、关卡、驿站、客店、商铺、集市等统统纳入这个交通网络

系统，成为沟通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桥梁，以及中外物资交流、商业贸易的牢固纽带。丝绸之路的商业行为以互市为主要内容。早期是绢马贸易，中唐茶风兴盛并流入塞外方才出现茶马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茶马互市兴起于唐，盛于宋明，衰落于清和民国。茶马互市的出现基于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的互补性。朝廷之所以极力推动，不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明史》直言不讳地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7]中总结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丝绸之路可以连接西亚、中亚、东欧，早期的贸易方式主要有：一是善于做生意的回鹘商人倒买倒卖，将茶叶转运丝路远端的国家，以获取巨额利润；二是华商和西域商人市场直接交易，或货币购买，或以物易物；三是贡赐贸易，进贡方献上本国的特色商品或马匹，朝廷回赠以丝绸、茶叶等物。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代中国人应倍加珍视，将其激活，以服务于当代社会的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

参考文献：

- [1] [3]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2]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4] 陆羽：《茶经·六之饮》。
 - [5] 杨华：《膳夫经手录》。
 - [6] 《新唐书》卷196《隐逸传·陆羽传》。
 - [7] 《读史方輿纪要》卷63《甘肃镇·序》。
- （作者单位：安康市汉滨区文化馆）

写字与书法

——兼议刘暘光的代表作

□ 潘鸿宾

安康文化 2019.3

当代书法的现代转向，是完全归于艺术，孜孜于形式美的追求。但刘暘光恪守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是文脉之一维，虽然本身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但却又不仅是艺术。所以，从2001年赵宏勋、李增保编选《刘暘光书法作品集》出版，到2018年刘暘光书法艺术馆开馆，十余年间，当看到安康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与对刘暘光书法的研讨，竟然在两股道上行走，二者少有交接，互相影响甚微，引起了我的沉思。

刘暘光这位已故安康文化宿儒的书作，最初吸引我之处，是其行草书“多”中见“一”的艺术创化。“多”指生命内蕴的丰盈，所见作品几乎是两个大时代在个体生命中的经验浓缩，有着压抑不住的情感爆发力；“一”是生命从现实中超越后的自由精神，又与如火如荼的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恰好构成了应和关系。感受是印象式的一片混沌，缺少理性的明辨。认识的深化是在这近十年间，基于我在刘暘光生活过的同一片土地上的亲身经验，特别是在困顿生活中的感悟，加之“以意逆志”（孟子）的致思方法，才渐渐把握到了其书法的内在理路。

可以说，是生活的不幸，恰好成为了刘暘光书法之幸。1949社会巨变，正当壮年的刘暘光被错投牢狱，青丝进去，白发出来，等到昭雪平反，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特殊的经历，将一个先教书、后入仕的本色激进者，压制成了一根强力的“弹簧”，而又身逢文革后的思想“解冻”，无业无权的刘暘光，可以拣起的只有一杆毛笔，成为其“托命之具”，除了此“微言”托付，以书法“小道”传名，还有什么能稍慰平生呢？

中国人人生三不朽讲“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中，刘暘光能真正实现的却只有“立言”。而他的“立言”不是著书立说，身后由学生赵宏勋编成的《刘暘光文集》，也几乎全是其书法文字内容的转录。刘暘光的学生李增保告诉我，先生生前日日一管笔不干，有感即发，行于笔端，写字无论身体侧正，不讲姿势。不拒访者索请，笔之所出无不可付于人者。李增保著《书家刘暘光》一书中记，1993年春天某日，在医院工作的学生李增杰前去给暘光先生量血压，意外得到了一件行草《沁园春·雪》，是先生“一口

气、一笔墨、一分钟”，仿佛神鬼附体般完成的。刘暘光书法的精品往往就是这样，是日常书写中的妙手偶得……刘暘光经历了那样巨大的人生挫折，在晚年复出后，却依然葆有着儒家的狂者精神，参与社会，推己及人，而其方式就是以一管毛颖“言”说，“言”的文字内容要么摘用前贤，要么化取古人，要么有感寄语，所“言”包括明理劝善、临帖心得、思絮断想等等，不一而足，都是生命“此在”敞开的真性显现。哲学家陈嘉映说，格言体写作是对问题或人生的某种深厚体悟的片段展现，一般格言我们会听老年人的，因为他们的体悟可能比较深；年轻人在思考问题时应该正好相反，即尽量把他的体悟作为一个“网络”呈现出来，力图理清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以“点”来呈现。这是从长幼之别上说。可即使是老年人用格言体，也有这样的问题，即把那个burden（负担）放在了读者身上，读出几分意思得看你的慧根，全凭自己。而我们做哲学的，则一般把这个burden放在“我”身上，我自己要尽量全说到、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的explicit（明确的），是它要系统地说。

刘暘光书写所传之“言”，是片断式的，但又包含着整体的背景，西方人的思想偏重于建构个人哲学体系，往往因为太过庞大，个人无力全面把握而僵死。中国人的生命在一个活的伦理结构中，个体的活性可以从整体中借得能量，《论语》不就是凭借春秋时期的强大思想底背，以激活的生命即兴而“言”之吗？这应该是另一种“系统地说”。刘暘光生命感兴的（语）“言”也是这样日常“写”（字）出。比如他写下的“偶感”一则：“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在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的，思想上的压力，

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这样的“言”说，影响到与之相应的视觉形式的书写，运笔紧劲绵密，行气畅达自如。由此说来，刘暘光写字的“字”的内容，与书法的形式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前者充当了书意生成的主导。正如王元化先生所指出：“形式是从内容中‘涌’出来的”。这个“涌”字，正是对生生不息的儒者精神的生动描述，它通于《周易·象传》中乾卦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派行于大道的阳刚之气与充实之美。

如上对刘暘光精神世界的探究，在于发现其书法生成的机制。自古毛笔的日常写字与书法艺术的共生关系，被现代社会割裂后，刘暘光其实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持着。由此，我将刘暘光的书法进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写字——书法——写字”。前一个“写字”是自在（自发）的，后一个“写字”是自觉（自为）的，中间的“书法”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形式美艺术，一般书法家到此就止步了。最后一阶段的“写字”是书法形式之美向生命之真的回归，是生命与书法的双重飞跃。当然，居中的“书法”阶段是漫长的修为过程，是追古与摹迹两方面的“见贤思齐”。其实，我并没有机会接近与观察刘暘光这一生命与艺术的升华历程，我只是从其后期的少数作品中，看到了其铅华刊落，直逼本心的精神境界，看到了其将自己的生命法则转化为了书写法则，便认定其为真正的书法家。也许马一浮的话，可以对此作出正解，在他看来，艺为道德附丽，书法之为艺，必应于心、达乎道，才为可贵，而一旦贯乎心、达乎道，则为艺必精，否则昧乎本心，求书艺之精，则不可得。

然而，刘暘光书法达到的这一高度，并没有被真正发现和认同，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情形，安康本地“研”（刘）与“学”（书）分离，“研”刘的人多袭其貌，未得神髓，“学”书法而被认为有成者，大多与刘暘光的书法没有血脉关联。这是为什么呢？刘暘光的书写既是日常化的，就意味着数量很大，难免泥沙俱下。作为研究资料必须广泛搜集，多多益善，都有价值，但对刘暘光书法的研究，既然重在彰显其艺术成就，确立其历史地位，就要推出其代表性作品，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优劣不辨，误导观者，最终无法对刘暘光书法的历史评定以有力支持。就刘暘光书法代表作的推出，我个人试举两例。

第一幅作品是四条屏行草《忆秦娥》（毛泽东词）。作品精神内涵中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是与刘暘光的人格份量对称的，金刚杵的笔力腾跃争折，有着特别的笔势与体势表现。米芾以书学士召对时曾说：“……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臣书刷字”。我则说刘暘光“捣”字。其“捣”的笔势，是他独有的艺术表达方式，是从其全部生活的感受方式中转化而来，既遵循古来笔法，又出于“我”之真宰，一空依傍。这是顾炎武所谓：“采山之铜”，是如同从采矿到冶炼到出品的全过程，属于真正的原创。此举重若“重”，当然不是真的要力“透”纸背，而是一种艺术心理上的“错觉”，这样的“错觉”还包括虚笔的映带牵丝部分，而此作的该部分中显见笔的腾跃，入纸既深，行空也高，让人仿佛听到振奋之声，慨叹之音。毛笔如此的“上下”运动，还打开了一个独有的精神空间，是真力对书法“结壳”了的优雅的打破，是草书精神之所在。在体势上也同样可

见其虚实相生，如包世臣说王羲之：其笔力精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空际”就是广阔生动的空间，或往大处说叫意境——以空间性展现的感性生命形态。

第二幅是“江湖归白发 / 诗酒醉红颜”对联。中国书法每有中锋与侧锋之辩。沙孟海先生考证晋人书写时的斜执笔，认为要能够笔尖贯力，使笔尖成为笔锋才是关键，这样当笔锋偏于线条一侧时才不会离开纸面，从而使线条遒劲有韵，写出来的线条才左右转侧，翩翩多姿。刘暘光敢于打破常例，以笔尖“杀”纸“溅”墨，探索笔墨的现代性表现，但又并非无规矩地乱来。在点画形态上，也从现成的笔法系统“突围”，由死的观念向活的物态回归，笔下出现了如同自己加长的手足的“槌头”象形。田尔斯在《刘暘光书法作品集》序言中曾提及，说：“诗字末笔的勾画，不尖锐，似大板铁槌，巴山农家常见，秦川耕夫亦用，体壮劳力者喜欢，而案头耕砚田者见此状也许蹙眉”。刘暘光在回答《安康日报》李大斌采访时，也曾夫子自道，说自己在写“地”和“字”等字的钩画时，不细不粗，为避免鼠尾的书法大忌，“我取法农夫的挥槌，是自己的书法意趣也”。也许有人会以“丑”书视之，而我则要说，中国艺术之大美，唯真可以开启，刘暘光得之矣。体势方面，刘暘光取颜鲁公结字的宽博，化笔势的粗豪为雅趣，儒道互补，充分释放其“审”（美）的主体精神力量，表现出极强的审美创造力。

再者，如1994年书“夏雨春秋夜月 / 唐诗晋字汉文章”对联，博洽通达，端雅雍容，在中和之美的平衡感中，让人看到了刘暘光精神世界的宽度，看到了其艺术建构的多种可能性。还如1996年写于“牛皮”（包装）纸上的小品（“案上书刊凌乱，窗前花

影婆娑……”），虽然很好，但还是缺少形式上的代表性，显得太雅，有王铎、米芾痕，临古（意临）成分略重，刘氏生命特质显现不充分，属于其书“三阶段”中的“书法”阶段。而其代表作则一定诞生在上述“三阶段”的第三个阶段。

如上提及的优秀作品，都分别产生于1992年后，距刘暘光离世的1996年较近，可以说均为后期作品。这些年来，安康地方有情怀、有见识的人士已编辑出版刘暘光各类作品集、图文资料集七种，但我觉得还应有一本编年作品集，特别是需将其书法进程中第三阶段的作品选出，凸显其艺术达到的高度。据此，刘暘光才能以强有力的文本支撑卓然名家，随着洪钟声扬，嗣响再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继而侧身于陕西文化史，成为名垂后世的书法大家。这是我在“小心求证”尚有待深入进行之前，斗胆作出的“下保底、上封顶”的“大胆猜想”。

诚然，刘暘光的个体生命与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构成了应合关系，在对一时代精神的表现上能开风气之先，已建立了一个艺术大家的功业。但如要企及“包前孕后”的一代大师名位，则显得勉强，有人为拔高之嫌。刘暘光从八十年代到1996年生命终结，仅有十余年好光阴，其于书法历程“三阶段”中的第二阶段融炼有限，虽然其第一阶段的人生磨难作为艺术创造的情感准备异常丰足，大根系却不一定必然结出累累硕果。他进入书法历程第三阶段的时间跨度不够，未能建构起一个完善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时空，未能化生出凝聚其全部生命精神的编码和符号。艺术史最终认领的是艺术形态学意义上的符码。不为尊者讳，就此略加申说。刘暘光书法走的是晚清以降碑帖融合的路子，脉息接点是于右任。其取法立足唐

人，上下求索，向上以孙过庭为门径远绍晋韵，向下直入清人碑学堂奥，实在难能可贵。其大去之年也曾书“法宗羲献、笔悟钟张”八字明志。但终了还是入古待深，融冶欠合，不得中行达至圆融之境，必也狂狷走极端。其书意虽然很高，但“我”法未修至等高，就难得意法平衡，两翼齐飞。这是殊为令人遗憾的。

中国书法的情况还有其特殊性，本文开头即言，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脉传承之维。刘暘光于此缺少综合性的载体，仅以书法作为艺术的一面是不够的。如以书法名世的当代草圣林散之来说，其自书墓碑曰：“诗人林散之”，生命意识向文脉的总体方面自觉靠拢，而他的大名也确实是与共生于南京的新金陵画派的崛起相呼应的。安康地域文化的底蕴相比名都大邑确实是贫瘠的，文脉的主经络不在这方土下，个人的立足点就无法成为重要的文化“穴位”。昆仑山高，是因为它占位于青藏高原。我不能不说，这是限定刘暘光书法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我初推的两个代表作的艺术类型出发，拟对刘暘光书法的风格作一点探求，我试以《二十四诗品》中的四字概括之，即“刚劲、自然”。刚劲：喻彼行健，是谓存雄；自然：俯拾即是，着手成春。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我以为，对于一个文化地域同样如此。刘暘光作为安康的文化英雄呼之欲出，对于建设安康地域文化，在已有基石上蓄势养气，发扬新传统，具有重大意义，非常值得期待。

（作者系陕南本土文艺评论者）

论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思想内核

□ 杨明贵

安康文化 2019.3

何为循吏？司马迁认为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1]768(卷一百三十)。班固认为，“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1]885(卷八十九)的地方官员可称为循吏。余英时先生作史料梳理和考辨后指出，司马迁所推崇的循吏是“汉初文、景之世黄老无为式的治民之官”，而班固所理解的“循吏”则为“昭、宣以下那种‘先富后教’型的循吏”^[3]136，代表了儒家的德治主张。自《史记》始，“循吏列传”成为正史中的固定体例。历代正史中有传的循吏，必有独到的施政理念和突出的治理业绩。

一、中国古代循吏举例

《史记·循吏列传》中，孙叔敖“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公仪休“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汉书·循吏传》中，蜀郡守文翁“仁爱好教化”。黄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其化大行，郡

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号之曰召父。”《隋书·循吏列传》中，公孙景茂“法令清静，德化大行……修身洁己，耆宿不亏，作牧化人，声绩显著。年终考校，独为称首。”刘旷“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争讼绝息，囹圄尽皆生草，庭可张罗。及去官，吏人无少长，号泣于路，将送数百里不绝。”《宋史·循吏列传》中，鲁有开“知卫州，水灾，人乏食，擅贷常平钱粟与之，且奏乞蠲其息。”吴遵路“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笔札。其为政简易不为声威，立朝敢言，无所阿倚。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赙其家。”^①《明史·循吏列传》^②中，陈灌“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帖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伐石筑堤，作水门蓄泄，护濒江田，百姓咸赖。”万观“励学校，劝农桑，奏减织造，以银代丝税，民皆便之。九年考绩，治行为海内第一。既以忧去，将除服，严州民豫上章愿复得观为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清史稿·循吏列传》中，任辰旦“康熙初，授上海知县。清苦自励，敏於听断，数决疑狱，豪猾敛迹。催科以时，不大用鞭

朴，百姓感其仁，输纳恐后。”骆锺麟“（十六年）迁陕西盩厔知县。为政先教化，春秋大会明伦堂，进诸生迪以仁义忠信之道。增删吕氏士约，颁学舍。朔望诣里社讲演，访耆年有德、孝弟著闻者，见与钧礼，岁时劳以粟肉。立学社，择民间子弟授以小学、孝经。飭保伍，修社仓。莅狱明决，所案治即势豪居间莫能夺，人畏而爱之。”^③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按古代官制，郡、县最高行政长官集行政、司法、劝农、教育、教育诸权于一身，国家的政令最终要依靠他们执行落实。郡、县治理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故古人又云：“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

由于循吏在封建国家治理体系内具有重要的政教功能，故培养循吏就成为历朝历代吏治建设的核心目标。《新唐书·循吏列传》载：“唐兴，承隋乱离，被荒荼，始择用州刺史、县令。……开元中，又罢废酷吏，惩无良，群臣化之，革苛虐之风，争以惠利显。”《宋史·循吏列传》：“太祖之世，牧守令录，躬自召见，问以政事，然后遣行，简择之道精矣。”《明史·循吏列传》：“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府州县吏来朝，陛辞，谕曰：‘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损人以肥己，尔等戒之。’……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4]7185（卷二百八十一）。

《清史稿·循吏列传》：“圣祖平定三藩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龙、彭鹏、陈瑛、郭琇、赵申乔、陈鹏年等，皆由县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於斯为盛”^[5]12967（卷四百七十六）。

二、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思想内核

《新唐书·循吏列传》云：“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

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6]5616（卷一百九十七）。司马迁以后，肯定并褒扬“循吏”，成了历代史官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古代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历代正史中记载的循吏作业和事迹基本上与原始儒家的教义相一致，循吏的教化努力确是出于实践儒家的政治道德理想，即建立礼治或德治的社会秩序”^[7]106。践行儒家重仁尚德的治政理念，是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贵遗产。结合正史中所载循吏事迹，可以将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思想内核简要归纳为行仁和践德。

（一）行仁

在孔子的观念中，仁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人本应具备的、可与他者感通的能力。在孔子看来，由仁心生起的感通之情，会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故强调作为血缘纽带的“孝”“悌”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的基础含义。如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这样一来，“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8]14，最终实现“由‘亲’而及人，由‘爱有差等’而‘泛爱众’，由亲亲而仁民”，并最终要求在整个氏族成员之间保持一种既有严格等级秩序又讲求“博爱”的人际关系。孟子也有“亲亲，仁也”^[9]2789（卷十三），“仁之实，事亲是也”^[9]148（卷七）等论述。

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即恢复奴隶制时代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社会政治体系^④。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用‘仁’解‘礼’，本来是为了‘复礼’，然而其结果却是手段高于目的，被孔子所发掘强调的‘仁’——人性心理原则，反而成了更

本质的东西。”^{[8]16-17}所谓“人而不仁，如何礼？”^{[10]24}强调的就是——“仁”是人之本质属性，其存在具有普遍性。故孔子云：“仁者，人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将‘仁’发用出来的仁心，不单本性具有，并且每个人都可自我主宰，让它发用出来，从而建立了儒家伦理之为自律道德的根据”^{[11]176}。

作为儒家的终极道德原则，“仁本身不是一个义务概念，也不是一个用以区分对错的客观原则。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德行概念，因为它并等同于善或卓越”^{[11]50-51}。既不是义务概念也不是德行概念的“仁”，似乎只能作为一种道德意志而存在，它使人超越自我而又及于他人，最终使个人的道德超越成为可能。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仁”具有涵摄众德的功能，仁和其他美德的关系，是一种统属的关系。所谓“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0]163}（宪问篇第十四），“未知焉得仁？”^{[10]46}（公治长第五），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如果说先秦原儒对“仁”的内涵的解析因偏重性理思辨而显得抽象的话，那么秦季以降的后儒则是从建构日常伦理规约的角度出发，不断地对“仁”的内涵作出比较具体揭示：

何谓仁？仁者，惛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诋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12]325}（必仁且智第三十）

将“仁”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具有人类所有道德理论所共有的两大要素：无私性与利他性。无私性就是视人如己，平等对待自己与他人；利他性就是与他人相感通，设身处地地体察他人的愿望与感受。无私性与利他性的充盈，实现了社会内部的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间

的和谐有序。儒家认为，仁是为官者必须具备的伦理情怀，也唯有真正的仁者，才能成功施政。故《隋书·循吏传》云：“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13]1674}（卷七十三）

当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曾指出：

盖儒家之基本用心，可概略之以二。一为由性善的道德内在说，以把人和一般动物分开，把人建立为圆满无缺的圣人或仁人，对世界负责。一为将内在的道德，客观化于人伦日用之间，由践伦而敦“锡类之爱”，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皆成为一个“仁”的关系，性善的道德内在，即人心之仁。而践伦乃仁之发用。^{[14]29}

可以说，“仁”体现出中国古代儒家的悲悯情怀和对生民负责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具温情、最有力量伦理武器。在官员施政实践中，行仁主要体现为体恤民瘼、爱惜民力、关切民利、使民以时、节用惠民等。

（二）践德

儒家伦理是一种典型的德性伦理。与之对应，儒家的政治思想可称之为德治主义。德治主义思想在中国起源甚早。中国现存最早的王室文献《尚书》开篇就赞扬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5]3}。第二篇《虞书·舜典》记载“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帝舜命乐官教导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春秋时代的政治文化也重视明德、敬德、务德，如韩简主张“败德不及数”^⑤，穆姜所说“无德不能无咎”，范文子以德为福之基。这些表述，均为朴素的德治主张。

德治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和信任。要求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应建立起以德相与的关系，而非以权力相加、相迫的关系。在德治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治者不是站在权力的上面，运用权力去限制些什么；而主要是站在自己的性分上作内圣的功夫。由内圣以至外王，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推’的作用，亦即是扩而充之的作用，其所以能推，能扩充，是信任‘人皆有可以为尧舜’的性善”^{[16]275}。古人亦云：“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13]1674(卷七十三)}。德治的基本用心，是通过生发内心之德去实现社会和谐。在儒家看来，德为人性所固有，礼为德之外现，只要加以诱导熏陶，人就会产生遵礼向善的自觉；而刑为外部强制力量，无助于人性改造，在社会治理中，重刑只能治标，甚至会成为虐民以逞的恶。如不务德，统治一定崩溃，历史上殷以败德而亡，周以明德而兴，就是典型的例证。故惟有德治才能实现统治秩序的稳固。在中国古代政治观念里，德治主义与民本主义是互为表里的。最早倡导德治的《尚书》，也最先提出“民为邦本”^⑥的思想。中国古代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政治家“不仅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以为民也’，而且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因而把民升到‘神’的地位”^{[16]80-81}。《尚书·皋陶谟》中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中宋司马子鱼和随季梁二人皆说：“夫民，神之主也”^{[17]81(桓公)}。《国语·周语（上）》说：“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谓：“民之所与欲，天必从之”，这些表述都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敬民即敬“神”。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观念中，“民不仅是治于人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下，而且是以天与神之代表者的身份站在统治者之上。在人君上面的神，人君所凭藉的国，以及人君

本身，都是为民而存在”^{[14]80-81}。所以，明德慎罚、力修政德、以德治民、惠和待民，既是践行王道的应有之义，也是避免社稷倾覆的政治前提。

作为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核心标识之一，“德”在对外关系中指宽大为怀、和平为重，不依势欺凌弱国；在国家内部治理方面，“德”则体现为“安民、保民、抚民、恤民、勤民、庇民、化民、不妨民、不害民等”^{[18]274-275}。万历初首辅张居正在《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指出：“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儒家倡导的德治事实上涉及两大目标：厚生利用和整饬伦纪。前者与民生有关，目的是使民富之；后者关系风化，旨在敦睦人伦。这自然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州县级官员在治政实践中，对于所领之民，既要扮演父母的角色，“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又要发挥师长的功能，即通过教化诱，涵养其德性，引导其崇善守礼。

在德治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为明确官员施政时应具备的“德行”。《尚书》中有“九德”之说。对《尚书》中有两种“九德”，一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15]32(尚书·皋陶谟)}；二曰：“一孝，二悌，三慈惠，四忠恕，五中正，六恭逊，七宽弘，八温直，九德广备”^{[15]32(尚书·皋陶谟)}。《国语·周语》中亦有文治七德之说，即“尊贵，明贤，庸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与文治七德相对应，《左传·宣公十二年》中也规定了武功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

儒家认为，实现德治的前提是官员能先尽其德。“只要治者能自己尽性以建中立极，则风行草偃，大家都会在自己的性分上营合理的生活”^{[14]79}。孔子所讲“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传达出的就是此意。

结 语

行仁、践德是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思想内核。作为封建时代王道政治的脊梁和士大夫阶层的优秀代表，循吏在推行仁政德治、传导封建伦常纲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诚如《隋书·循吏列传》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然则易俗移风，服教从义，不资于明察，必藉于循良者也。”^[13]1674(卷七十三)建设一支为党尽忠、为国尽职、为民尽责的干部队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保证。中国古代正史中所载循吏业绩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生动、感染力强的教育素材；从中国传统循吏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注：

①所引宋代循吏事迹参见《宋史》卷四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循吏》，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所引明代循吏事迹参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循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86—7210页。

③所引清代循吏事迹参见《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列传二百六十三·循吏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68—12985页。

④相关论述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⑤引自《左传·僖公十五年》：“韩简侍，曰：‘龟，像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像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乃可数乎？’所谓‘败德不及数’，意为：先君道德败坏，还能用数来化解？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5页。

⑥《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引自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 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 张廷玉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赵尔巽等.清史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 宋祁等.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杨建祥.循吏与地方风化 [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3）.
- [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9] 杨伯峻《孟子》译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0] 杨伯峻《论语》译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1]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 [M].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3] 魏征.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4] 李维武.徐复观文集：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二卷）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 [15] 尚书 [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6] 李维武.徐复观文集：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一卷）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8]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作者单位：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

汉中家谱、家训二题

□ 冯岁平

一、汉中现存家训刍议

照目前的解释,家风是一个家族的传统风尚,家规是其行为规范,大致由其祖先遗给子孙后代,家训则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这种说法自必不劳我再来述说,因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向往的人生理想,最初目标的“齐家”就是典型天下的首要工作,所以着力教育子女,建立良好的家族风范。家庭、家族是社会、国家最为底层的基本细胞,宗法制成为千年来中国传统不易的最普遍的管理体制之一。

谱系一体发轫亦早,作为其中代表的家谱则代有佳作,启迪后世者也不在少数。汉中位于汉水上游,地处秦巴腹地,现存的家谱年代并不久远,如南郑萧氏一世祖萧文彩,生于天启元年(1621),卒于康熙十六年(1677)。从湖南衡阳外徙两支,一居四川华阳,一居陕西南郑。道光二年(1822)创修《萧氏族谱》,民国则踵其续修。西乡李氏从三原迁居南郑,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始修《西乡李氏家谱》。南郑青山沟蓝氏也是“自楚而蜀而秦”,至五世时始居南郑,民国三年重修《蓝氏族谱》。民国八年褒城周氏也修成《褒城周氏族谱》。刘氏从乾隆迁居南郑,几经徙居,最后定居南郑青山沟,民国十三年完成《南郑青山沟刘氏族谱》。略阳王家坪王氏从榆林迁来,民国二十年修成《王家坪王氏家

谱》(亦名《王氏家谱》)。袁氏原籍浙江,袁荣初任郴阳知府时,则寄籍于湘之郴州永兴垭,乾隆十一年(1746)来南郑青山沟,民国廿七年修《南郑青山沟袁氏族谱》。南郑郭氏原籍福建汀州府,雍正九年(1731)迁居南郑郭家沟,亦修《南郑郭氏族谱》。这些并非现存汉中家谱的全部。还有勒石者,如研究者常引用的光绪十九年(1893)汉台区龙江的《谭氏族规碑》^[1],还有新发现的同治五年(1866)立、光绪二十一年(1895)补刻的包氏《永定章程碑》,现存留坝县玉皇庙镇狮子坝村包氏墓地。2015年考察中曾见光绪二十三年西乡堰口李氏族训碑。此外家族的神位多少也带有家谱的性质,2016年在留坝县江口镇梭楞村考察时发现红绸上书写的江氏神位,据此轻而易举地编成《江口江氏家谱》,当然也明确了道光《留坝厅志》采访江宗元、碾伯知县江宗弼、硤口营游击江宗利的生平事迹。但所见这些家谱或类家谱者,基本在清中叶至民国时期。

这些家谱、族谱,家训往往在焉。洋县东韩村刘氏,原居关中周至。同治间所修的洋县《刘氏家训》两卷,刘辉山辑,其中卷上《箴言》:法圣贤、敦孝行、笃友爱、宏度量、室淫荡、守礼节、绝妬意、积阴功,卷下《志戒》:一戒废读、二戒借贷、三戒用人、四戒修房、五戒奢华、六戒吝嗇、七戒冒险、八戒偏爱,最后附

安康文化
2019.3

录刘待宣《属子篇》^[2]。此外还有刘鉴撰成的《劝孝歌》^[3]，俨然成为洋县东韩村刘氏一脉相传、家风常盛的根脉。或是此因，其后人刘涛先生等竭力编辑新谱，并问世传播。

道光二年纂修的南郑《萧氏续修族谱》有约言二十五条，分别是孝父母、尊长上、和宗族、睦乡里、教子孙、安生理、崇节俭、完粮饷、正名号、勤祭扫、敦友爱、严内治、习礼让、存忠信、守廉节、严非为、戒争斗、别婚姻、辨异同、重亲盟、戒越葬、惩游戏、禁淫欲、勿偏爱、严谤诬。

民国廿七年《南郑青山沟袁氏族谱》家训云：孝父母、和兄弟、谨夫妇、教子孙、慎婚嫁、正继嗣、重丧祭、睦宗亲、厚渊里、勤职业、崇节俭、慎交游。

此外略阳王家坪王氏从榆林迁居略阳，则著勒家训，以戒子孙：“门系高则自骄，户族盛则人窥，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褒城周氏从《春秋繁露》、《谭子化书》等经典中辑录古格言数十则作为家训，并辑入家谱之中。甚至南郑青山沟刘氏将《朱子治家格言》径直作为家训，西乡李氏将《大清律例》的规定以为家训之附录。这些形式各异的家训毕竟起到了教化作用，即培养其伦理道德、治家持业、修身养性、社会交际之道，这期间必然有其优秀部分，如“百事孝为先”的孝道、“耕读传家”的敬业与追求。

汉中的家训也有特殊者。因为自明中叶开始，秦巴山区涌入大量移民，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为了生存，深入秦岭、巴山之间，呼朋唤友，俨然打破了以宗法体制的藩篱，成为一片外化之区。按照清代中期严如煜的看法，“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也。”^[4]因此现出了一些家训上的变化，典型的例子就是

同治五年(1866)包氏《永定章程》碑，本是刊石以明祭祀，但在碑文中首当其冲规定“后嗣必须清白传家，毋得奸盗邪淫，致玷家风。”对于“邪”，更深入说是“后嗣士农工商，皆可为业，毋容学习邪教，有犯忌王章。”在当时看来，以白莲教等代表的邪教，已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人民生活，习邪教无异于玩火自焚，所以包氏将之作为家训的内容，应该是其亲历所经。崇尚读书当然是一个家族追求，《西乡李氏家谱》将族训、族例、族禁胙列的同时，还重点列出了义塾规，强调自幼教育及其规定。

当然这些家训是名门望族长期求生存、谋发展、图强盛的产物，其家谱与家训的纂修本身就是极好的注脚，因为并非下里巴人短期所能做到的。更非干瘪的说教，无用的感化，背后都蕴含着代代所追求的家族之辉煌，一个个所渴望的贤达之涌现。洋县东韩村刘氏，刘燮德、刘鉴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热心于搜集乡邦文献，并雕版印刷，这样才有岳震川《赐葛堂文集》与童颜舒《禹贡通释》《灊源堂诗集》等众多文献的问世，其岳氏校堂堪与安康来鹿堂相媲美。也涌现出民国时期享誉全国的知名建筑学家刘宝镠。南郑蓝氏，有蓝文锦、蓝培原等，曾为汉中一方名士。青山沟刘氏，曾有刘执锐这样的教育家。至于西乡李氏，光绪年间曾任江西巡抚的李文敏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看来昔日的家训并非华丽的摆设，并非枯涩的说教，孰解其中味？

二、李文敏《西乡李氏家谱》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从李文敏嫡孙大身先生处获得业已不存的《李文敏墓志铭》碑的拓片。李文敏卒后，“西乡学博泾阳冯君庚，予姻也，见知于公公子友杜，求君以状乞铭”，始知著名关学大师贺瑞麟先生所撰的墓志铭，还是曾伯祖冯庚牵线搭桥促成的，当然墓志铭并未收入他的二十三卷《清麓文集》，曾伯祖少白任西乡学博之后，后擢升四川永宁、西充知县^[5]。或因此等因缘，多年来在汉中

一直搜集有关乡邦文献时,对李文敏之诗文情有独钟,尽管他生前死后似乎没有编集成册^[6],但获知其编有《西乡李氏家谱》,遂持之以恒多方搜求,终于在同道李华先生的帮助下,将分别庋藏在西乡县档案馆、博物馆的《西乡李氏家谱》合璧为全帙。

明代成化年间,三原李氏迁徙西乡,分居南关与二里桥,是为西乡李氏,依照该书《凡例》的说法,“与西乡李姓土著有氏族不同者,旧通婚姻,今谱据实而书,并无湮姓之嫌。”但李氏“中更丧乱,谱系散佚。未迁以前,无由知闻,今谱奉迁西乡一世祖为始,志谨也。”这样至光绪年间已衍为十三世。久无家谱,引为全族之憾事。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时,太高祖嘱瀛洲公:“长子士林,欲将分内所分产业,尽行推让内弟。尔既有爱弟之意,亦不可尽违父命,固执前辞。今将所授遗泽,开明单后,永远遵照。”这种代代传承的庭训成为李氏一脉传衍的基因。到了第九世清禧公(字福田)每遇伏腊展拜祠墓时的缺憾涌上心头,颇多焦虑。李文敏回忆:

家世耕读、醇朴相继,至今十余世,谱帙阙如,先大夫恒以为憾。岁时,伏腊展拜祠墓,每呼文敏兄弟而告之曰:家中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不修无以鉴治乱、示惩戒,谱不修无以溯先芬、联族属,他日必有典而忘者。汝等学业有成,须勉为之,使知木本水源不忘所自,则仁孝诚敬之心油然而生矣。

俟已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李文敏开始谋划纂修家谱。李文敏(1817—1890)字少頰,号捷峰,

从光绪八年(1882)着手修撰,几经周折,颇费心力,终于在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由春荫堂刊板成书。审订其稿的张鸣珂之跋语,揭开了家谱纂修前后的过程:

《西乡李氏家谱》三卷,捷峰中丞开府江右时命犹子友植等辑辑、邮寄,随时编纂。岁癸未,中丞致仕,还关中,以初稿授钱塘张参军竹孙,俾校讎付梓。参军延仁和钟孝廉家

鼎缮录、参订,刊未竟,参军归道山。仁和冯大令学澧同官豫章,思是谱之不克成也,与鸣珂相商榷,遂乞其原稿,重加斟酌。大令工绘事,厘定其墓图。中丞又寄各家投赠诗文,并自制外戚碑传若干首,鸣珂为之附编卷末。至己丑冬,削氏毕工,而志其颠末于后。

从中看出,李氏决定纂修家谱开始,族人友植(字培庵)便多方搜集并邮寄,随时编纂,此时李文敏在江西巡抚任。光绪九年(1883)李文敏将初稿交张竹孙校仇付梓,而张竹孙延请钟家鼎缮录参订,未竟而张氏归道山。此后冯学澧与张鸣珂相商,乞其原稿,重加核勘,其间张鸣珂将李文敏寄来的各家投赠诗文及撰写的碑传作为附编,是为今天所见的卷三,在光绪十五年底终于告成。张鸣珂(1829—1908),原名国检,字公束,号玉珊,晚号寒松老人、窳翁,浙江嘉兴人。咸丰十一年拔贡,官江西德兴知县,义宁州知州。是晚清的著名学者,今存诗文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0册。但不知何故,在其诗、词、骈体文,甚至怀人诗中未有此次修谱的只言片语。

今天所见的《西乡李氏家谱》,前有王麟书、龙文彬、颜钟骥的三序,其书内容为:

卷一有凡例、光绪八年李文敏《李氏谱图序》,分述纂修家谱的体例以及缘起。谱图则表列南关谱系及二里桥分宗谱图,附录六世以上不能详其所出的谱图。世禄则分列第一世至十三世,另有二里桥分宗世禄。此乃不断搜罗而得的谱系图,所止时间为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付刻之前,唯有第十三世乃经下有卒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一项,盖系后人补入。

卷二则为家谱的重点,内容也较多,有必要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是墓图,是冯学澧绘制与厘定的。分别是二里桥老莹、象鼻山下坟、象鼻山后坟、文家山坟、晏家巷坟、杨家莹(营)、宁家园坟、蒲家坝坟、刘家桥坟、李家坝坟、五真殿庙外坟、苏家渠坟图。

第二部分是传志,有李太夫人墓志铭、家

传、墓表,高伯祖瀛洲公家传、祖考荆山府君行略、祖妣万太夫人行略,潘祖荫《显考福田府君行述》,以及刘煦《李公福田先生家传》、武承绪《福田李公诔》、先妣陈太夫人行略、先叔父芳洲公墓碣,孙有序《郁堂公墓志铭》、李文敏《田夫人墓志铭》《合瘞二殇子墓志铭》。附录改葬各祭文,有祭二里桥老莹土神文、祭李氏历代宗祖昭穆文、将启旧兆祭夫人文、将营新兆祭象鼻山土神文、祭光禄府君文、既营新兆复祭夫人文、既营新兆复祭象鼻山土神文。

第三部分有礼事、李文敏《李氏家庙记》《奉思堂记》、祠祭礼节、李氏祭田记。

第四部分为禀稿,收录捐造宗祠并置祭田义庄及增书院膏火禀请立案稿。

第五部分是族训部分,有规条、族训、族例、族禁、义塾规,附载律例。

卷三是各家投赠诗文,可以说是李文敏的专辑,除卷末有李文敏撰《节姑汪母李儒人家传》《适张氏姊墓碑》《厚庵张君配李儒人墓志铭》等家传、墓碑外,余者皆为友朋所作诗文,大致分为:

一是赠言,有刘煦《送李捷峰礼部入都序》。

二是李文敏六十寿辰时友朋所贺诗文,计有贺序者刘秉璋(仲良)、张澐卿(霁亭)、余上华、寻奎炜、曹秉浚(朗川),贺诗者范鸣和(鹤生)、李玉泉(梅生)。

三是光绪十一年(1885)原品休致、钱别者有王麟书(松溪)、吴庆扬(云卿)、喻秉绶(采臣)、胡寿椿(砚生)、董沛、黎原超(小韩)、黄凤(楚黄)、蒋彬若,以及黄际亨(元卿)、刘友浚、鲁鹏的《呈李中丞》,受业者李庚干、李乘时(秀峰)的《忝以制科考取送部赋呈李中丞》,董沛(觉轩)《闻捷峰中丞疏请述职,优诏不允赋呈》,喻秉绶(采臣)《李中丞新建孝廉堂落成延主讲席志感》。

四是李文敏喜好收藏,擅长书画。今见西乡县博物馆即有《琵琶行》扇面、瓷板画

等。他收藏的《荷净纳凉图》,有范鸣和(鹤生)、余联沅(晋珊)、刘余庆、吴可读(柳堂)、崔志道(劭方)、王宪增(立生)、余上华(黼丞)、沈裕(韶琴)、徐桂芬(古香)、吴福先(星埜)、杨彦修、周宗祚、谢维藩(麀伯)、李固恒(少石)的题词,《桐荫授经图》有贺寿慈(云甫)、董沛、赵之谦(搗叔)、徐树铭(寿蘅)、宋延春(筱野)、胡寿椿、范鸣和、黎原超的题词。

按照张鸣珂的跋语,这些内容是李文敏陆续邮寄的,并作为附编。这些内容或许与他在江西巡抚任被劾免官、原品致休有某种联系,但作为家谱而言,这么多对撰者的歌功颂德到底还是不甚合适,因此严格说来,西乡李氏家谱只有两卷。不过如果梳理这些资料,一个活生生的李文敏将展现在后人的面前,是今天研究李文敏的极好的材料。可惜的是,这部极有价值的家谱纂成之后,西乡李氏代不乏人,如著名书法家李白瑜等;其风可谊,如李大身先生馈赠早已不存的《李文敏墓志铭》珍拓;其家藏多有稀见之物,部分归藏西乡县博物馆,但更多则散佚无存,至今未可续修其家谱。家族之传衍,家谱之续修,看来着实不易!

参考文献:

[1]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4月,第349—351页。

[2]冯岁平《一个家族的“传家之宝”——读〈刘氏家训〉》,载《发现汉中》,华夏出版社2007年。

[3]冯岁平《扫描后的历史实录——读刘鉴的〈劝孝歌〉》,载《发现汉中》,华夏出版社2007年。

[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策略》。

[5]冯庚纂修:民国《重修鲁桥镇志》卷之冯庚传。

[6]薛祥绶纂修:民国《西乡县志》第五册图书志部分云李文敏有《李中丞集》:“李文敏撰,家藏稿未见,文章志录文敏文四篇。”看来所谓这个集子,仅仅为四篇文章,且未公开付印。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

“三沈”家训研究

——以诗文、书信为中心

□谭诗民

家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国古人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是每个家庭和家族得以兴旺发达的核心要素。它代代相传一家共同的文化基因、精神内核、道德理念、审美理想及做人准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文化功能的家庭管理模式和实践机制。家训传统及其文化精神奠基于古人“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导源于实现个体梦想、家族愿望与民族目标的基本需求，它将特定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理想价值追求融入普通个体的身体力行之中。通过价值熏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等方式，家训逐渐积淀为每位成员持续而稳定的行为取向和心理定势，从而形成独具文化个性色彩的家庭教育的实践化准则及示范性文本。家训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往往通过个体的自觉践行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成为推动个人奋斗、维系家庭团结、维持社会和谐及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思想力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教化力量和文明形塑的示范文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需要幸福

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这就需要从以传统家训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通过挖掘继承和创新发展，从丰富的历史文化中总结实践经验，凝练生存智慧，发掘精神力量，进而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突出文化优势，坚定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软实力。中国近代史上“三沈”文化现象的产生，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体现，也是优良家训家风的典型文本。整理和研究“三沈”家训的主要内容、理论特色、产生条件和精神内涵，不但有助于探索“三沈”文化现象背后的家训渊源，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文化名人活动的文化根源和时代特征，更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以家训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人性、健全人格、维系社会和建设国家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经验、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家训”内涵解读

考《说文·宀部》：“家，厠也。从宀，辵省声。”按段注解：“厠，处也。处，止也。”^{[7]337}即家庭是每个人居住生活之所，

亦是每个人心灵安顿之地。个人的道德启蒙、心灵成长和生存技能的习得都是从家庭开始的，无数小的家庭最终又汇聚在一起，从而构成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质言之，通过家庭中介作用将个人的道德品行、文化修养、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同整个社会发展、国家前途和时代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深远的意义。《说文·言部》：“训，说教也。从言，川声。”段注解释：“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顺皆曰训。”^{[1]91}即“训”是将特定的思想内容或价值观念通过某种富有内在条理和逻辑顺序的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目的在于教导或教诲特定群体遵照或顺从训诫者的立场和观点。可见，家训是中国古代传统家庭，或家族长辈为教育子孙后代立德修身、为人处世、齐家治业而专门撰写的文献或形成的特定话语。广义的家训既应包括规范准则意义上的家规族约，也应涵盖教化训诫实践中的规范活动^[8]。家训是先辈个人学识、人生阅历和理想追求的集体沉淀和集中凝练，表征和反映一个家庭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人生信仰和价值理念，是一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共同携带的文化基因，所遵从的价值共识和所具有的文化标识，建构的是一个家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国人历来重教养、重德育、重家教，有良好的家训家风传统，家训历史传统悠久、思想内涵丰富。相传夏时流传下来的《五子之歌》就已经体现出家训的内容和意味，“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9]。太康

因“尸位以逸豫”而丧失国都，造成其母及弟流亡洛河之滨，他们追念先祖之德，痛思今日之失，后悔不已，各自作歌以警示后人。歌词的内容正是大禹教导其子启治理国家的内容，被部分学者视作中国最早的家训内容。西周时周公敏锐地指出当时贵族子弟显现出的六种弊端，教导其子伯禽要谦虚谨慎、礼贤下士，说：“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识，守之以浅者，智”^[10]。告诫其子德行广博宏大，能够以谦恭的态度处世，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富饶辽阔，能够以节俭的方式生活，就会得到平安；地位尊荣高贵，能够以谦卑的方式自律，就会得到尊崇；国家发达强大，能够以谨慎的心态坚守，就会获得胜利；本人聪明睿智，能够以愚鲁的态度做事，就会收获丰厚；自身博闻强识，能够以浅薄的心态自谦，就会增加智慧。训示内容全面、逻辑流畅，父辈教子拳拳之心，殷殷切切，故一直被公认为中华第一家训。事实上，尽管我国历史上家训卷帙浩繁、品类众多、形式各异，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北齐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都是我国第一部最为系统、全面和完整的家训典籍，故宋人陈振孙崇其“古今家训以此为祖”^[11]。《颜氏家训》首先阐明家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2]，即教育后辈子弟立德修身、齐家睦亲，从而确保家庭或家族平安兴旺、福泽绵延，进而以个人为中心、以家庭为起点将这种良好的精神力量和行为模式推广开来，“轨物范世”，维系社会稳定，推动国家发展。其次，《颜氏家训》系统地发掘整理、总结凝练了家训教育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实施细则。中华家训教育

的核心思想是塑造、培育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即通过“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13]，使家族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理想，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人格，从而以家庭为中介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兴亡紧密联系起来完成和达到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存历练和理想境界。其主要内容包括道德智力、家庭伦理、齐家治业、奉公报国以及养生保命等各个方面，其主要措施则是将价值熏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最终将家训的价值观念和具体内涵刻画在每个成员内心，形成一种自觉、系统而有度的行为模式。再次，《颜氏家训》开创了我国家训典籍的著作体例和文体风格。其所提炼的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处事养生、杂艺知识等几个方面的教育历代家训虽有所损益，但仍囿于这个范围。其语言平时又不乏文采、论理精辟却不缺亲切、事例丰富而不失恰当为历代家训作者所推崇和效仿。明人傅太平就赞其“质而朴，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14]最后，《颜氏家训》经历代翻刻和阐释，其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力巨大。颜之推后，历代家训典籍层出不穷、百花齐放。有帝王君主传授后任经世治国的，如唐李世民《帝范》、清康熙《圣谕广训》《庭训格言》；世家贵族训诫子孙齐家治业的，如唐柳玭《家训》、宋司马光《家范》、袁采《袁氏世范》、明庞尚鹏《庞氏家训》、吴麟征《家诫要言》、清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孝友堂家规》，朱柏庐《治家格言》及曾国藩《家书》等；也有普通百姓引导子侄为人处世的，如宋陆游《放翁家训》等。就形式而言，既有专门的家训著作，亦有具有家训内涵的诗文及涵盖

家训思想和理念的书信。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们当前家庭建设和文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掘整理和创新继承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二、“三沈”家训的特征及其产生条件

（一）“三沈”家训的内容及其特征

“三沈”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长于陕西汉阴，是汉阴沈氏家族众多支脉中重要的一支。据学者考证，明天顺五年（1461），沈株山（字寿官）致仕返乡“经川东北和陕南之汉阴，为当地山川地貌及自然环境所吸引”，“遂举家定居于汉阴厅在廓里之牛溪河”^[15]，成为迁陕沈氏始祖。自此，沈氏居陕近560年，历20余代，至今人口已达3万多。目前所见《沈氏家训》是由八世祖沈祖烈于清乾隆54年（1789）主持编撰。全文共20条1933字^[16]，凝练概括为“耕读传家，崇尚蒙养，渊德懿行，仁和谦让。”《沈氏家训》是沈祖烈在遍览先贤史料和祖宗家法的基础上，结合个体人生经历、合族众议的智慧结晶。它对祭祀、侍亲、亲情、治家、嫁娶、教子、睦邻、德行及为官等多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既有先贤谆谆教导的汇编，亦有祖辈殷殷祈盼的凝结；既有经世致用的经验，亦有伦理道德的训示，是沈氏家族传承父祖精神、聚拢本族人心、维系家族和谐的基本准则和兴业起家、发展壮大的重要根基。“三沈”作为沈氏家族最为杰出的成员，虽无完整、系统而明晰的家训著作传世，但以其丰富的诗文著作和人生活动践行和诠释着沈氏家训，同时也不停地发展、开拓和创新着沈氏家训。概括起来，“三沈”所体现、诠释和践行的家训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以德为本、志行高远的修身之道

中国人历来重视个人道德品性的修养，

视德为事业之基、居家之富、修身之本，而“积德者不倾”，故《大学》总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7]4。《沈氏家训》也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要求“敬以持己，恕以接物。视听言动，决去非礼；喜怒哀乐，务求中节。”因此既是祖辈所保有的愿望，亦是子孙所效仿的榜样。传统家训中这种“养德为立身之本”的价值观念来源于儒家文化对于人的社会属性的较早认识和理论自觉。诚如马克思发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家思想较早就对人的社会属性有较为清醒的思想认识和自觉的理论把握，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群体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获得稳定的生存和长足的发展。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它弥补自然属性的不足而使人成为万物之长。其中，道德是人的本质属性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所在，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伦理而已”^[18]。儒家思想从伦理角度出发，给予社会关系的道德属性以极大的关注，从理论上将这种社会关系概括为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的“五伦”。个人要在这种充满道德的伦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要把这种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内化成个人品质，成为一种德行活动践行于世。由于所处的时代语境、价值立场和理论角度不同，历代先贤对“德”这个家训核心概念的阐释是不同的，有以全生为德（曾子），有以节俭为德（诸葛亮《诫子书》），有以谦恭为德（羊祜《诫子书》），有以忍让为德（吴汝纶《谕儿书》），这就造成了后世对“德”的不同理解，从而也就促成了修身立“德”的不同途径和价值取向。

“三沈”尤其注重个人道德品格和思想境界培养，将个人志向的确立和能力的提升同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联系起来，从更为开

拓的视野中达到个人完善和国家命运同步。这从他们的诗人和书信中可以得到佐证。沈尹默很注重恬淡性情的修成和独立人格的培养，在其早期多首诗词中体现了这样的德性追求。如“险巖詎所安，清旷乃足喜。处境难具良，得半亦云已。……所贵精神完，焉可议形似。挟艺事权要，志士亦足耻。吾辈荣浮名，有如长江水。”（《小斋兀坐感旧咏怀，寄远兄兼弟并呈星姊》）“阶痕滋碧藓，雨气熟青梅。闭户成幽隐，出门非世才。……尊酒平生意，旁人莫浪猜。”（《梅雨独坐呈陈刘二子》）“平生飞动意，何事在蒿莱？欲尽深尊酒，终惭贤圣才”（《久雨》）等，都很好的体现了作者恬淡性情的追求。沈尹默也很重视独立人格的培养，这体现在他对文章的慎重和对书法的创新上。他认为作文应慎重，需要有独到的见解和独立的思想，而非人云亦云，邀功谄媚，即“江湖千日酒，文字百年身”（《赠梦坡》），“文章间业成虚语，得失终关一寸心”（《赠季刚》）。被誉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兼具新诗的美德”^[19]的《月夜》诗中那个遗世独立的“我”正是追求独立自主和个性自由的诗人自身的真实写照，故唐弢先生说：“那个在霜风明月中与高树并立的‘我’的形象，也显露了当时个性论者的精神特征”^[20]。在书法上，沈尹默师法“二王”、熔铸欧褚、博采众长，最终创立了“沈体书法”，并结合自身习字心得创立了“执笔五字法”，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三沈”以德修身、志行高远的家训的良好体现和践行。

2. 端蒙重教、孝亲睦家的居家之道

家训教育作为一种有别于国家教育、社会教育的民间教育方式，历来受中国人的重视和提倡。优秀的子孙是家庭得以延续和兴旺发达的根本保障，而为每个孩子上

好人生第一课，为其未来人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德性基础和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是每个家族祖辈的殷切期望。家庭教育在个人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劝勉子弟读书的故事和诗文，如孟母三迁、断杼教子、悬梁刺股、映雪聚萤等。清人孙奇逢更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21]。颜之推指出，孩子在小的时候天性真诚、精力集中，有如“日出之光”，容易通过教育浸染点缀，从而先入为主、自然形塑、养成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逐渐精神散逸，这个时候再教育效果就有如“秉烛夜行”，大不如前。所以，应该端蒙重教，重视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和合理的德性教育。《沈氏家训》亦重视对子孙的教育，要求教子以严，通过以“义方”为内容的道德警示使子孙后辈不至误入歧途；养女需训，通过以“妇德”为内涵的伦理训诫使女性后辈能够宜室宜家；择师要慎，通过对德行高洁、知行合一的良师的选择给子孙后代形成榜样效应。在齐家治业上，《沈氏家训》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要求子孙要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在处理家庭关系中，要求子孙祭祀以殷、侍亲以孝、兄弟友爱、长幼有序、谨慎择偶。概括起来，即重视对先祖功业的感怀与精神的传承；重视对血缘亲情的依恋与奉献的感恩；重视对夫妻关系的联系与情感的和谐。这些在“三沈”的诗文和活动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和发展。

“三沈”很注重教育家庭教育，“养子固来习，宁贻嫁时羞。群趋遵大路，陋巷方仄幽。”（《秋明室杂诗》二）这既有祖辈的榜样示范，亦有自身的学习自觉。沈尹默曾因背不出来书而急得生了病，休养期间仍坚持读《红楼梦》、唐人诗选、袁枚著作等，这些都深刻影响其以后的学术志趣和研究方

向。沈尹默告诫后辈读书需坚定信念，不为外物所动，“轻浮矜一知，文字黠者衒。……有书如无书，识者同一叹。”（《秋明室杂诗》四）；长久浸淫，细品个中真味，“读书无近功，浸淫义乃见。简编三绝韦，意精易可赞。”（《秋明室杂诗》四）全面涉猎，做到知行合一，“全知既不易，安行良独难。可由不可知，图始理则然。”（《秋明室杂诗》五）。“三沈”祖籍浙江吴兴，长于陕西汉阴，一生都与此两地有着割舍不开的情缘，充斥着对两地的追忆和怀念。沈兼士曾作诗，“漠漠清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22]。怀念幼时随宦陕南，与兄妹登山揽胜，切磋短长的美好时光。沈尹默《忆湖州》一诗回忆了湖州美好的景色，抒发了他乡为客的寂寞心境，充分地体现了“三沈”追本溯源、不忘初心的家教传统。“三沈”亦重视对长辈的孝敬和兄弟的友爱，并将这种良好的家训家风作为实际行动落实到自己的生活 and 行为中。由于长期在外求学和工作，“三沈”陪伴母亲时间有限，1933年母亲去世，所撰祭文详细回顾其克服种种困难，含辛茹苦培养子女成人的艰辛历程，表达了对母亲离去的不舍和未能生前侍奉尽孝的难过与自责，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沈尹默也有多首诗文表达对故去亲人的思念和兄弟间因忙碌不得相见的感慨。如《小妹》借梦中看到小妹的各种幻境的建立和破灭，表达对亲人故去的难以置信和深刻眷恋；《思佳客——偶然作寄兄弟姊妹》借追忆儿时追逐嬉戏，共赏盛景的美好过往，寄托“归心已共春波远，离绪还应草树知”的离愁别绪；《云君病中，属儿辈寄书促归，因赋此以慰之》借幻想夫妻弄儿为乐，嘱妻安心养病，表达“待我归来春未半。相见。从新花月作生涯”的思念。这些诗文中

安康文化 2019.3

所体现出来的家训精神和家风文化，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刻体会的。

3. 仁和谦让、身系家国的处世之道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仁和谦让是最为重要的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孔子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告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章句上》），宋袁采教导“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23]，清吴汝纶也认为忍让是居家美德。《沈氏家训》告诫子孙要讲求忍让，不可好勇斗狠，违背父母意愿；为人要低调，行为要有度，不可刻薄寡恩，恃强凌弱；要讲求邻里关系和谐，相互扶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并且将这种仁义之风传播扩散，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三沈”仁和谦让的处世之道可从教授学生的方式和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窥见一斑。沈兼士师从章太炎，朴学成就非凡，却不以此自矜，反以此自勉，虚心求教、刻苦钻研，一生有多篇高质量论文传世，其所编《广韵声系》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力作。他教学耐心细致，注重照顾学生的理解和爱好，将知识性与趣味性、枯燥的学术问题和生动的案例结合。据学生回忆，在讲授“划”的意思时，他就列举了古代“划马”一词和李煜词“划袜步香阶”的例子来帮助学生理解，把乏味的考据形象化、生动化，深得学生喜爱^[24]。沈尹默书宗“二王”，取法欧褚，熔铸百家，成就斐然。少时因未得名师指点，难免走过弯路，曾受到陈独秀“诗做得很好，字其俗人骨”的批评^[25]。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埋怨陈独秀，反而听取了他的批评和建议，从源头上反思自身书法缺陷，下大力气改正，从而成就了“沈体书法”的辉煌，也建立和陈独秀长久的友谊。“三沈”待人接物虽仁和谦让，低调从容，但面对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时，却能够身系

家国，坚持原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沈尹默早期表达了立志为国出力的决心和祈盼全新时代的愿望，“篋中尚有能鸣剑，未是风尘大可哀”，又“会须一洗箏琶耳，来听江湖澎湃声”（《即时偶占二首》）。《孤愤》诗针砭时弊，表达了对江河日下而无救世能人的悲叹，“独怜乌鹊群飞意，谁挽江河日下心。孤愤终朝成抵几，故情从古惜亡簪”；《颐和园》诗反思历史，抒发了对大厦将倾空有昏聩君主的遗憾，“海空楼榭销兵气，人去亭合峙夕阳。七国三边忧不到，宸游真不系兴亡”；《答季刚》诗痛心“多少东山携妓客，何曾挥涕为苍生！”沈兼士于文字考据、音韵训诂和文献整理多有成就，曾多次为维护珍贵文献资料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清宫档案整理和《四库全书》保护上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些都成为“三沈”优秀家训的体现和践行。

4. 奉公廉洁、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

传统社会中家族子弟入朝为官的多寡及官阶的高低直接决定此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兴旺程度，加之目前所存绝大多数家训文献是由历史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历史影响的名人撰写整理的，故家训中多有关于教育子孙为官之道，告诫子孙勤政廉洁的内容。如明薛瑄所列“居官七要”即为“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26]欧阳修也告诫子孙“廉而好施，决不妄取”，曾国藩更是明确说“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除了廉洁自律，保持清白之风外，传统家训要求为官要有所作为，即要以人文本、勤政爱民。《沈氏家训》要求子孙首先要克己奉公，国家所要求的钱粮赋税要第一时间积极主动完成，这是保有家庭，免遭责难的基础；其次要为官清廉，对上要循分尽职，对下要周济穷难，不思中饱私囊，不做“衣冠盗贼”，而

要“致君泽民”。明清之际，“三沈”祖辈世代为官，多乡贤名宦。光绪版《定远厅志》第十八卷“职官志·官师”录沈际清，评其“贞诚朴实，有长者风”，民国版《汉阴县志》第三卷“汉阴历代行政官吏一览表”录沈祖颐，评其“政尚简易，不事矜张”。“三沈”父亲沈祖颐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给地方人才培养大力支持，最后积劳成疾，得进当地“名宦祠”。“三沈”继承和弘扬了这种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优良家训，并在工作中不断地践行着这一精神。作为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三沈”不同程度担任了当时政府的重要职位，即使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而贪墨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沈兼士主持清理清宫档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直至最后病逝，从来清清白白，为我国珍贵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沈尹默心系我国书法的传承和发展，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向领导人献言献策，建立书法协会，培育书法新人。

（二）“三沈”家训产生的条件

“三沈”家训的产生和陕南特有的文化类型，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沈氏悠久的家族传承分不开，是此三种文化形态相互融合生发与传承创新的智慧结晶和文化表征。

1. 得益于陕南文化的不断滋养

陕南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地处秦巴腹地深处，连接雄秦秀楚，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南北文化大融合的交汇地带。境内青山绿水、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既是中国历史上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亦是稻菽和蚕桑等农业文化兼做并蓄的地方。明清以后随着湖广移民的大量融入，这里成为关陇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氏羌文化的荟萃与儒、释、道、回文化多元发展之地。《兴安府志》风俗篇称汉阴“人民勤劳，境无荒土。游惰少年，引以为耻，

激而务正，故野无惰农。虽富室无挥霍者，民皆朴实节俭。”“三沈”性格气质的养成和文化心理的塑造同这种环境的影响分不开，其后辈谌北新总结道：“‘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食住行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练出来的”^[18]¹⁸¹。具体而言，陕南多移民聚居，造成“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形成各种具有不同语言特征的“方言岛”，成为进行方言调查和音韵研究的宝地，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沈兼士朴学研究的兴趣及最终的学业志向。陕南所在秦巴山区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这里道观林立、流派众多、信徒广布，是“抱瓮羞机”等道教故事的源生地。沈士远受道教文化影响，深研《庄子》，造诣颇深，也成就了“三沈”仁和谦让的处世之道。安康自古诗文鼎盛、民歌流行，书法大行其道，碑学流行、众多家并存、尤重欧体，在奠定沈尹默书法爱好和宗法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其博采众家之长，推陈出新的契机。质言之，明媚秀丽、封闭自足的自然环境养成了“三沈”自然恬静和仁和谦让的性格气质；多元复杂、流动异变的社会构成培育了“三沈”开阔的眼界和包容的胸怀；崇文重教、多元汇聚的人文环境激发了“三沈”兼收并蓄和推陈出新的勇气，从而成就其后熔铸中西、新旧文化，进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根源。

2. 得益于儒家思想的深层浸润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而奠基家训文化且在中国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家国同构”观念正始于儒家。有学者指出：“家训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民间版本，家训使儒学从高雅的理论王国下凡到平常百姓家，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27]在《论语·为政》中有一段关于孔子对于齐

家和治国关系的精辟对话，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1]59}可见，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能够做到侍亲以孝、兄友弟恭，即把家庭团结好、治理好，就是参政治国，而这些治理家庭的原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国家政治。是故《大学》总结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11]3}，修齐治平的层层递进阐明了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国家与天下的重要联系，从而成为追求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和天下太平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和进阶次序。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核心概念是“仁”和“礼”。仁者爱人，即通过对自我的发现和肯定，推进到对他人的认可和关爱，进而拓展到对万物的承认和尊重，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追求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和天人合一的境界。“礼”即要求在天、地、君、亲、师五个层面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个方向确定一定的秩序，敬畏天地、忠君爱国、孝敬父母、尊师重教、和睦家庭、慎重择友。这些在“三沈”家训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3. 得益于沈氏家风的长期熏陶

“三沈”祖籍浙江吴兴竹墩，后父祖仕宦而迁居汉阴，故内心深处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江南士子文人的性格气质和文化追求。光绪版《归安县志》第六卷“輿地略六”载“竹墩，与前邱相去里许，沈、朱二姓多习儒业。明以来，科名蔚起，自东至西，清溪曲折回抱。”沈尹默在《自述》中回忆其曾祖父沈鲤跃“终身清苦，课徒为生，冬夏一床席，无钱买书，尝手抄经籍，授子姪辈诵习”^[28]，自己幼年时还能够见到其小楷手书的《尔雅》。祖父沈际清更是才思敏捷、

顷刻成章，且“酒酣辄手不停挥”。有遗作《赏桂》保存在定远厅正教寺壁，自己少时学书，即从钩摹祖父提诗开始。父亲沈祖颐酷爱历史、亦喜属文，却为文谨慎，于书法一道用功尤勤，造诣颇深。父亲虽忙于公事，但无形中给自己的熏陶很大。父祖的经历给“三沈”形成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三沈”也充分的传承了这种文化基因和家风传统。沈氏兄妹几人读书十分刻苦，且珍惜时间，手不释卷，常常“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待父公事之余，点评短长。

三、“三沈”家训的现代意义及其传承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和文化现象，“三沈”成就和贡献的取得同其良好的家训家风是分不开，故我们不但要从多种角度来合理地解读其家训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更要在面向现实需要和时代问题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创造性的传承和发展，从而使其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一）“三沈”家训研究对童蒙教育的启发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三沈”家训特点之一，亦是其给我们首要的启示是重视对童蒙的教育。首先，教育要融入实际的生活。“三沈”家训既有详细的文本内容，语言平实、言辞恳切，亦有凝练的文字概括，形式工整、简洁易记。内容都是有关孝敬长辈、亲和兄弟、交友择师和勤学修身等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对孩子自小立志坚贞、处世谨慎、学习勤奋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次，教育要重视榜样的力量。“三沈”祖辈多习文为主，世代为官、名人辈出，故而家庭文化底蕴浓厚，诗书传家传统悠久，祖辈的经历和教诲对他们人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祖父沈际清“贞诚朴实，有长者风”，为学刻苦，精于诗文，其所提《赏桂》诗既是激发“三沈”诗

文创作的源泉，亦是奠定其书法志向的根基。父亲沈祖颐才思敏捷、尤工书法，勤政爱民、“尤拳拳以兴学育才为急务”，最后因积劳成疾，得进地方“名宦祠”。沈尹默说道，“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到薰育”，并回忆了自己幼年学书苦无良师，走了不少弯路，后见父亲欧体书法，颇为喜爱，得窥门径，并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祖父题字，进一步转益多师开始了自己的书法生涯。显然，父祖的示范效应更为直接和形象地影响了“三沈”日后的人生历程。最后，教育要营造轻松的氛围。由于陕南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教育文化相对落后，加之父亲常年游宦在外，“三沈”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校教育和规则约束。在这种秀丽的自然环境和轻松的家庭氛围中，“三沈”兄妹欢聚一起，学作韵语，进而连词成句，切磋交流。其父得空则加以点评，比较短长。这种良好的习惯和轻松的氛围一直保持了较长的时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后来沈尹默的多首诗词中仍可以见到其兄妹相和的场景，如《寒雨催秋重阳近矣，即时感怀与星姊联成四韵，寄士远、南浔、兼士、东京》《小斋兀坐感旧咏怀，寄远兄兼弟并呈星姊》《重九病卧忆兄弟，前年是日雨，在长安与姊联句寄怀，因成一律》。自然环境的钟灵毓秀和家庭文化的温馨和谐交相辉映，最终成就了他们仁和谦让的心境、兼容并包的胸怀和扎实丰厚的学识。

（二）“三沈”家训研究对社会风气的引领

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支柱，将个人的发展同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主张在个人道德修养和能力提升的基础上，近从和睦血亲，远则联系社会，共建家国，从而达到天下一家、万世太平

的理想境地。陈独秀说中国社会其实是一个以“家族本位”的社会，“国家组织，一如家国”^[29]；梁簌溟说“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30]；费孝通比喻说“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个人就是那个石头，而家、国、天下就像一圈圈波纹，都强调了家庭在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之间重要的中介地位和作用。可见，家庭作为联系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中介，既是个人得以安身立命和道德修养的场所，亦是参与政治和治理天下的起点，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教传统，地位显得十分重要和关键。事实上，中国人对伦理道德的思考和理解，正是从微观的家庭领域到宏观的社会领域对种种利益关系的多维综合审视和辨析的结果。从孝亲始，逐渐地向仁、义、忠等范畴拓展，最终将整个社会结构纳入到庞大的血缘道德体系中^[31]，将血缘情感、家族主义和伦理本位的文化情结与社会结构相粘结，从而突破家庭的简单关系，涵盖到个人与他人、社会及国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与家族文化是合拍的，只不过儒家学说将原始群体的基本精神系统化和理性化了，并作了更高层次的归纳和提炼，使其成为一种比家族文化适用更大的观念系统，用以治理社会。”^[32]“三沈”家训中的“耕读传家，崇尚蒙养，渊德懿行，仁和谦让”正是中华民族“家国同构”思想的表征和丰富，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才能保证个人的道德养成、家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盛不衰，当然也就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故有学者评价沈尹默说：“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声望及人格魅

力，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乃至全国，沈尹默影响并团结了一批心仪帖学的书法家。……在沈尹默的带动下，潜心研究帖学，形成了‘回归二王’的潮流。……经过他们的重新阐释，一度萎靡不振的帖学在新的时代得以复活，千年经典重新回到经典的位置，帖学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沈尹默作为这个联盟的盟主，可谓功不可没。”^[33]

（三）“三沈”家训研究对学术探索的推动

“三沈”不同程度地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沈士远是著名学者，其《庄子研究》颇有心得；沈尹默是著名书法家，其“沈体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且还有《沈尹默论艺》等理论著作传世，他还兼文学创作，新旧文体交替融合，《月夜》诗更是被认为第一首新诗；沈兼士是著名音韵学家，其代表作《广韵声系》和多篇学术论文产生深远影响，参与保护与整理清宫档案更是开创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风气之先。“三沈”既是文化名人，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诸多革命运动和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三沈”文化现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值得我们多种角度，多元方法进行探索和解释，而从“三沈”家训渊源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是一种比较新颖和可靠的方式。事实上，从家训和家学角度来解释文化现象和历史事件已有一定基础和案例，陈寅恪就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有官学转移到家族，即“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34]²⁰，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于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28]²⁶⁰。学者郑欣淼在文章中探

索了中国家族文化的风采与转型，特别是浙江籍文人群体和江南世家大族传统对北大“三沈”文化现象形成的渊源和意义^[35]。这一思路启示我们可以从研究“三沈”家训开始，了解其为人处世、生长环境、家教传统和文化遗产，从而对“三沈”人生成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三沈”文化贡献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进而对“三沈”历史意义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四、结语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和细胞，中国的文化传统、文明基因主要是以家庭或家族的形式不断接续、薪火相传的^[36]，国家的复兴需要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需要和睦的家庭，和睦的家庭离不开优秀的家庭文化。中国近现代史上陕西汉阴“三沈”现象的产生，是优秀家训实践的典型文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质言之，家风好，则家道兴旺、国家昌盛；家风差，则家道衰落、国家疲敝。在物质生活无比丰富和教育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我们更应该重视优秀家训和良好家风在家庭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复兴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重视其所体现的传统美德、哲学意蕴和伦理内涵；重视家训文化的不断传承与创新及其在新时代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能量。挖掘和阐释“三沈”家训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将之同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建设中来，创造、发展和践行社会主义新家训、好家风。

参考文献:

- [1] 许慎.说文解字注 [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 陈延斌.中国传统家训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评析 [J].孔子研究,2017(5):137—144.
- [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7—179.
- [4] 韩婴.韩诗外传集释 [M].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117.
- [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 [M].徐小蛮,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05.
- [6] 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 [M].王利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
- [7]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0.
- [8] 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 [M] //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47.
- [9] 陈良学.明清大移民与川陕开发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374—375.
- [10] 樊建武.刍论陕西传统家训文化及其现代价值转换 [J].理论导刊,2017(9):97—100.
-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2] 薛瑄.诚子书 [M] //包东坡,选注.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192.
- [13] 北社编.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 [M]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2.
- [14]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93.
- [15] 孙奇逢.孝友堂家训 [M] //包东坡,选注.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296.
- [16] 谭平.镇巴史话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227.
- [17] 袁采.袁氏世范 [M].北京:中华书局,1985:3.
- [18] 沈长庆.沈尹默家族往事 [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
- [19] 王岳川.重新审视沈尹默与陈独秀的一段公案 [J].中国书画,2009(12):64.
- [20] 陈生玺.治国明鉴(下)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722.
- [21] 王金水.传统家训思想通论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 [22] 沈尹默.沈尹默自述 [J].文教资料,2001(4):3—5.
- [23]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J].青年杂志,1915,1(4):10—13.
- [24] 梁簌溟.中国文化要义 [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80.
- [25] 余仕麟.忠孝伦理:中国人的一种智慧生存方式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12):82—86.
- [26]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4.
- [27] 李一,刘宗超.共和国书法大系第1卷·书史卷1949—2009 [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75.
- [2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9] 郑欣淼.三马、三沈、三俞及四朱——浙江籍文化家族与故宫博物院渊源初探 [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6):6—23+157.
- [30] 程方平.植根在民间的家训、家规、族规 [M] //俞家庆.儒学齐家之道与当代家庭建设.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255.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传统家规家训中的廉洁思想

□ 王丽芳

安康文化 2019.3

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明确要求：“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以党内纪律规矩的方式，首次将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将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思想的养成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建设结合在一起，可见优良的传统家规、良好的家风、家教对党风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家规、家训则是家风、家教的载体。家规、家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传统家规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德育思想精华，其中廉洁、廉政在历代家规家训中都备受重视。廉洁是个人品行修养的重要内容，廉政是从政人员的道德要求，二者对新时期党员干部廉洁奉公品质的培养有重要意义。传统家规家训中的廉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士有百行，以德为首”——推崇德育

《三国志》有言：“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几千年来文人学子多重视自身品德的养成、注重以仁、义、礼、智、信等为核心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在很多优秀的家规家训中也以此来要求家族子弟的品行。《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提出了儒家价值体系中重要的“三不朽”的理论，并且将“立德”放在“太上”之功的首要地位。《礼记·大学》中载：“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被儒家视为做人的根本，是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基础。因此，姬旦《诫伯禽书》教育儿子：“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颜氏家训·省事》提出：“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教育子弟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而等待用世的机会，《颜氏家训·勉学》教育子弟读书治学的首要目的为“欲其多知明达尔”“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琅琊王氏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以信、德、孝、悌、让等传统美德来涵养子弟。司马光《家范》中主张效仿古代圣贤“遗子孙以德以礼”。倪思在《经锄堂杂志·子孙计》中指出：“君子岂不为子孙计，然其子孙计，则有道矣。种德，一也；家传清白，二也；使之从学而知义，三也”，将德作为子孙安身立命的根本。刘沅在《寻常语》中也指出：“教在修德，德在修心。”诸如此类家规家训数不胜数，从古至今有识之士都将“以德为首”作为教育子孙的重要的教育理念，以此来教育子孙修身立德。廉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的内涵之一，共产党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道德素养才能做到廉洁奉公。

二、“每餐一食，则念耕夫”——崇尚节俭

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有云：“每餐一食，则念耕夫”。唐代李商隐《咏史》

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克俭节欲不仅对个人修德、家族传承至关重要，并且对国家的政治廉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崇尚节俭，反对奢靡浪费成为传统家规家训中的重要内容。《周易》曰：“君子以俭德辟难”，《春秋》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增广贤文》：“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都强调了“俭”这一品质的重要性。诸葛亮在《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将俭与德的联系起来。《颜氏家训·治家》非常推崇孔子的“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并进一步对北方的节俭，南方的奢侈作对比，突出强调节俭的重要性。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其子司马康：“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在《家范》中又提出“遗子孙以廉以俭”的思想。纪晓岚《教子之术》提出四戒：“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朱柏庐治家格言》中警醒世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装”，不仅强调了节俭的意义，并且对如何节俭对做了一番阐释。《曾国藩家书·致四弟》：“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

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平费，周济人情，亦有一俭字意思。”个人而言，俭乃修德立业之根；对家庭而言，俭乃持家传家之本；对国家而言，俭乃养廉兴国之基。传统家规家训中的节俭观对于形成良好的家庭风气和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党员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更应该避免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秉承勤俭朴素的优良传统。

三、“非礼之利，不入于家”——追求清廉

田母教导田稷：“非义之念，不萌于心。非礼之利，不入于家”。从政为官，清正廉洁是最基本的原则，是从政为官的根本。从上古时期有官吏出现开始，人民群众就将是否清正廉洁作为判断官吏及其从政行为善恶重要的、普遍的评价标准。传统家规家训一方面倡导公私分明的人生观，重在塑造淡泊明志的襟怀；另一方面倡导清白传家的价值观，意在培养自立自强的精神。孟子有言：“养身莫善于寡欲”。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戒子歆书》劝诫儿子刘歆为官应谦虚谨慎。崔崔元暉的母亲卢氏常常告诫儿子：“子始仕官，有言其贫寒不自存，此善也。若货货盈衍，恶也。吾尝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仕者，务多财以奉亲，而亲不究所从来。必出于禄廩则善，如其不然，何异盗乎？若今为吏，不能忠清，无以载天覆地，宜识吾意。”欧阳修严厉批评其侄：“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欲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守此为戒也。”包拯在晚年为告诫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与其“清官”形象交相呼应。明代官员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严约束》中

说：“田地财物，得之不以义，其子孙必不能享。古人造‘钱’字，一金二戈，盖言利少而害多，旁有劫夺之祸。其聚也，未必皆以善得之；故其散也，奔溃四出，亦岂能以善去，殃其身及其子孙。‘多藏必厚亡’，老子之名言，信矣。人生福祿自有定分，惟择其理之所当为、力之所能为者，尽其在我，俟命于天。此心知足，虽蔬食菜羹，终身有余乐；苟不知分量，曲意求盈，虽欺天罔人而不顾，有不颠覆者乎？若能勉给岁月，不以饥寒遗子孙，此身之外，皆为长物，何自苦为？”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国家危难时留下了“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的家训联。这些廉政为公的官员不仅严于律己，并且从自身经验出发留给子孙以肺腑之言。在新时期党员干部更要充分学习并继承发扬古人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管好自身的同时，约束好身边人。

四、上思报国，下思造家——爱国济民

袁了凡《了凡四训》：“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为百姓认可称颂的官员不仅严格约束自身、廉洁从政，并且能勤政爱民、秉公执法，具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信念。传统家规家训将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强调勤政爱民、修己安人、家国天下的社会责任感。《颜氏家训·涉务》：“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

守一职，便无愧耳。”教导儿孙从实际出发做利国利民之事。《何氏家训》：“从小当立安邦志，睿智造福天下乐”，倡导从小培养造福天下苍生的理想抱负。《钱氏家训》则强调“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范仲淹始终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曾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国藩教导子孙“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将廉政爱民看为分内之事。胡林翼名言“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将自己摆在了仆人的地位，立志为民做官。义门陈氏《家范

十二则》：“忠群国：即叨登进之荣，毋负生平所学。良臣循吏，岂伊异人，国计民生，胥关分内”将国计民生看作分内之事。《梁启超家书》：“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事可做了”，教育女儿梁思顺要多考虑大局大众，并竭尽全力。这些家规家训直到今天仍振聋发聩，值得每位党员干部深思。

总之，在卷帙浩繁的传统家规家训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闪耀着光辉，对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行为的养成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文化信息◎

安康市着力打造“乡村文化理事会暨乡贤读书会” 特色文化服务品牌

根据安康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总体规划和“新民风建设统领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设计”研究方案，7月13日-14日，安康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制度设计课题研究专家组成员、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刘亚玲研究员一行4人赴我市紫阳县开展“乡村文化理事会”和“乡贤读书会”试点建设和普法宣传工作。7月14日上午，根据市创建办“补短板、抓创新、做示范”重点工作部署，紫阳县蒿坪村如期举行了“乡村文化理事会暨乡贤读书会”筹备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两会”章程，标志着我市打造“乡村文化理事会暨乡贤读书会”特色文化服务品牌步入实质性阶段。

会上，刘亚玲研究员以古鉴今，详细阐释了建立“乡村文化理事会”和“乡贤读书会”的重要意义，指出以我市紫阳县蒿坪村为代表的一大批重教兴文传统村落具备打造

特色文化服务品牌的良好基础。下一步，我市将大力推广紫阳县蒿坪村试点经验，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新乡贤，尤其是年轻乡贤的作用，让文化教育、全民阅读真正成为激活安康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深化安康新民风建设，全面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特色文化服务品牌助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据悉，我市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以来，相继形成了“文化小康行动”“百姓大舞台”“安康节拍”广场舞、“阅读起跑线”社会力量帮扶项目等一批具有“安康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其中，“安康节拍”广场舞被列为全国示范品牌，“文化小康行动”志愿服务项目面向全国推广。系列特色文化服务品牌的打造，为全国贫困地区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升公共文化供给水平提供了“安康经验”。

（公共服务科）

“紫阳民歌文化生态及功能研究”研究报告(上)

□戴承元

一、紫阳民歌研究现状

(一) 紫阳民歌概说

紫阳因道教南派创始人紫阳真人张伯端而得名。地处陕西南部，汉水上游，大巴山北麓，东邻安康、西接汉中，北连汉阴，南与四川、重庆接壤。境内万山综错，河溪密布，汉江自西北至东南横贯全境，任河由西南向西北注入汉水。汉江、任河将全县分割为东南部大巴山区、西南部米仓山区、北部凤凰山区，加上蒿坪河川道，从而形成了紫阳“三山两水一川”的地貌特点。紫阳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歌之乡。紫阳民歌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紫阳民歌是产生流传在陕西省紫阳县境内民间歌曲的总称，是陕南地区民歌中最具代表的曲种。《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共收录传统民歌598首，其中紫阳民歌就有96首，足见紫阳民歌在陕西民歌谱系中的地位。紫阳民歌内容丰富，有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社火歌曲、风俗歌曲、新民歌等；演唱形式多样，或一人独唱，或两人对唱；语言形象生动，情趣诙谐，幽默含蓄；曲调委婉舒展，有高腔、平腔之分，感情柔和细腻，多有川楚之风，具有鲜明的艺术特

色和地域风格，是紫阳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创造出来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

紫阳民歌可细分为“山歌”“小调”“风俗歌曲”“花鼓八岔”“号子孝歌”和“新民歌”等十几个曲种。紫阳民歌大多有着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和舞蹈性，适于表现复杂的动作情节和人物感情。劳动号子是紫阳民歌的基础，而船工号子是劳动号子的内核，在紫阳民歌中占有重要位置，风格粗犷豪迈，音调、节奏复杂多变，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船工号子、装卸号子、搬运号子多传唱于汉江、任河、渚河、汝河等沿岸一些较大的集镇，如：城关、洞河、向阳、焕古、汉王等地。抬石、打夯、抬丧主要流传于低山区。山歌指劳动号子以外的各种山野歌曲，是最能代表山区特点的民歌，山歌歌词有很多是在劳动中即兴创作的，见景生情，随编随唱，大多是表现爱情的。除县境内蒿坪、汉王外，各地均有山歌传唱。小调和山歌一样量大面广，歌词较为固定，其风格特点是曲调细腻流畅，旋律优美动听，节奏平稳细碎，音域较窄，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个人感情色彩。小调遍布全县，在低山、川道流布最广。风俗歌曲是流传较广的民间口头文艺形式，是一种即兴创作歌曲，见啥唱

啥,想啥唱啥,是反映紫阳人民生活习俗的歌曲;新民歌是新时代和新生活的产物,是当代以来编创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较浓政治气息的新创紫阳民歌。风俗歌曲在紫阳全境均有传唱,但数量不多。

紫阳在明清两代移入的客民“以鄂、川、湘、皖人居多,赣、豫、闽、粤人次之。”考察紫阳民歌的音乐风格,可以发现,在与四川山水相连,四川移民比较集中的南部高山区,高亢明亮、拖腔悠长、尾音下滑,具有浓郁四川民歌特色的紫阳山歌号子、山歌调子随处可见;而擅唱小调的民间歌手却多集中在汉江流域的汉城、焕古滩、城关镇、洞河镇一线。这里交通便利,农业灌溉条件较好,商业繁荣,正是两湖、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移民的聚居地。特别是在汉江沿岸的各个集镇,聚居着大批来此经商的两湖及江南商贾的后裔,这里所传唱的小调歌词,相当一部分都反映了市民生活情调。这里的小调音乐,具有音调平和、旋律优美、柔丽婉转的南方音乐特点,与用假嗓演唱的高亢明亮、音域宽广的山歌号子、山歌调子形成鲜明对比。以紫阳民歌为典型代表的陕南民歌这种“北地南腔”“南北融汇”特点的形成,应当说与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紫阳民歌藏量极为丰富,所发现曲目总数已达5028首,编印成册的有828首,体裁包括号子、山歌和小调几大类,其中又包含了社火歌曲、风俗歌曲、宗教歌曲、曲子等不同歌种。紫阳民歌的代表性曲目有《郎在对门唱山歌》《唱山歌》《洗衣裳》《南山竹子》等。

(二) 紫阳民歌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民歌的现代研究从起始至今大约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段:第一时段是起步阶段,起始于上世纪20年代,是国内学者受

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西方理论原则指导下,开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学主要形式之一的民歌,自然成为研究的内容,其时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着力建设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理念,主要从事西方民间文学论著的译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虽然也有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刘半农、茅盾、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等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进行过初步研究,但更详尽、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就因民族危机而使这一研究中断,对于较小区域的紫阳民歌在这一时段未曾涉猎。第二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而进行全国民歌普查,其时有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等学者从事过民歌尤其是新民歌研究与整理,但政治的导向使政治研究淹没了学术研究的主题。在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中,诸多学者前来安康展开民歌调查,搜集安康民歌,安康那时也产生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著名新民歌,然其时虽然声势浩大,但因政治性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意义,虽然收集了部分民歌,但多是新民歌,富有革命精神,可缺乏民间文学的民间性,对安康民歌的学术研究并未展开。第三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起始,其时民间文化不再是封资修的东西,而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国内学者钟敬文、袁珂、段宝林、刘守华、巫瑞书、姜彬、张紫晨等人研究成果相继推出,王洛宾把新疆民歌推向了全国,使之成为一种民歌范型,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各地文化工作者基于爱好展开了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国内涌现出大批田野调查成果,但区域性民间文学的系统性论著尚未出现,对民间文学的学理性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此时紫阳文化工作者陈碧珊、张宣强初步整理出了紫阳民歌曲谱、

收集民歌800余首，按内容分类编为四集，以油印方式内部刊行，可有关紫阳民歌的研究也未展开。第四时段是刚踏入本世纪之后随着地域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到来，地方民歌成为地域文化的有机构成而被纳入地域文化研究范畴，各地每年都有为数较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随着全国性地域文化研究热潮的到来，紫阳民歌研究已经成为相关地域文化研究机构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安康学人在紫阳民歌的田野调查和文化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相继出版了《山歌不唱不开怀》《紫阳民歌选》《紫阳民歌选编》等紫阳民歌选集，共辑录紫阳民歌1000余首。也有学者从民歌的内容、音乐、情感、移民痕迹等方面对紫阳民歌进行了初步梳理与研究，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紫阳民歌文化研究》《唱歌的土地》《紫阳民歌音乐研究》等。但需要指出的是，对紫阳民歌的文化生态及民歌在该地居民生活中的文化功能尚未展开研究。《紫阳民歌文化研究》是目前唯一的对紫阳民歌进行全面研究的系统性论著，该论著从民歌的内容、音乐、情感、移民痕迹等方面对紫阳民歌进行了初步梳理与研究，但对于紫阳民歌的文化生态及民歌在该地居民生活中的意义与作用尚未展开研究。

（三）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作为民间文艺集群中的典型样态，民歌在地域分布上无论东西南北，在审美形态上不管精雅或粗蛮，其本质都是诗，是山野中的生民为求得生命的充盈与丰沛而低吟或吼叫出来的诗。就文化功能而言，亘古至今，民歌是渔猎和农耕时代引领生民挣脱自然及工具奴役而走向诗意栖居的精灵。在乡土中国的历史播迁中，民歌遮蔽了冻馁悲苦，驱走了孤独恐惧，滋养了

人性人情。民歌是我们集体记忆中一位善良而纯情的恋人，她用原始而自由的歌唱给众生的灵魂带来慰安与希冀。紫阳民歌以多姿样态和生动活泼的形式构成该地山民生存的基本文化境遇，山地的封闭、教育的滞后、文化欠发达的历史、政治地域的边缘化，遂使民歌活动成为本区居民心灵精神建构和精神活动展开的主要方式，同时其巴人后裔的部族身份，属楚属秦的历史，氏羌迁徙的印痕，湖广移民的活动背景，茶马古道的交通方式，巴山汉水的生存境遇，重生主情的价值取向，不分宗派的民间信仰等等无不在民歌中留下深刻的印痕，正是这种多样性、多元性、山地性、移民性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紫阳民歌丰富的表现样态，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紫阳民歌文化生态，这一生态在本区居民生活生产中发挥着任何他种文化形式无法取代的功能，因而本课题就是围绕紫阳民歌的文化生态与民歌在该地民众生活中的文化功能展开调查与研究的。

民歌文化生态是指民歌生成的地理环境、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及与之相应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形式，亦即民歌生成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也包含民歌存在的基本样态及民歌精神所呈现出的意态。对这一生态的揭示可以为文化生态学提供田野资料的佐证实例，也利于理解文化生态与文化形式间的内在关系，进而为紫阳民歌的文化发展、传承与保护，及将民歌文化遗产应用于现代文化产业中提供坚实有力的学理性支撑。功能研究是将民歌的一般功能与紫阳独特的文化生态结合起来，考察民歌在封闭的山地居民生存环境及缺乏规范性文化引导的民众精神世界中的意义与作用。因紫阳地处大巴山腹地，交通闭塞、经济滞

后，兴办学校较晚，远离文化学术中心、政治中心，学术文化与政治文化对其辐射较弱，民众的精神世界构成、宗教与价值信仰确立、历史文化知识传布、生产与生活经验传承、伦理道德观念形成、社会组织形式、人的责任义务意识、生与死的信条、男欢女爱的社会规范、天文、地理、科学、神话、阴阳五行、风水八卦知识等等无不包含在民歌形式中，因而民歌对这里的生民来说，不仅是歌以抒情言志，释放苦闷、表达快乐的形式，更是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无处不在，也无所不包。该地居民就生存于这种文化氛围中。

本课题要突破的难题是紫阳民歌的生态文化环境，着力要揭示这里的自然、历史、社会组织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及居民的精神构建与民歌形态的关系，并在这一关系中考察民歌在本地居民生存中的意义与作用。

本课题是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的基本课题之一。安康学院特色优势学科的打造是结合地方文化资源，形成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并将这一中心作为陕西省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示范性基地来建设，这一课题正是高校服务区域社会发展的切合契机。

本课题研究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化范型的研究、尤其是地域文化范型，诸如秦东文化、关陇文化、河湟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等，多是从文化范型角度来研究，但从文化生态角度来展开文化研究的尚不多见，本课题将从文化生态角度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提供田野调查资料和考据分析例证，以丰富学科内涵。同时本课题的研

究对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学理支持。安康市政府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旅游业的文化内涵的生成是得力于区域既有的文化资源，紫阳民歌正是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其所具有的可视可听性消费价值，正是充实旅游业文化内涵的最佳资源。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对原有区域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与利用，紫阳民歌在现代传媒文化中具有自己独特的消费文化价值，对其展开研究，为紫阳民歌的产业化途径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理支持意义。这一课题的研究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紫阳民歌的传承与保护提供着理论保障，它的研究对紫阳民歌的传承保护方案的形成提供着学术支持。它使保护与传承方案中的保护方式、传承途径、活化生成更具有切实可行性。这一课题研究也对安康学院特色优势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紫阳民歌的“文学地理学”分析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文学艺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中国很早就开始从地理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研究，《诗经》就是根据地理区域的不同，将“风”划分为十五种不同的类型。汉代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和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都曾谈到过文学与地域环境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域特征的角度对南北文学的区分，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西方，斯达尔夫人发表于1800年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是较早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文学的论著。在这篇著作中，她从气候的角度区分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的不同特征：“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①而最有影响的当属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的著

名论断，即文学受“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的影响，其中“环境”谈的就是地理因素对文学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一些学者从西方的“文化地理学”中得到启示，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方向。邹建军认为：“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甚至任何作家与作品，都存在一个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我们所说的文学的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即任何作家与作品以至于任何文学现象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并且是特定时间里的地理环境。”^②考虑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重要影响，他在其主编的《世界文学评论》上开辟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专栏，专门讨论“文学”与地理因素的关系问题。当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学界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尚且有不同的看法，但重视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却是一致的。杨义认为，将“地理”引入文学的研究有助于接上“地气”，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特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讲文学地理学就是使我们确实实的使文学回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体验‘这里’有别于‘那里’的文化遗传和生存形态。”^③基于此，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与紫阳民歌互动的角度，对紫阳民歌与紫阳地理环境的关系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紫阳民歌的分布与紫阳的地理特征

紫阳民歌最让人称道的两种基本类型是“山歌”和“小调”，其中“山歌”又可分作“山歌号子”“山歌调子”“通山歌”“锣鼓草”四种基本类型。如果将“地理因

素”纳入到紫阳民歌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区域不同，民歌的分布也不同。纵观紫阳地图，可以看出紫阳的地理区域走势呈“三山两谷一川”的基本格局。所谓三山指的是大巴山、米仓山、凤凰山；两谷指的是汉江、任河两河谷；一川指的是嵩坪河川道。其中两谷又将全县分隔成东南部大巴山区、西南部米仓山区、北部凤凰山区三大块。整体而言，多高山峡谷是紫阳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这样的地理特征决定了紫阳民歌抒情表意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紫阳的“三山”具有“丛生”的特性，一丛一丛，壁立陡峭，人们隔山相望，真要见面，得下到谷底，再上到山上，要走半天。在这种地区产生的民歌主要是山歌，采用的调式一般是高亢的高腔演唱。因为必须提高嗓门，拖长声腔，对面山上的人才能听明白你唱的内容，当地人将之称作“喊山”。从创作的动机上说，山歌的演唱主要是为了娱乐，累了，轻松一下；寂寞了，热闹一下。因此在内容上，多为逗趣骂笑，或调情挑逗。形式上一般都很短小，四句、五句居多。风格上，风趣、幽默、诙谐。“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一树好仙桃”“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乖姐捡柴烧”“这山望见那山尖，望见乖姐打秋千”“这山望见那山底，望见一对好画眉”“远望乖姐穿身黄”“远望乖姐上高坡”等等，这些歌，可以从歌词中看出唱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其唱歌用意，用山民的话说，是为了“打赞”，就是开玩笑、挑逗，图快活。用高腔演唱的山歌，声腔高亢明亮、粗犷昂扬，为的是让远处的对方听清楚。

相应的，在这样的山地劳作产生的劳动歌，大多是一种节奏感很强的“哼哼唱”的号子，如抬石号子、打夯号子等，

“我们打夯哎嗨哟，齐用力哎嗨哟，四根绳子哎嗨哎嗨哟，要提起呀嗨嗨哟嗨哟嗨呀嗨子儿哟”。其用语是这一劳动事项某个环节的动作要领，没有什么旋律，音乐性不是很强，是一种直接的呼喊。还有一种叫“报路歌”。过去的山路，十分曲折、仄逼，祖祖辈辈没有公路、汽车一说。在这样的山路上运送物件，只靠“肩扛背磨”。如果是大型物件，如轿子、滑杆、箱、柜一类，就得两人、四人或多人抬运。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走在后面的人被物件遮挡了视线，看不见路面，而路形路况常常是复杂多变的，这就需要前面的人向后面报告，而后面的人则应有所回应。前面的人报告路形路况，后面的人回应相应的走法。如阴阳坡——慢慢梭，指的是下坡，须放慢速度“梭行”；陡上陡——凑（推）起走，指的是上坡，后面须用力推；连环“之”字拐——你去我不来，指的是转弯，后面停下，让前面先转过弯道等等。“报路歌”虽然没有什么旋律，但其呼喊的节奏韵律感很强，也应视为一种歌唱。

有高山，就有峡谷、平川。在后一种区域中，紫阳民歌的歌唱形式与前面论及的山地很不一样。在河谷与平川，交通相对便利，有了集镇，有了较大的村落，人口较为密集，人们的生活形态比山上的人们有了较多的悠闲，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有茶馆、酒肆以及别的休闲场所。这样的地方还有职业半职业艺人和一些有闲文人，因此，这样的地方所演唱的民歌，主要是小调。与山歌比较，小调是另一番艺术天地。从内容上说，有历史传说，有生活故事，有人文掌故，有风花雪月；从音乐风格上说，十分宛转悠扬，轻柔细腻；从艺术形式上说，多为反复重叠的多段体，有的可有数千言、数万言。如《十绣》《十写》《十送》

《十退》《十梦》《十恨》《十买》《十把扇子》《十杯酒》《十二月花》《十二月望郎》《十里亭》《梁祝》等等。从歌曲的名称就可看出这些歌曲有十段、十二段或更多的段落。因此，要演唱这些歌曲，大多离不开书本（多为手抄本），有的还加入了丝弦伴奏。从内容和语言方面推断，这些小调的作者，应该是一些家庭条件优裕的有闲文人，如教书先生、落第秀才等。

当然，山地也有小调，河谷川道也有山歌，二者会互相影响、渗透。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山地主要是山歌，河谷川道主要是小调。紫阳民歌的这种类型布局生动地反映了地理环境对艺术创作的制约作用：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状态，而生活状态又决定了人们的抒情方式。

（二）紫阳民歌中的地理因素

从唯物主义观点看，人的眼界总是受制于他所生活的环境，因此，文学创作中的自然环境描写往往与创作者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邹建军在谈到英国的地理条件和英国文学的关系时，说：“英国几个岛屿在北大西洋里，四边环海，与欧洲大陆都不相连，一年中有很长的时间雾很大，这样一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在英国很多作家的笔下有非常独到的描写，如在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中、在柯勒律治的诗中，以及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在哈代的小说里。”^④事实上，“文学地理学”特别注重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特定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物象描写：“文学地理学特别强调对文学发生地和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比如，如果你要研究郭小川写的《团泊洼的秋天》，去看一看团泊洼是什么样子，那对于我们理解作品会很有帮助。比如，谭恩美的长篇小说《蟾骨师之女》所写的周口店附近的‘仙心村’，如果我们能够到‘仙心村’看

一看，那对我们理解这部长篇小说，肯定会具有很大的意义。如果你要去分析某个作家及其作品…不去实地的考察和研究，是很难理解到位的。”^⑤本文认为，紫阳民歌中存在大量特异的地理因素描写，这些地理因素与紫阳县独特的地域风貌密切相关。在解读这些民歌的时候，必须结合紫阳县的独特地域风貌才能解释清楚。

比如对“对门”的理解。在紫阳民歌中，经常出现“对门”这个方位名词，如“郎在对门唱山歌”“郎在对门砍干柴”“郎在对门媪黄秧”。不了解紫阳地貌和山居生活经验的当代城市读者、听众可能误解这个词，认为“对门”就是单元房的门户相对或者村落群居的门户相对。其实，紫阳民歌中的“对门”有它特定的含义，是紫阳地理生态在方位概念上的反映。紫阳山陡谷深，山山相对，山与山之间空间直线距离很近，百姓依山而居，从视角上讲，此山上的住户和彼山上的住户就是门户相对，因此紫阳民歌中的“对门”实际上是指对面的山坡上。如果误解，诸多紫阳民歌就不知所云。如《送饭调》：“郎在对门砍干柴，姐在屋里送饭来。郎问姐儿什么菜，油炸豆腐白菜苔。”既是“对门”，何用送饭？知道“对门”就是对面山坡上，一切都好理解了。两山相对，直线距离虽近，但山路崎岖险阻，要从这面山上到达对面的山上，却是不易，既费时又费力，紫阳民谚“看到屋，走到哭”就是对这种生活情境的生动描述。所以，郎在对面山坡上砍柴，姐才要去送饭，一是关爱，二是怕误了砍柴工。

另外就是对“望”的理解。“望”在紫阳民歌中，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动词，前面在论及山歌的时候曾列举了一些，如“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一树好仙桃”“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乖姐捡柴烧”“这山望见那

山尖，望见乖姐打秋千”“这山望见那山底，望见一对好画眉”“远望乖姐穿身黄”“远望乖姐上高坡”等等。没有去过紫阳，可能很难理解紫阳民歌中有这么多关于“望”的描写。其实，这是紫阳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紫阳山陡谷深的山地地貌，决定了紫阳男性务农、砍柴的场所往往在山的半腰，这就使得他们在劳动的间歇，经常是一抬头就能看到对面山上人们的生活情况，或者是山底人们的生活情形，这时未免就会出现“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乖姐捡柴烧”，或者是“远望乖姐穿身黄，收拾打扮过堰塘”的情形。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紫阳人的生活固然艰苦，但是也很浪漫。与平原地区，男性和女性的生活区域很少交集不一样，紫阳山地，男性和女性的生活区域很容易交叉。有交叉就会产生希望，容易让人滋生美好的想象，而这或许是紫阳人生性乐观、而又才情丰富的一个地理地貌原因吧。

标示紫阳独特地理特征的词，除了“对门”和“望”之外，还有“坡”。如“郎在坡上喊一声，姐在房中乱了心”“太阳落坡天不早，背上背篓打猪草”，这里的“坡”显然不是平原地区的小“山坡”，而是“山腰”和“山脊”，如果不明白“坡”的这种含义，是很难理解民歌所要表达的意义的。此外，如“梁”“坎”等指示名词都有特定的含义，反映了紫阳地区非常独特的地理自然特征。这些内容，如果不亲自到紫阳地区走一走、看一看，确实很难深入理解歌词所表达的含义。

（三）紫阳民歌中的“地理政治学”

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艺术作品中的空间设置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布局问题，而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学界将这种理解称作是“地理政治学”。英国著

名的“文化地理学”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和地理科学不一样，它在描写地理空间的时候充满了“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导致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色彩，“在文学作品里，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在拉伯雷的作品《卡冈都亚》中…不同空间用于不同时间里发生的行为：一些用于吃饭，一些用于睡觉，还有一些用于洗涤或盥洗…这样一个有序的地理空间，对什么事情应该发生在什么地方做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判断”^⑥。西方的女性主义学者对空间的这种伦理道德色彩做出了更加明晰的分析：“女子和男子的定义是在特定的场所建构出来的——最为显著者是家庭、职场和社区；在分析两性间的地位差异时，应该将这些发生影响的场域间的相互作用考虑进来。”^⑦在一部分女性主义看来，传统的文学写作通过将女性的活动场所限制在家庭，隐秘地构建了一个男女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家”在文学作品中就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建构色彩。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者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一部文学作品……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往往能够体现出作家本人的审美角度、审美情趣、审美态度，以此出发，就可以把握作家的创作心理与审美个性，可以进一步解读作品的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观察自然风景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作品中对同一处自然风景的描写也是并不相同的。”^⑧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对文学作品所描写的自然地理因素进行研究，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去探讨这种描写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即所谓的“地理

政治学”。在这里，本文想着重分析一下紫阳民歌对太阳这一自然地理因素的描写。

太阳作为一个文学意象，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诗词，还是在现当代新诗，经常出现。据考证，中国古代诗词对太阳的描写除了将之比作皇帝外，写得最多的就是夕阳，主要包括下列三种情况：夕阳西下，万物归巢，或者蕴含着一种恬淡美好的归隐意境，或者激发一种思乡的情绪；夕阳西下，太阳缓缓而落，似乎依依不舍，蕴含着一种惜别之情；夕阳西下，世界逐渐消失于黑暗，带给人一种苍凉、萧瑟的感受^⑨。从《女神》开始，新诗也特别喜欢描写太阳。不过，与中国古典诗词侧重于描写夕阳不同，中国新诗的太阳往往是光明、希望和理想的象征：“太阳意象处于弱势的状况在‘五四’新文学中得到突然而彻底的改变…它所蕴涵的意义也与以往完全不同，太阳是热烈、阳刚、激情、活力的象征，太阳是青春、创造、理想、希望的象征。”^⑩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夕阳”，还是中国新诗中的光明“太阳”，中国文学对“太阳”的描写都充满了文人趣味，“太阳”这一自然地理因素负载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中不同文人的不同生活哲学和审美感受，充斥着一种浓烈的“地理政治学”色彩。

太阳在紫阳民歌中也经常出现，但与中国文学中负载文人趣味的“太阳”不同，紫阳民歌中的太阳负载的是劳动者的生活趣味。在紫阳民歌中，太阳这一自然地理因素承载着两大文学功能。一是标识白天黑夜，如“太阳出来照北岩，姐儿出来晒花鞋”“太阳落坡天不早，背上猪篓打猪草”。二是以中午太阳的热辣和晚上太阳下山的阴凉，烘托自己的心情感受，如“六月太阳像团火，晒得么妹没处躲，我把草帽抹给你，硬叫太阳来晒我”，又如“太阳落土四山阴，

四山凉水冷浸浸，劝姐莫喝阴凉水，喝了凉水冷了心，忘了你的心上人”。尤其是对太阳热辣的刻画，让人印象深刻，如“没得水来我给你挑，莫把姐儿晒黑了”“太阳大了晒坏人，只望天上起朵云”“六月放羊热茫茫……奴家晒得汗水长”“六月太阳热烘烘……活活晒死我长工”。由上可见，比起中国正统文学对太阳的细腻感受，紫阳民歌对太阳抱着一种质朴的情感。而对太阳热辣的多角度描写，也可见出紫阳地区光照之强烈和人民生活之艰辛。同时，从对太阳的描写中，我们也可感受到紫阳民歌那劳动者特有的质朴、健康的审美特质。

对紫阳民歌“地理政治学”的分析，还可以通过分析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生活场地，透视紫阳地区的两性观；也可以通过分析山歌和小调在自然地理景观描写中的不同侧重点，透视两大民歌类型的不同审美形态。因此，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分析紫阳民歌还大有可为的空间。

总之，紫阳民歌与紫阳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了解紫阳的地理环境很难深入理解紫阳民歌的特点。从紫阳民歌的分布来看，山歌和小调的分布格局与紫阳“三山两谷一川”的地貌特征密切相关；从对紫阳民歌的理解来看，不了解紫阳山陡谷深的地貌特征，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歌词；从自然物象的描写来看，通过分析紫阳民歌的独特地理因素描写，可以透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

三、紫阳民歌与紫阳人生活间的互动关系

紫阳民歌被列为国家“非遗保护项目”，绝非偶然。长期从事紫阳民歌的研究者和紫阳的当地文化人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他们认为紫阳民歌作为陕南民歌的代表而被列为国家“非遗保护项目”，

应与紫阳的人文地理环境、紫阳民歌的生产方式和紫阳人的生活态度以及紫阳县政府的高度关注等因素有关。可以说，紫阳民歌与紫阳人的日常生活及紫阳人特有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密切相关；而且，二者呈现为一种互动关系。

（一）紫阳民歌中反映的紫阳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

有论者认为，紫阳是安康九县一区里最富艺术气质的一个县。也即是说，紫阳人是最能发现美，最会欣赏品味美，也是最能创造美的人群。当他们面对大美的天地自然时，他们会由衷地发出欣悦和赞美之情；当他们劳动时，他们会品味劳动的乐趣，享受劳动成果带给他们的喜悦；当他们闲暇时，他们或欣赏眼前之美景，或笑骂，或找其他乐子戏耍；当男人们外出时，不忘抽袋烟，喝杯酒；当妇女们外出时，总会梳妆打扮一番。一群紫阳人在一起聊天，总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下面，本文就具体论述紫阳民歌中所反映的紫阳人的生活态度。

1. 乐山亲水，美化自然

紫阳属秦巴山地的一部分，山脉走向呈北西南东向。北部为低山区山势较缓，河流开阔；中南部为中山区，山势较陡，水系发育；东南部高山区峡谷深邃，峰岭陡峭。在这山高谷深、峰峦叠嶂，溪流密布、林木茂盛的地方，极易引起人们的诗情画意。

紫阳民歌《彩色的汉江》直接将“三千里汉江”比喻为“三千里流动的画廊”。

紫阳新民歌《驾起彩船走汉江》云：

站在船头看风光，汉江好像画一张。
两岸青山对青山，万绿丛中是村庄。牛羊画中走，鱼儿画中游。人在画中忙，歌在画中唱。

这首民歌，歌者将汉江两岸的风光比作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青绿的山上点缀着些村庄、牛羊和劳作的人们。牛羊鱼儿在画中游，人们在画中劳作歌唱，这个比喻贴切、惟妙惟肖。

《汉江放船》也形容汉江两岸的山川“如诗如画”。歌中唱道：

一座座青山披霞光，一朵朵浪花映朝阳，一道道山川诗如画，一阵阵船歌豪情壮。

披着晚霞的青山，映着朝阳的浪花，如此美丽，以至于船夫不仅赞叹道“一道道山川诗如画”。

由于紫阳县属于秦巴山地的一部分，而汉江与其最大的支流任河一东西向一南北向贯穿紫阳。所以，是秦巴山地，是汉水养育了紫阳的一代又一代人。因此，紫阳人面对其身边的山水自然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情。他们或到山上劳作：有上茶山采茶的，有上山放牧牛羊的，有上山采摘野果子的；或到山上幽会；甚至还有站在半山腰和山对面的郎或姐儿对唱几句的。他们或到河中挑水，或到水中洗衣洗菜，或到河中打鱼；有的在河边挑水洗衣时，不忘与河中的船夫笑骂两句。

总之，“山里人最爱唱山歌”，水边的人亦最爱唱水歌。生长在巴山汉水间的紫阳人对长养他们的这片土地产生了浓浓的喜爱和亲切之情。他们不吝言辞地夸赞它的美丽，它的丰饶，它的亲切。《文心雕龙·神思》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自然界的山川花草，浩瀚宇宙的日月星辰，在紫阳人眼里，都不再是纯粹的客观之物，而是被审美化了，被情感化了，它们已经成了紫阳人审美情趣和艺术气质的对象化体现。

2. 以茶会友，茶香满地

紫阳不仅是歌乡，还是茶乡。紫阳茶中富含人体所必需的稀有元素硒。紫阳民歌《富硒福兮》唱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水土含硒富硒。硒是健康。硒是必须，硒是人体的福祉，硒是生命的活力。”

紫阳茶很早就被广泛种植，并走出大山，销往京都及其他地区。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包括今紫阳茶区在内的巴国，茶叶的栽培已十分普遍”。^⑩到了唐代，包括紫阳茶在内的“山南茶”（秦岭以南所产之茶）产量已丰，并已进入长安市场。

紫阳茶不仅是一种物质符号，能带给人们较为丰富的经济收入；而且，紫阳茶也成了紫阳的精神文化符号。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符号，新茶之香与茶山之美，不仅陶醉了人们的精神，愉悦了人们的心灵；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待友会客，传情达意，促进友谊。

紫阳民歌中，许多歌曲直接反映了新茶之香和茶山之美。如《上茶山》《倒采茶》《手提二封茶》等皆是；新民歌中也有歌唱茶山或茶香的，如《亲妹只亲脸蛋蛋》中唱的那样：幺妹和情郎相约上茶山，“茶山风光多么好，春到茶山情满园”。《采茶忙》中也有“茶山处处好风光”的词句。在一对对青年人们眼里，飘香的茶山不仅风光优美，更是他们相约相会的爱情之所。

又，《茶香飘五洲》：

“春三四月茶山走，一路熏风香悠悠，香满坡，香满沟，香满茶篮和背篓，鸟语声声也飘香。”

“车载香茶路上走，船载春色顺水流，走出山，流出沟，涌进城市大码头，一腔深情实难收，茶香飘五洲。”

歌者唱道，和煦的春风将悠悠的茶香吹满整个山坡山沟，并使之顺着汉水往下流，

流出山沟，涌进城市码头，飘向四海五洲。

茶香如此馥郁，茶山如此美丽，让人如痴如醉；游客也不例外，陶醉其中，醉卧其中。《游客醉茶香》唱的便是这个内容。

紫阳民歌也有很多描绘了紫阳人以茶会友、以茶待客的场景。《手提两封茶》中云：“客官打扮一枝花，摇摇摆摆到姐家，手提两封茶”。据本曲第二三节内容来看，衣着漂亮得体的客官原来是提着两封茶去看望姐家的爹娘，是去提亲的。这里，茶作为“礼轻情意重”的聘礼而存在。

《十二辰》讲的是，姐儿思念的那冤家“午时到姐家”，而姐儿却在绩麻；于是姐儿“丢下麻不绩，赶忙去烧茶”。这里，茶又成了迎接情郎的东西了。

《金交椅之一》讲的是，一客官进了主人家的门和主人寒暄了几句之后，主人就端出红漆茶盘请客官喝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文繁不赘。

由是知，茶作为紫阳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中介，像诗酒一样，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弥缝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从而使人们之间的情义更加深厚。

3. 热爱劳动、热爱生活

紫阳人眼里，不仅大自然是美丽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艺术化的，饱含诗情画意的，紫阳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充满了热爱和欢喜之情。有论者认为，紫阳人按照“快乐原则”生活，笔者亦赞同这一观点。这一点在紫阳民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艺术和手工艺区别着。德国的古典美学家席勒和康德对此进行过较为深刻的论述。康德认为，人类的劳动过程是痛苦的、不自由的，是被逼迫的；而人类的艺术活动却是自由的、让人产生愉快感觉的，是自愿的。但艺术与劳动的区别与疏

离却不符号紫阳人生活实际。

紫阳民歌产生于紫阳人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同时又歌唱了紫阳人的生产劳动。在紫阳人看来，劳动和艺术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那么明晰，劳动和艺术的距离也没那么遥远。由于紫阳人生性乐观旷达、幽默风趣，所以他们并没有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太多的无奈和痛苦，而更多的感受到劳动过程的愉快和成功的喜悦。歌唱劳动就是歌唱劳动者自身。紫阳民歌中歌唱劳动的有很多。除了一部分直接歌唱劳动的号子之外，在山歌小调中也有很多关于劳动生产的句子、段落或相关描述。如《栽秧歌》《挑水调》《打鱼调》《洗衣裳》《捡柴调》《点黄瓜》《薅黄秧》《摘石榴》等，都在歌唱普通百姓的劳动情景。

《挑水调》，描绘姐儿上石梯来下石梯去，到河里挑清水。挑水对这位姐儿来说并不是痛苦劳累的，而是愉快的，否则姐儿不会“笑嘻嘻”。因为她可以在挑水时，丢下扁担和情郎“玩一遭”。

《洗衣裳》云，生得胖又俏的姐儿下河洗衣裳，与周围人骂笑两句，以增添劳动的乐趣。《摘石榴》讲，姐儿一边摘石榴，一边和情郎骂笑。

综上，紫阳人在进田地干农活或进行其他劳作时，感受到的快乐与愉悦远远大于痛苦和无奈。这是因为紫阳人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和诙谐幽默的性格特点使得他们将本来索然无味的劳动审美化、艺术化，对其充满了热爱之情。

紫阳人热爱长养他们的这片土地，热爱他们的日常劳动，更热爱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点得极具审美价值和艺术气息，说紫阳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一点都不为过。

紫阳的男人们嗜酒、好茶。当这些男人

们外出做生意、到别家做客或路过某家歇歇脚时，都会吃上一杯酒、喝上一杯茶。《上茶山》云：“说起爹爹奴不怕，他一天就离不了三顿酒。”《山伯访友》讲的是山伯借酒奉劝其梁兄弟要好好生活，要“娶个美貌妻”，要“好好念文章，莫把闲事想”，还要“无事常来走”。《十杯酒之一》讲的是小郎提了一壶酒去姐家，同姐一起喝酒。

当妇女们外出时，会梳妆打扮一番，穿得风流漂亮。《过堰塘》云，“乖姐穿身黄，收拾打扮过堰塘”；《人人都说茶山好》云，“年年有个三月三，收拾打扮上茶山”；《卖饺子》云，“姐儿今年一十七，打打扮扮去看戏，外带小生意（即卖饺子）”。《闹五更（之四）》云，“一更子里来去呀去逛达，上穿红绫袄，下穿水罗裙，三寸金莲足下登，姊妹二人打扮得多齐整”。

在吃上，紫阳人也非常讲究，不单求吃饱，还要吃得好，吃得美。《怀胎歌》唱道，怀胎的女子想吃好多香东西：“想吃酒米和糖稀，鸡蛋剥了皮”，“想吃杏仁黄石榴”，“想吃猪肝腌鸭蛋，想吃几品盘”，“想吃牛腊肉，想吃牛肉炖羊肉”……小调《十想》，也是用歌唱的形式为我们歌唱了紫阳美食。

当他们休闲下来时，他们会领受眼前的优美景致带给他们的舒适、惬意。《月亮出来照婆婆》云，晚上乖姐坐在屋檐底下欣赏皎洁的月光和月光穿过枝叶照在地上的婆娑月影。《小四景》讲，春燕杨柳，鸳鸯亭阁，秋风芭蕉，冬雪腊梅，斯四侯之感诸人者也。闲时他们也可能在家里找乐子，荡秋千玩儿。《打秋千》讲，乖姐打秋千，非常娴熟且有艺术性，“上打鲤鱼三板仔，下打金钩倒卷帘帘”，这美丽动人的景象连山那边的小郎都望见了，被吸引住了。甚至那些小动物也成了紫阳人开涮的对象：《蛤蟆

歌》《老鼠子歌》《放出笼里鸡》等是。

在紫阳人眼中，生活中处处都有美；而他们也最能发现美，领略美，享受美。而这正体现了紫阳人对其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

4. 乐观旷达，诙谐幽默

紫阳人是一群快乐的人。几千年来，紫阳人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断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再加上紫阳地处高山深谷之中，地势险要，很少受到军事上的冲击和经济文化上的摧残。故生活于其中的百姓大多无优生之嗟叹，痛苦之哀嚎；他们安闲自在地生活于这片青山绿水之中。他们对待生活乐观旷达，尽管生活中也有苦难、忧伤，但他们常能以笑脸相迎，常能以苦为乐。这种情绪在紫阳民歌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安闲自适的生活态度在《没得歌唱唱消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歌中唱道：“没得歌唱唱消停，没得锣打打铜盆，没得扇子搨草帽，没得裤子搨围裙。”

如果我们了解这首歌的演唱情形便可感悟出一种自在的情态：那是双方对歌时，某一方对答不出“没得歌唱”了而自我解嘲的歌唱。输赢就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我“歌唱”了。从其内容本身，同样可以看见一种自在的生活态度或生命形态。什么都没有也算不得什么，眼下先随遇而安快活一把。随遇而安并非消极，实在为豁达大度。^②

紫阳人的生活中并不全是快乐、欢畅，也有痛苦、无奈和忧伤。然而他们却“很少去理睬那种苦情，它要快乐，不要忧伤；他要笑脸，不要愁容”^③。述说苦情苦事的民歌尽管有，但也常以诙谐幽默的、机智风趣的语言道出。如《单身汉歌》：“床上摸两摸，老鼠坝了窝，单身汉没下落”。又如《讨口子歌》：“送郎一顶帽，一把烂瓜瓢，

我郎戴上正合窍。送郎一件衣，一床烂蓑衣，我郎穿上笑眯眯。”《长工歌》讲的是，一个掌柜家的长工从正月到腊月辛勤劳作而不得休息的生产过程。在艰苦的劳作过程中，他仍能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绘其劳动场景和劳动果实：他描绘六月的太阳“热烘烘”，形容八月“田里秧子黄蓬蓬”，九月“坡上黄豆炸蓬蓬”。这样的语言，或双声或叠韵，生动形象地将其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描绘出来。若无一点审美的心理，是断不会有这种形象生动的语言产生的。他冒着严寒酷暑，不分白天黑夜地为掌柜地干活；而结果“掌柜的还说我中不用”，“肥肉瘦肉掌柜的吃，骨头棒棒待长工”；“冬月里下雪又刮风，掌柜的烤的是白炭火，活活冻死我长工”。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保持一种乐观且昂扬的生活态度。腊月工期已至，长工并没有低三下四地求掌柜的留下他，而是执意要走，大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气概。而此时，掌柜的“好酒好肉摆上桌，花言巧语留长工”。《放羊歌》在内容风格上皆与《长工歌》类似。

这些歌曲无不透漏着一种乐天情绪。由于述苦之歌在紫阳民歌中所占比重相当少，于是它们便被作为主体的快乐的紫阳民歌所淹没了。

总之，紫阳民歌是快乐的歌。它的快乐，不仅表现在曲调的明朗、欢快、流畅、优美，能带给人们愉悦的享受；更表现在思想内容的旷达自在，让人感染一种乐观主义情怀。

幽默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只有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才会有真幽默。幽默又是一种人生境界，那种鸡肠小肚、蝇营狗苟、与幽默无缘”^④。而“骂笑是紫阳人特有的与人表示亲密友好的方式。它只在熟人与同辈人之间才会出现”。^⑤同辈熟人间的骂

笑充满了机敏智慧、诙谐幽默。

《郎在对门唱山歌》即是一首典型的笑骂歌。那一连串骂人的语句，“哪个短命死地，发瘟死地，挨刀死地”，其实不是真的诅咒那人，而是说那个人山歌唱得好。《栽秧歌》云：“栽秧田里行对行，一路稗子一路秧。小伙子大发威，脸上起了冬瓜灰。”这首歌，表面上看是歌者嘲笑小伙子浑身皆是尘土，实际上是赞叹小伙子干活辛苦、卖力。《打蜜蜂》一曲，应是将小小蜜蜂比作追求姐儿的小郎。任凭姐儿怎么打、怎么搨，那“该死的蜜蜂越打越拢来”。这位姐儿一边打蜜蜂，一边骂小蜜蜂“该死”；其实这里面暗含着姐儿对蜜蜂的喜爱之情。

逗趣、调笑也体现了紫阳人的机智、幽默。《姐在河下放花牛》云：“姐在河下放花牛，郎在高山打石头。石头落在花牛背看姐抬头不抬头。”这是一种挑逗，要让那位低头含羞的女子抬起头来“风流”一下。《月亮出来万丈高》讲的是，小郎在月亮的照耀下过山路，不小心在湿滑的石板上跌了一跤，“脚上锥了蒙鼓钉，挨挨擦擦想姐挑”。这也是一种借机挑逗、亲近。而聪明的姐儿却婉言拒绝了，“你要挑来别人挑，奴的丈夫耍双刀”。这一拒绝与《陌上桑》中的罗敷拒绝府吏的同乘请求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反映。紫阳民歌作为紫阳文化的代表，也是紫阳人日常生活的反映和紫阳人精神面貌的写照。紫阳优美的山川景色，深厚的艺术气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紫阳人，他们放情歌唱，随口唱歌，歌唱大自然，歌唱生活。在紫阳人眼中，不管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她们眼前的大自然，都是美的。他们并没有以实用的、功利的或理性分析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一切；而是用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眼光来感悟这一切、欣赏

这一切。他们与眼前的一切结成了一种形象的、情感的关系状态。

（二）紫阳民歌的作用

关于紫阳民歌的作用或价值，余海章、戴承元二先生在其所著《紫阳文化研究》一书中，已有论及。书中，二先生在对紫阳民歌中的情歌分类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紫阳民歌中的情歌“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他们认为，那些情歌“可以使我们了解彼时彼地人民的审美心理和性观念、性文化”；情歌“作为民间文学中的一种抒情文学作品，它的多样巧妙的表现手法、技巧可以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⑩本文欲从总体上讨论紫阳民歌对紫阳人日常生活和紫阳人精神面貌的作用。

第一，紫阳民歌使紫阳人的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

紫阳人爱说笑，喜歌唱，他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吟唱出了优美动听的旋律。他们上山采茶要唱，外出做生意要唱，迎来送走要唱，婚丧嫁娶要唱，思念怨恨要唱，相互搭话儿要唱，独自走山路要唱，拉船喊号子要唱……可以说，唱歌已融入紫阳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一天不唱喉咙痒，两天不唱心发慌”。若没有歌唱时，他们也还要唱，那时便“唱消停”。紫阳人时时处处都在唱，处处时时皆在歌，歌声洒满整个紫阳大地。

唱歌使紫阳的日常生活、劳动和音乐结合起来，使人们的日常劳动有了节奏、有了韵律，这样既减轻了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的劳累感觉，又美化了日常劳作，使其具有艺术和审美气息，让百姓乐此不疲。劳动号子即是此类。紫阳民歌中的劳动号子多种多样，有适合在特定时机演唱的汉江船工号子、打夯号子、抬石号子、抬丧号子和在多种合力劳动中都可使用的通用

劳动号子。这些劳动号子“节奏鲜明，形式规整。既可协调动作，又可让大家开心快活，消解疲乏。”^⑪

歌唱紫阳人采茶、插秧、摘棉花等劳动的曲子也具有这种作用。几首《上茶山》和《采茶忙》《春到茶山一片新》《三月三上茶山》等歌曲，读者试平心静气吟读联想，恍如置身于青绿幽香的茶山之上，见男男女女，三三两两，于茶山之上，一边采茶，一边唱歌，一边逗趣笑骂，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联想至此，读者之心灵于是旷达，读者之精神于是愉悦。而歌者的歌唱也让人民的采茶劳动充满了审美趣味、充满了艺术气息。

第二，紫阳民歌升华了紫阳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了紫阳人的艺术气质

我们说，紫阳民歌产生于紫阳优美的山川景色和紫阳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而紫阳民歌反过来又使紫阳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同时，紫阳民歌还提升了紫阳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了紫阳人的艺术气质。紫阳民歌的这种作用在《郎在对门唱山歌》《山歌不唱冷秋秋》《山歌不唱不开怀》《没得歌唱唱消停》《叫我唱歌我不难》《歌儿越唱越响亮》《久不唱歌忘了歌》等曲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郎在对门唱山歌》云：

“郎在对门唱山歌，姐在房中织绫罗。哪个短命死的发瘟死的挨刀死的，唱的歌谣好啊，唱的奴家脚耙手软，手软脚耙……踩不得云板，丢不得梭。绫罗不织，听山歌。”

对门的郎山歌唱得如此之好，房中的姐儿被那动听的山歌陶醉了，她“脚耙手软，手软脚耙……踩不得云板，丢不得梭”，最后直接扔下梭机，听起山歌来了。

“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儿不推不转来”

云云表明：唱山歌能使紫阳人心情舒畅、胸怀宽广。山歌具有怡情悦志、宽襟舒怀的功能。

山歌还具有暖人心的作用，如“山歌不唱冷秋秋，芝麻不打不成油”云云是。

唱山歌可以让人民自由的心志和创造性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和施展。《歌儿越唱越响亮》云，唱歌要大声唱，高声唱，而且还要唱得更加响亮；不仅要在紫阳唱，而且还要唱到北京去。

徜徉在紫阳民歌的长河中，其欢快流畅的曲调，让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其旷达、自在的内容，亦让人感染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长期从事紫阳民歌调查研究的张宣强先生亦云：“民歌里有绿荫送爽，有清风扑面，大凡名利场上的燥热，日常生活的烦忧，皆可为之消解”；“民歌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心灵的清爽润贴。”^⑧

生活在歌声里的一代又一代紫阳人，被传承不断的紫阳民歌滋养着，浸润着，其审美品位和艺术气质在潜移默化中被提高了、升华了。若叫他们唱一首新歌，他们会很容易地随口编来。“叫我唱歌我不难，不比挑花绣牡丹。挑花离不了五色线，唱歌只要记得全，由你随口编”云云即是。

总之，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样式的紫阳民歌与紫阳人的生产生活及他们的精神面貌呈现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互相促进提高的关系状态：一方面，紫阳民歌是在紫阳人的生产生活与紫阳人特有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的基础上产生和传唱开来的；另一方面，紫阳民歌的广泛传唱又将紫阳人民的生产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另外，紫阳民歌还陶冶了紫阳人的精神，净化了紫阳人的心灵，进一步提高了紫阳人的艺术气质和审美品位。

参考文献：

①斯达尔夫人.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 [G].//伍蠡甫,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4.

②邹建军, 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 [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0 (2): 35—43.

③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走势 [J].文学评论, 2012 (4): 73—84.

④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J].世界文学评论, 2009 (1): 41—46.

⑤刘瑶.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 [J].世界文学评论, 2008 (2): 21—27.

⑥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 [M].杨淑华, 宋慧敏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1—62.

⑦达夫妮·斯佩恩.空间与地位 [G].//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97.

⑧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J].世界文学评论, 2009 (1): 41—46.

⑨梁德林.古代诗歌中的太阳意象 [J].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3): 37—41.

⑩陈绪石.论中国新诗太阳意象的时代性 [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1): 84—88.

⑪樊光春.紫阳县志 [M].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249.

⑫张宣强.唱歌的土地 [M].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139.

⑬张宣强.唱歌的土地 [M].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106.

⑭张宣强、李春芳.紫阳民歌选编 [M].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8: 473.

⑮张宣强.唱歌的土地 [M].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97.

⑯余海章, 戴承元.紫阳民歌文化研究 [M].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8: 122—125.

⑰张宣强、李春芳.紫阳民歌选编 [M].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8: 8.

⑱张宣强.唱歌的土地 [M].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131—132.

(作者单位: 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石泉“二流子席”

□ 洪 军

“交朋结友，欢欢喜喜上酒楼。入席啰，二流子，吃一口，香一口，走遍天下留心头！”这是石泉民歌对当地“二流子”席的赞誉和依恋之情。

说起“二流子”席，历史悠久。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厨子名叫易牙，自幼精研厨艺，常常到了忘我的境地。青年时，易牙恋上了富家小姐，但由于那时候厨师地位低下，被女方父母骂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易牙悲愤交集，利用民间各类食材，通过蒸、炖、焖、炒等技法，创出了色香味美的宴席佳肴，特取名为“二流子席”。结果这一宴席受到民间广泛推崇。后来易牙被齐桓公聘为御厨，并用此菜肴治好了齐桓公的失眠症，从此名声大振，在石泉县一代代流传下来。

正是由于烹饪二流子席技艺精深，人们把厨师称为“厨信”。学习厨艺一般都是通过拜师仪式，由老厨信口传心授、跟师三年后才能出师掌厨。因此农村婚宴、老人寿宴请厨信做席，都遵循一定礼仪：厨信到来后，主人要用茶盘奉上四碟干果茶点，附上红包，名为“上案礼”，递上毛巾一条，名

为抹刀巾，送上香皂一坨，供厨信净手用。然后厨信要祭祀厨祖易牙，祭拜灶王爷，再上案备席。席口分“支客席”“正席”“圆饭席”。三天婚宴结束后，厨信保留一个猪拱嘴、一对猪耳、一截猪尾巴，加上其他剩余食材，在茶盘里摆成一条卧猪形状，交给主人，名曰“交厨”，表示“有吃有剩、发达永续”之意。主人则根据厨信做了多少席菜，付给相应的报酬，名曰“谢厨”。

之后，二流子席为顺应民间不同需求，成为流传下来系列宴席的统称，有“海碗子席”“五荤四素”“倒四六”“顺四六”“八大件”等。其中“海碗子席”，有如“满汉全席”，108道菜，讲究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分“红案”（炒菜类）、“白案”（面点类），从开席到收席，耗时很长，因此农村对诸事迟到者常有俗语“你吃海碗子席去了！”的埋怨。但这种宴席只有达官、特别富豪人家才置办得起，平常百姓只有听说而已。

通过需求对应，“二流子席”成了民间广受推崇的宴席。为了满足普通人家好面子的需求，真、假“二流子席”应运而生。真

安康文化 2019.3

“二流子席”，讲究“六大柱”，取“六位高升”之意。“六大柱”即六冰盘（大盘）、六铤碗（大海碗），另加六个寸（中盘）六汤碗（小碗），两次“清龙汤”（白开水），还有九个凉菜（五荤四素），四个扣碗子，两个小炒。共计41道菜。

假“二流子席”，也称“五荤四素”，讲究“四大柱”，取“四季平安”之意。“四大柱”即四冰盘（大盘）、四铤碗（大碗）四个寸（中盘）四汤碗（小碗），一次“清龙汤”还有九个凉菜（五荤四素），四个扣碗子，两个小炒。共计30道菜。

“二流子席”讲究炒（爆、熘）、烧（焖、煨、烩、卤）、炸（烹）、煮（氽、炖）、蒸（上笼）、凉拌等烹饪技巧；更讲究“五功”：一为汤功。行话说：“唱戏的腔，厨子的汤”，要做好二流子席，首先要熬制好高汤，这是老厨馆的绝技，一般不外露。二为配功（配色配菜）。二流子席不仅讲究味美，更讲究各种食材颜色的搭配，以激起食欲。故有“离了红萝卜不成席”的说法。为了让新鲜大肉变得棕红鲜嫩，厨馆都要糖炒“染子”上色，火候稍微掌握不好，就会失败出丑。三为刀工：根据二流子席“花、快、条、丝、菱角”等传统刀工要求，将各种食材切成相应的形状，刀工、刀法不好，掌厨师傅会发火骂人。四为火功：要求厨馆恰到好处掌握炒、烧、炸、炖的火候和油温，否则难以入味。五为手功：厨馆持炒瓢炒菜，重达三、四公斤，上下翻簸，没有一定的臂力和技巧，就难以做到翻炒自如，不溢不撒。

设宴开席时，先上凉菜，支客师按宾朋辈分、长幼，招呼客人入座，名曰“安席”，接着代表主人致答谢辞，名曰“告

席”。随着支客师“一言奉请，开席……”，厨馆一炒一蒸一汤交替上菜，主人与来客一一斟酒致谢，客人发拳行令，把酒宴气氛推向高潮。当要上到甜食轮次时，“清龙汤”（白开水）上桌了，让客人涮洗汤勺。有“打盘”传菜的搞趣，在水碗里撒上葱花、芹菜叶，害得不知情的客人把它当汤喝，引为一笑料。

时代发展，不变有变，二流子席虽经不断改进和创新，但“四大柱”“六大柱”格式没变，传统核心菜肴没变。如：墨鱼汤、糖肘子、肉香甜酒、蒸碗、扣肉等一直传承下来。其中墨鱼汤烹饪，需要淘米水发、拉丝、酒烧、勾醋、上芡等好几道工序，做出来的汤味鲜美滑嫩，入口回味无穷，具有凝神静气之功效，被县城各大酒店推为当家菜肴；大的蒸碗翻入铤碗上汤出菜，现作为酒店蒸盆子的前身，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普通农家妇女也以能仿做几个二流子席菜而引以为豪，桌子上大家品味论菜，津津乐道……

历史浪潮，风起云涌，石泉二流子席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1935年冬，传闻何继周（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设二流子席十八桌，宴请相邻、盟友兴师起义，成立陕南游击纵队，从此踏上革命征程。1987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方案，石泉籍流落台湾的官兵，有机会回到家乡，当他们吃到二流子菜肴时，不禁老泪纵横：就是走到天涯海角，心里装的还是这家乡的味道……

也许，这就是石泉二流子席的无穷魅力！

（作者单位：石泉县史志档案局）

任水情

词曲 张戏全

1=A $\frac{2}{4}$

♩=75

| $\overset{5612}{\underset{\cdot}{3}}$ - 6 5 3 5 2 3 1 2 $\overset{35}{\underset{\cdot}{3}}$ - 3 2 3 5·3 2 2 7 6 3 5 6 3 2 7 6 1 -) |

||: 5·6 1̇ 7 6 | 5 - | 6 1̇ 6 5 5 3 | 2 - | 3 2 3 5·3 |

潺潺任河水悠悠任水情任河水呀
潺潺任河水悠悠任水情任河水呀

| 2 7 2 6 | 3 5 6 3 2 7 6 | 5 - | 5·6 1̇ 7 6 | 5 - |

任河水两岸青山最秀美清清任河水
任河水茶马古道最壮美清清任河水

| 6 1̇ 6 5 3 1 | 2 - | 3 2 3 5·3 | 2 7 2 6 | 3 5 6 3 2 7 6 |

漂流云中飞任河水呀任河水碧波荡漾心陶
情哥梦中回任河水呀任河水廊桥故事讲给

| 1· 2 3 [※] | 5·6 6 6 3 | 5· 3 5 | 6·6 5 3 1 | 2 - |

醉啊风景美如画啊风儿轻轻吹
谁啊夜色美如画啊月儿悄悄睡

| 3 2 3 5·3 | 2 7 2 6 | 3 5 6 3 2 7 6 | 5· 2 3 | 5·6 6 6 3 |

一路欢歌一路笑捧着浪花向前追啊情丝千万
一生等待一世情春去冬来盼郎归啊情丝千万

| 5· 3 5 | 6·6 5 3 1 | 2 - | 3 2 3 5·3 | 2 7 2 6 |

缕啊缕缕吐芳菲任河水呀任河水
缕啊缕缕吐芳菲任河水呀任河水

| 3 5 6 3 2 7 6 | $\overset{1}{1}$ - | $\overset{2}{1}$ · 2 3 :|| $\overset{结束}{1}$ - | 3 5 6 3 2 7 6 |

魂牵梦萦心相随随啊随魂牵梦萦心相

慢 $\overset{(1\ 2)}{1}$ - | 3 5 3 5 | 6 5 6 | 5 -) ||

随

滨江长廊走来回

□ 刘全军

安康文化 2019.3

有那么两三年，我总爱在黄昏时分去紫阳县城对面汉江南岸的滨江长廊潇洒地走个来回。一个来回，一身轻松，一世轻松。来来回回，走读了风景，走过了四季，走逝了岁月，走丢了“何事辛苦怨斜晖”的如寄人生。时常思量，每天在滨江长廊走来回的熙攘人流中，有多少人留下了欢笑，有多少人留下了愁绪，有多少人留下了印痕，有多少人留下了背影。来回走过，所有人都只是长廊上的匆匆过客，所有人都只是用脚在丈量长廊的尽头，在长廊上心念吉祥测量人生的脚步。汉水悠然东逝，群山苍翠透迤，碧空白云浮游，人走在长廊上只需打个来回，长廊却在人的脚下越走越长……

滨江长廊是紫阳县文笔山风景区四大景观之一，项目名称为滨江商业步行街。商业街方兴未艾，长廊却成了汉江南岸另一道风景线，文旅产业的勃兴促进消费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凸显，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相信不久的将来，商业街也会成为消费者“有时间消费”“有地方消费”的体验

区和聚焦区。紫阳山城依山临江，有秀美的山，有清幽的江，城市的人居高度得天独厚，优稳、惬意、健康的慢时光生活描绘茶香歌甜美好悦读蓝图。滨江长廊对于外来游客来说，也许只是行走的风景，但对于紫阳人来说，却是提升幸福指数的生活场景，是人文情怀随足迹延展而得以升华的温馨空间。

汉江大桥飞跨南北，架起“一江两岸、一城四区”县城总体布局骨骼，结束了“晓渡江津江水平，舟人荡桨见潮生”渡口历史。凡事随缘皆有味，坐在“望江亭”歇息，常听紫阳本地人在一起闲聊，聊的话题看似无聊却也有趣，有时竟然争论得面红耳赤，争论完了，一阵江风吹拂，又都开怀大笑起来。话题一说，滨江长廊自2013年底竣工使用以来，有多少游人走过？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一年四季，人来人往，关于游人的数据在滨江长廊上可能永远都没有定准，只有天知道了。话题二说，滨江长廊到底有多长？官方数据显示是3.5公里，但没人确信，甚至

有许多人用脚步实际丈量过，但都是各说各的，因为人各有异，起始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闲话闲说，不可较真，不管咋说，人们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内心是舒畅的，表情是自豪的，感觉是幸福的。“南山竹子节节高，郎吹笛子姐吹箫”，江上打鱼人一阵高亢响亮的民歌声，奏响了紫阳茶香歌甜的新时代乐府，所有人的心绪都跟着歌声一起飞扬，飘向到遥远的天际。

从容自如走在滨江长廊上，没有季节禁受，没有时间限定，没有身心羁绊，想啥时走就走，想怎么走随意，只要舒心敞快就好。不过，到滨江长廊健步走，还是春秋季节最爽。春天万象更新，江水柔静，野草幽香，树木葱郁，人走在长廊上如同走在春天里，荡漾的心旌往往让人无法控制脚步，走着走着就忘情地摇身变成了春游的旅客了。进入秋季，轻寒正是可人天，凉风有序，江水清冽，草木摇落，秋意都栖息在农家里，游戏在渔船上，梦寐在田野里，人走在长廊上最好莫多想，只管迈开步伐，昂首挺胸朝前走就是。冬天寒风吹彻，在长廊上一个来回走下来，“看尽行人，唱彻阳关曲”，世事乘除，人生劳逸，都在一念中分之间犹作浣花梦。夏天到长廊上行走一般要等到太阳落下，过了汉江大桥，先在“紫阳养生谷”口的码头上停歇一阵，享受一下沟口呼呼劲吹的山风，或者伫立在望江亭上，感受“草

色直连天色远，风声长送浪声来”的意境，然后再踏上长廊，随着脚踏木条发出的“咚咚”节奏声，湿漉漉的空气中泛着一缕缕幽微的鱼腥味，茂密婆娑的绿树间传来鸟鸣虫唱，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怡人和安逸慰帖，瞬间将人包裹得严实，脚步也就更加坚定有力了。

如果形象的把汉江大桥和任河嘴大桥比作是滨江长廊东西两头的“挑担”，那么亲水广场就是连接“焊点”。广场面朝汉江，视野开阔，县城全貌一览无遗，在长廊上来回行走的人都会在这里驻足停歇，静观江河水从脚下从远方流向远方，凝视山城的旧貌新颜，总会从一棵树或一排拆迁遗留的残垣里唤回渐行渐远的乡情记忆，不由得放开喉咙对着江水“哦嗨——嗨”吼叫几声，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了。广场正南壁上镶嵌巨幅横轴卷式“紫阳汉水文化艺术墙”浮雕，以大巴山地貌为背景，浓缩紫阳汉水文化地理的今古传奇，气势恢宏，雄阔壮丽，历史烟云和时代变迁“终一目之所加”，堪称“解读紫阳”的山水人文杰作，推动了文明互鉴丰富了人文交流。在滨江长廊上走来回也不过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却恍然走过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窗口，岁月的足音留在长廊上，留在千百回依稀梦见的岁月里。青山依旧，绿水长流，在滨江长廊走来回，也就是在人生走来回。

（作者单位：中共紫阳县委宣传部）

舌尖上的陕南味道

□ 巫其祥

安康文化 2019.3

陕南指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辖28个县区，面积约69929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位于我国秦巴山区中心地带，地处汉水中上游流域。陕南是一块神奇的热土，是祖国乃至世界的一块宝地。陕南秦巴山区、汉水流域历史悠久，开发较早，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和发祥地之一，同黄河流域一样古老，早在我国夏商周时期即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人类文明发展而赫然载入史册。这样的地方，无疑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这样的地域，诞生的饮食文化，无疑非同一般。陕南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宝库，陕南民间蕴藏着中华古今饮食文化的富矿。

陕南历史悠久，秦巴山区、汉水流域是华夏文明较早的开发区之一，是人类先祖起源地之一，境内有许多石器时代遗址。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蓝田猿人、洛南猿人和郧阳猿人先民遗址距今约115万年左右。西乡县李家村文化遗址发现的水稻籽粒和窖穴、陶灶，说明早在1万至7千年前，陕南先民已有了“万耕火种”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由茹毛饮血过渡到烹饪熟食时代，如今遍及陕

南山区的烧苞谷棒子，即是先民们上古时代由生食进化到熟食后，用火烧烤的一种食品。其源可上溯到中石器时代。陕南的饮食文化始源几乎与中华饮食文化始源同步。如今的“火灰食”，以及推广到全国的“白火石余汤”，就是上古烧烤阼段的“活化石”和石烹遗存。

陕南的菜肴很有特色，它是陕菜、川菜、鄂菜、粤菜、豫菜的“边缘”菜系，但其中川菜的味道稍重些。这与陕南与四川交界和陕南人十有八九是外来移民其祖籍是四川、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有关，因川人、湖人嗜辣，陕南人也嗜辣，但却没有川人、湖人嗜辣那么浓；川人、湖人嗜酸，陕南人也嗜酸。在陕南，许多蔬菜都是可以用来泡酸菜坛子的（陕南民间俗称“净菜”），如豆角、萝卜、白菜、黄瓜、辣椒、豇豆、蒜薹、蒜头等等，或用萝卜茵子、白菜、青菜、苋菜焯成酸菜。酸菜的制作颇为简单，用一土陶瓦坛，置凉水或冷水，加粗盐、白酒即可。稍复杂些可再加少许花椒和炒成焦状的生大米，据说加此两种可使酸坛不发霉，泡出的酸菜更清脆爽口。

在陕南，净菜坛子和酸菜缸几乎成了居家必备。炎炎夏日，一碗白粥或苞谷糊糊佐以几许酸菜或净菜，开胃消暑，悠哉乐哉。

与酸菜合炒的肉菜，则是陕南菜肴的特色之一。一般陕南餐馆，都有酸净菜炒大肠、酸净菜炒腰花、酸辣肚片、酸辣猪头肉、酸辣羊杂碎、酸净菜炒腊肉、酸辣小鱼之类的招牌菜。小鱼是陕南江河湖塘特产的一种小鱼，仅三、四寸长，捕捞起来挤出肠肚再用文火焙干，入酸辣合炒，头刺均可食，其味醇香。这种小鱼的品种有桃花鱼、小麻鱼、沙棒鱼、白条鱼等，高山河流中还有一种十分珍贵的钢鳅鱼。

陕南人还喜食一种“边缘”蔬菜，如南瓜的花和嫩苗尖、辣椒的嫩叶、红苕的藤尖和叶柄、茄子把把，豌豆的藤尖、作绿肥的嫩苕子，还有老南瓜皮、木槿花、玉兰花、栀子花等等，都可以做出风味独特的菜肴。谓之“废物利用”。

陕南多山，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山珍野味也是陕南菜肴的特色。过去野鸡、野鸭、野猪、野山羊、野兔子、果子狸、麂子，鹿子、獐子、獾子、蛇等等都能在酒家食肆里吃到。如今动物保护，明目张胆地是吃不到了，但在边远的集镇上，或许还能觅见，野猪肉、野兔肉是可以吃到的。这些野物肉（除开保护动物）或炒或焖，其味独特。

陕南山大沟深，地貌复杂，地处北亚热带，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山野菜资源十分丰富，品种繁多，据调查，陕南常采食的山野菜约150余种。分布广、贮量大、质量好，无污染，并具有天然纯净，营养价值高，保健功能强，风味独特等特色。祖国医学很早就有用山野菜治病疗疾的传统。如荠菜可利肝明目、和脾健胃、利尿解

毒等药效；苋菜能安神补心，治神经衰弱、防癌抗癌；鱼腥草具有清热解毒、抗菌等功能，等等。正如古人所说：“以其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山野菜是目前风靡世界的健康食品之一。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食用蔬菜出现“返璞归真”，即“回归自然食野菜”。山野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如陕南的商芝肉早已奉上国宴；鱼腥草、马齿苋、野山笋、野山菌等早已走上餐桌；无论在陕南餐馆、酒店，或是在百姓家庭，都可以吃到；橡子凉粉、神仙豆腐等更是山野菜加工的珍品，这是陕南菜肴的又一特色。

陕南多水，号称“水乡”，自古有“鱼稻之饶”。除汉江、丹江而外，还有许多大河溪流、湖泊库塘，因而水产也很丰富。各种鱼类和鳖、虾、鳅、鳝，或煎或炸或蒸或烧，组成了陕南菜肴的又一特色。其中清蒸汉江鲤鱼的做法近似于粤菜。汉江水质优良，所产汉江鲤鱼其肉质鲜嫩，味道特美，远优于著名的黄河鲤鱼。还有一种高寒溪流中特产的一种名贵大鲵鱼（即娃娃鱼），生长在岩石深处，其肉细嫩无比，其味鲜美无边，因而如今已物以稀为贵了，市场上卖到70—80元一斤。

陕南位于我国秦巴山区，南有大巴山横亘，北有大秦岭屏障，大秦岭和大巴山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知名的大山，古人说：“自古名山出名刹”，佛道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均较早，斋席、素菜的烹调，享誉周边诸省，也大大丰富了陕南菜肴的品种特色，于人们的健康大有益处。俗话说：“粗茶淡饭保平安”。

陕南是丝路的源点，即“一带一路”的源头，自西汉陕南汉中市城固县人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古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罗

马，长达约2万多公里。汉唐之际，古丝路繁荣了近10个世纪。张骞从西域带回了许多内地不曾有的果蔬物种，如石榴、核桃等在长安附近和陕南家乡种植。推动了中西饮食烹饪文化和西部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陕南菜肴。加之西部回族迁入陕南，又增加清真菜，丰富了牛羊肉的烹调技艺，它是陕南饮食又一特色。

陕南秦巴山区是我国中药材的重要产地，为全国四大药带之一，素有“天然药库”“药材摇篮”之称，有“秦巴药材甲天下”之誉，民间蕴藏着大量药膳资源，当地山民广泛应用本地地产的地道药材制成药膳，用来治病疗疾、瘦身美容、健脑增智、安神补心、延年益寿。药膳是陕南饮食又一大特点。

陕南的小吃也很有特点，像蕨粉皮子、米浆馍、汉中王家核桃饼、浆水面、汉阴油炸米饺、商洛洋芋糍粑、浆粑馍、猪血豆腐干、柿子馍、艾馍以及打入全国名小吃的米

面皮、炕炕馍等等。记得小时候在汉中北大街十字附近有一专卖米浆馍的小店，现做现卖。只见师傅将磨好的稠米浆倒入蒸笼中一只只茶杯大小的竹篾圈中，将蒸笼一层层垒好，用猛火蒸它十来分钟，那一个个雪白如银顶尖开着花的米浆馍便可以出笼，其香味诱人食欲，引得购买者一阵阵欢呼。

吃在陕南，吃的都是些家常的东西。用陕南人的话说，都是些上不了“席面”的东西。有些是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东西。陕南是个居于秦巴大山中的偏僻穷壤之域。是沐浴着两千多年风雨历史的名不见经传的大山区。它的安详宁静和善良的百姓，纯朴的风情构成了它“吃”的风格。或许你到陕南，想吃的就是这一份质朴和清纯吧！也就是舌尖上的陕南特殊味道。舌尖搅动的不仅仅是对儿时记忆中某些美食的食欲，更多的是异乡人内心深处那一抹乡愁，是饮食中浓缩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

（作者单位：汉阴县经贸局）

◎文化信息◎

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专家 开展安康民间丧葬习俗调研

7月15—17日，受安康市民政局和安康市卧佛山公墓公司委托，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承元带领杨运庚、杨明贵等教师赴紫阳县洞河镇、宁陕县城关镇开展安康民间丧葬习俗调研。调研组一行通过与地方民俗文化学者及民间风水先生的座谈交流，对安康民间丧葬观念、丧葬仪程有了较全面的掌握。调研期间，调研组就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农村丧葬仪礼改革等现实问题，征询了部分地方专家和群众的意见。

7月22日，在形成调研报告的基础上，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与安康市卧佛山公墓公司联合举办了“卧佛山公墓下葬仪程研

会”。调研组全体成员、著名作家李春平及安康市卧佛山公墓公司管理层骨干出席研讨会。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卧佛山公墓下葬仪程》文本。卧佛山公墓公司认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制订的《仪程》操作程序清晰明了，条文内容简明易懂，对规范公墓丧葬仪礼、传承地域丧葬文化遗产具有积极意义。

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承元在研讨会上表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将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殡葬服务与管理机构的合作，争取在传播文明丧葬新理念、传递殡葬改革正能量的工作中作出更大贡献。

镇坪的季节

□ 胡裕成

春

乌龟凸上那树野桃花开了
天坑峡才睁开沉沉的睡眼
一个呵欠，风涌南江
向南
漫过牛头老店
再向南
浪一般直冲鸡心岭上
天，倒挂着
春，由北而来了

夏

七月，初七无眠夜
朝天门的哈皮蟑螂
在第九阶左角的缝窝里
爱抚着网恋了半生的蚊妹
我心疼着你的辛苦

一路乘风破浪踏江而来
差点儿中暑而亡
为补偿你，我的宝贝
我要带你翻山去石砬
那里，腊肉喷喷香
岩耳乌鸡汤
那里
天不烤，地不烧
你我逍遥的好地方
蚊妹窃喜，视频蚊娘
不料，一声断喝
震得黄鹤楼三层檐角卯榫
嘎嘎作响
冇得哈数
国心之地，化龙镇守
拐子前往，岂不命殇
蚊螂惊嘘：
罢了，罢了
你我不去，人间天堂

秋

冷雨初歇的晨雾里
 白家的青草坪，黄了
 午后的曙河口才打开三筒万花
 一筒收尽飞渡峡的色魔
 一筒深藏剪刀峰的寂寞
 向北一筒，艳舞云歌
 河口之下，水天之间
 斑斓舞裙
 裹不住腴臀绰约
 咪波盈挺 不抚自虐
 掀开了鸳鸯坡上
 八月扎的月白
 顿时，满筒乳香成河

李太白历此
 观三筒，脚葩腿软
 如痴如醉，嗟叹：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冬

化龙山的雪
 来得早，去得晚
 身居高位而不张不狂
 没有林海雪原的苍莽

不见原驰蜡象的雄壮
 沉静冷默而刚毅如常
 有雪的化龙山 像极了
 头戴斗笠身披蓑衣
 风雪夜归的老父亲

 叮当沟的雪 风流伤情
 一来的时候就飘逸如仙
 相拥在崖头上
 马蹄莲一样 一朵朵的
 飞落在黑石条栈道上的
 银蛇一般在岩壁上蜿蜒
 初醒，伸个懒腰
 却扑簌簌摔得粉身碎骨
 别离伤恨 泪凝如瀑
 两帘犬牙悬挂 冰清玉洁
 盐背子顶着正午的太阳
 挥汗如雨
 草码子咔嚓咔嚓
 亦步亦紧
 号子一起 声势震山
 亮闪闪一片碎落……
 人去痕静
 聆听千年冰封脆响
 叮当 叮当
 如泣如咽

(作者单位：镇坪县政府)

细雨霏霏上茶山

□黄平安

邂逅茶山，是在一场细雨霏霏的春雨中。

那天，去拍一个小镇的全景。当我完成拍摄任务正要转身下山时，身后一片翠绿的山景突然撞进了我的视野——烟雨迷蒙的山景，曲线柔美的茶山，层次分明的茶带，忙忙碌碌的采茶人，似一幅绝版的水墨丹青，伴着春山里的鸟语花香和欢歌笑语，美得令人心醉。

此前，我去过两次茶山，一次是跟一批作家和摄影家到茶山采风，还有一次是参加某地的茶歌大赛。在现场，面对如诗如画的茶山、风情万种的茶姑和婉转悠扬的茶歌，我却少有感动，且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但到底少了什么，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春分后清明前，是陕南绿茶采收的黄金时节，这半个月左右的茶谓之明前茶，毫不夸张地说，是一天一个味，一天一个价。因此，尽管雨中采茶会影响到茶叶的品质，但采茶的节奏却跟流转的光阴一样丝毫没有放慢。茶山的形态是任性的，线条是柔美的，一条条的茶带随着山势而蜿蜒，一条有一条的风景，一带有一带的韵味，似层层梯田，

像条条玉带。“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这绝美的古句恰到好处地应和着眼前的美景，而绵绵细雨和茫茫云雾又为茶山平添了几份妩媚和灵秀，二者亲热地缠绵在一起，相偎相依，柔情似水，如一对温柔甜蜜的恋人，令人羡慕。

远看茶山，采茶人随意地分布在茶带间，没有整齐的队形，没有人为的组合，但看似随意，却又是那样和谐与自然。在那层层叠叠的曲线间，身着各色衣衫的采茶人似天女散花一般，身挎不同的篮子或袋子，双手在翠绿的嫩叶上翻飞。雨雾中，时而“子规声里雨如烟”，时而“微雨燕双飞”，茶山，也因此多了几分空灵和诗意。时有云雾飘过，茶采人若隐若现，亦幻亦真，这一刻，人人都成了云中仙子。茶叶，之所以会有妙不可言的韵味和无与伦比的魅力，我想，与这些诗性的云雾关系密切，是高山云雾滋润了绿色的精灵，是秦巴流岚赋予了茶叶的神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雾不仅诗化着茶山的外表，也丰富着茶叶的内涵。难怪，当我们品茶时，胸中总是有诗情升腾，画境萌生，禅意涌动，世间也（下转91页）

安康沿革史话

□方 琛

安康文化 2019.3

安康北接三秦，南邻巴蜀，自古为陕南重镇，今称汉水明珠。迄今2300余年的历史沿革中，曾经有过西城县、魏兴郡、金州府、兴安府、安康地区等称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域名，都包含着一个或若干个时代的兴衰沉浮，成为安康繁衍生息的特定标记，值得我们铭记、传扬。

第一集 西城风云

秦头楚尾千古悠，金戈铁马几时休。

兴亡成败化云烟，青山依旧傲春秋。

在今天安康城众多恢弘的地标建筑中，有一座耸立在滨江大道的西城阁。它标志着2000多年前我们首个“县衙”的所在地，透出安康文明史起点的洪荒与苍凉。汉江之水在它的脚下“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诉说着遥远的金戈铁马、世事沧桑……

公元前2200年前后，夏把天下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今天的汉中、商洛、安康就属梁州的一部分。商周时期，安康成为庸国的封地，史称上庸，为“群夷之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

好斗、强悍的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阴、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

公元前六世纪初，楚庄王继位之后，荒淫无度，沉湎酒色，不理朝政，还下令有人胆敢进谏一律处死。大臣伍举冒死问他：山上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不叫是什么鸟？庄王说，它一旦鸣叫定会使人们震惊。庄王为忠臣的精神所感动，从此严以律己，整饬朝政，励精图治，国力大振。楚庄王三年（前611），庸国趁楚国灾荒，起兵东进，不料反被楚庄王联合西部的巴国、秦国所灭，国土被楚、秦、巴三国瓜分，“庸人自扰”成语便由此而来，意即“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楚庄王实现了“哀兵必胜”的壮志，留下成语“一鸣惊人”的名典。

楚国将其西部竹山、郧阳至陕南汉中的广大地区设置汉中郡，治汉中南郑，在今安康设立西城邑。此后大量楚人经汉水和陆路西进到达上庸，即汉中郡一带，使楚人占到安康总人口的七成之多，促进了这一带农耕

经济的进步与繁荣。

公元前356年秦国实施商鞅变法，日益兴盛。当时，秦国制定了严酷的律令，禁止民间因琐事打斗、诉讼，鼓励生产；同时为了巩固行政管理制定了郡县制，开始在诸国推行。秦民遂“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田完世家》）。前350年，秦的国都从陕西凤翔迁到咸阳，开始大举扩张，于是汉中、西城处于向东扩张的前沿之地。秦在具体制楚时，采取了外交欺骗与军事进攻互相配合的方针，派纵横家、谋略家张仪出使楚国。

为了打破齐国和楚国的同盟，张仪用重礼贿赂了楚怀王宠信的近臣靳尚，然后去见楚怀王。张仪答应把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送给楚国，条件是楚与齐断交，与秦交好。楚怀王听了十分高兴。他不顾客卿陈轸和三闾大夫屈原的反对，在谀臣靳尚的支持下，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商於，为古代秦楚边境地域名，是张仪欺楚名典。辖区主要在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春秋战国时期，商於之地原属楚国，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后来商於被秦国占领而成为秦地，卫鞅破魏有功，被封于商十五邑（即“商於”之地），该地后来成为商鞅的封地。楚怀王十分渴望得到原本属于自己的故地，所以才轻易上当。

于是，楚怀王一边去跟齐国绝交，一边打发逢侯丑跟张仪去秦国接收六百里土地。可到了咸阳城外，张仪假装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以治病为名溜走了。逢丑侯一连等了三个月，等到张仪上朝，连忙询问商於之地六百里之事。张仪说：“六百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说的是六里，是我自己的土地，不是秦国的土地，楚王大概听错了。”

逢侯丑这时才知道受了骗，马上回国向楚怀王禀报。楚怀王非常愤怒，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奸诈小人，并立即发兵去攻打

秦国。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秦、楚两军大战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于此役者七十多人，兵士客死八万余人。怀王又派兵袭秦蓝田（今陕西蓝田），又败于秦。楚腹背受敌，割两城予秦（南郑、西城）。秦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秦汉中郡，依秦制设西城县，楚的西部门户于是落入秦人之手。

公元前304年，通过秦楚和谈，秦国将上庸之地还于楚国。楚将汉中郡一分为二，置汉中郡（治南郑）、上庸郡（治竹山）。前280年，秦伐楚，再度占取汉中郡西城县。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把汉水中上游划为汉中郡，郡治由南郑东移六百里至西城县，秦之东南疆域东推至锡穴（今白河县）北与湖北郧阳接壤处，秦头楚尾的疆界至此稳定下来。同时从关中大量移民至西城，强制文化趋同。

元至元八年（1271），“连年战祸与灾荒，地旷人稀，金州降为散州，下不辖县，西城废。”（新编《安康县志》），至此，西城域名共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九朝1583年（不含楚治300年），是安康所有历史域名沿用最长的。这也是造成绵延至今的安康秦风楚习俗、安康与关中方言相近现象的历史渊源。有学者认为，屈原由于与昏君楚怀王意见相左而失宠，遭流放。其《九歌·国殇》描述的正是楚国将士在秦楚丹阳蓝田之战中奋死抗敌、为国捐躯的悲壮场面：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今天，西城县的烽火狼烟早已化作沧海桑田，秦头楚尾的千载恩怨也成为一纸笑

安康文化 2019.3

谈，唯有每年端午节翻腾汉江的龙舟竞渡还在慰藉着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不朽英灵。

第二集 魏兴乱世

乱世飘摇叹零丁，尔曹挥鞭指魏兴。

七步诗篇犹在耳，豆萁相煎祸百姓。

公元220年，曹操长子魏文帝曹丕做了皇帝后，要想除掉弟弟曹植，以曹植未能及时吊唁先父曹操此大不孝为由，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咏出这首《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万般无奈，遂收回成命。翌年，曹丕取“曹魏兴盛”之意，改西城郡为魏兴郡。可叹安康大地，甫自摆脱秦楚交恶，又陷入漫长的曹魏相残、秦晋之争的连绵战乱之中，曹氏“豆萁相煎”却让百姓埋单。

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大军驻汉中写给后主刘禅的《前出师表》中，留下“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名句。相隔7年，一个“相煎”，一个“乱世”，非常不幸地成为魏兴郡300余年的主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被他们不幸而言中，成了“曹魏兴盛”的莫大讽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成王败寇俱往矣，有两个关键人物依然载入史册，不得不书。

孟达，陕西扶风人，本为刘璋属下，后降刘备，三国三大叛将之一、魏蜀争上庸中的反复无常人物。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取汉中，复立汉中郡，于汉中东部置安阳（今石泉县）、西城郡，隶属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秋，刘备遣关羽沿汉水东下，命孟达从秭归（辖属湖北省宜昌，屈原故里）进攻房陵（湖北房县）和上庸（湖北竹山县）。上庸太守申耽、西城太守申仪兄弟皆投降蜀汉，刘备加封申耽征北将军领上庸

太守，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今安康）太守，各治本土。孟达时任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此其时，孟达听闻刘备下属议论其不忠不义三宗罪：关羽受困，见死不救其罪一；私通曹魏、居心叵测其罪二；与刘封不合，贻误军机其罪三。遂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七月，曹丕率大军南下至谯（河南潢川县境），孟达即率部曲（家仆）4000余家降魏。曹丕爱孟达将帅之才，委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治房陵），以孟达为新城太守，并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孟达共袭刘封。上庸太守申耽叛蜀降魏，刘封败走石泉，在饶峰关会合守关兵马，与魏军大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败走成都。

建安五年（227）三月，诸葛亮向刘禅上《出师表》，率20万兵马进驻汉中，准备北伐曹魏。为了分散魏军兵力，除联合东吴外，又派郭谡争取魏新城太守孟达归蜀，威胁南阳，牵制魏军。太和二年（228）春正月，司马懿率兵讨伐，八日疾行一千二百里至新城（湖北房陵）。诸葛亮遣偏将至西城、木兰塞道（今旬阳城东北），吴亦派偏将至安桥（今湖北保康县境）援救孟达，均被司马懿派兵拒阻。司马懿率兵渡汉江，直抵新城，激战16天，破新城，斩孟达，魏兴复归于魏。后世有人主张诸葛亮施空城计，智退司马懿之西城县即今安康城，笔者不敢苟同。其一，空城计属文学作品，史上未必确有此役；其二，司马懿攻伐之新城在今湖北，距魏兴尚有千里之遥。当然，倘若作为旅游文化之噱头则另当别论了。

陕西省旬阳县庙岭乡王家山有古冢，墓高据于山巅，呈覆斗形，封土高约3米，周长约10米，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民间传说系孟达之墓。

第三集 金州之殇

横空浊浪万钧威，千年城郭一时摧。

忍看文华付东流，金州一去不复回。

自西魏废帝（元钦）三年因越河川道出款金改东梁州为金州（治西城县）至明万历十一年（554—1583），华夏大地的战争与和平、毁灭与建设、天灾与人祸无不金州镌刻着深深的烙印，写下波澜壮阔的史篇。

金州的第一项壮举是迁城。原西城故城在汉江北岸，汉江在今汉白公路一带。随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汉江逐渐向北改道，不断向故城脚下推进。北周天和四年（569）西城县更名吉安县，这年吉安县城（原西城县址）迁于汉水南岸——即安康老城。隋朝大业三年（607）撤州复设西城郡，辖西城、金川（吉安更名）、安康（宁都）、丰利、石泉、洵阳县。时黄土县（旬阳蜀河）划归上津（湖广上津郡），时西城郡辖区与今安康地区大略相同。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全国共设十五道，金州初为山南道，后为山南东道。经裁并，金州领西城、平利、洵阳、安康（757年改名汉阴）、石泉五县。

北宋初年，将全国十五道改称十五路，南宋疆域缩小，辖境仅有十七路，时金州属京西南路。淳化五年（994）置京西路安康郡（金州），金州领西城、安康（今之汉阴）、平利、洵阳、石泉五县。

宋元世祖至元（1264~1294）年间，金州降为散州，撤销附郭西城县，将平利、洵阳、汉阴、石泉的县级建置降为巡检司。金州领平利、洵阳、汉阴、石泉四巡检司。此时白河县亦复归金州。

明洪武四年（1371）守御所指挥李琛始建砖城。成化八年（1472）置白河堡，1476年巡抚都御使原杰置白河县，先属湖广郧阳

吉挹，字祖冲，今陕西渭南人。太元年间，任魏兴郡太守，加封轻骑将军，因抵抗苻坚有功，拜为员外散骑侍郎。

公元227年，魏国太尉司马懿发动政变，消灭曹氏权贵，掌握魏国大权；268年灭蜀，279年灭吴，完成三国归晋的历史转折。

前秦（350~394）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350年氐族人苻洪占据关中，称三秦王，共历六主，享国四十四年。因氐族人皆为苻姓，又称苻秦。352年苻健称帝，定都长安（今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与东晋断绝。晋系汉人正统庙堂，因而视苻秦为反叛逆贼。

晋太元三年（378），秦军大举侵晋，以征南将军苻丕总督步骑七万攻襄阳。此时魏兴（安康）属晋所治，由太守吉挹驻守。秦军为顺利南下直取襄阳，便先攻拔魏兴。苻坚调梁州刺史韦钟率军自汉中经石泉、汉阴，以步骑五千为先，包围魏兴。吉挹于城南九里魏山筑垒迎击，杀犯军五百。苻坚命韦钟绕道攻取襄阳，吉挹又率兵截击，杀伤甚多。韦钟回师围攻魏兴城池，吉挹坚壁固守，终因寡不敌众，自刎未遂，城破被俘。被押期间，吉挹自草遗书，密授参军史颖逃归南京，向晋庭报告。吉挹拒降绝食而死。魏兴为秦所有，东晋朝廷追认为其益州刺史。晋武帝太元七年（382）桓冲伐秦，又收复魏兴郡。为了纪念太守吉挹英勇抗敌，人民在魏山（今青峰与吉河交界处）建吉挹城以示铭记。

552年，西魏伐梁，攻陷魏兴郡（汉西城县），复以其地置东梁州。两年后改东梁州为金州，魏兴郡沿袭333年（期间魏兴与西城并存，只是由于战乱频仍、政权更迭而时废时续）而终。

府，后改属金州。至此，金州领五县。1477年以金州兼属郧阳巡抚。正德七年（1512）分汉阴及州西南地置紫阳县。嘉靖年间（1522~1566）分守关南道自商州移驻金州（时汉中、安康、商洛属关南道）。1560年，石泉、汉阴划归汉中府，金州仅领四县：洵阳、白河、平利、紫阳。

金州时期，在军事方面，南北朝宋、梁与西魏在此发生多次争夺战；唐末至五代十国，唐与前蜀、后唐与后蜀，也曾争战不息；到南宋，陕南成为抗金、拒羌的战略要地，军队云集，战事频繁，战争规模很大。公元935年6月，后唐金州防御使马全节悉散家财，激励将士，出奇兵拒战，以死相拼，经多日激战，后蜀兵无法攻下金州城，只得退去，金州得保。

王彦，上党（山西）人，北宋抗金名将。绍兴三年（1133）正月，金兀术入侵金州，其部将撒离喝率军驰至旬阳。金州知州王彦退保石泉县。金人入均州、金州，王彦退兵至西乡。二月，金人攻饶风关，王彦与吴玠拒战。宋军不支，溃败，王彦收余兵奔达州。五月，王彦遣兵至汉阴县，击败伪齐帝刘豫部，恢复金州。时金州处军事要冲，多年仍为宋有，赖王彦文治武功，人民千秋祭祀。

人文底蕴深厚，兴建文庙、双溪寺，推出以“古洞仙踪”为代表的金州八景等古建筑；编纂《创修兴安府志》和紫阳、旬阳、汉阴、石泉县志；涌现白居易、姚合、陆游、鲁得之、刘宇、陈师道等名人大师及其作品，成为安康人文的伟大奠基。

漫长的金州时代先后产生过许多蜚声九州杰出人物。佛界高僧

怀让（677~744），金州人。唐垂拱二年（686），到荆州玉泉寺，拜宏景禅师出家。唐先天二年（713）往南岳般若观音

台，弘扬慧能学说，开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怀让一生忠实继承慧能衣钵，主张“心性本静，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心即是佛”，自称“顿悟法门”，又叫“顿门”，其宗旨“净心、自悟”四字。修行方法简便，僧徒众多，成为中国佛教禅宗正统。他和行思两人先后分出禅宗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其中以南岳怀让门下的临济宗流传时间长，影响大。晚唐和宋代传入朝鲜、日本。怀让圆寂，葬于南岳，唐敬宗李湛赠谥号大慧禅师。

刘致忠，河南延津人，万历十年（1582）任关南道，驻守金州。刘致忠到任即兴礼劝学，平徭薄赋，除强禁奸。次年仲夏，淫雨如注，汉水暴涨。刘致忠于城外备舟筏，城内苦筑加固堤防，封严东北两门，仍难以抗拒，洪水越堤数丈灌城。郡府属官催促逃水，他说：“与民宜属一体，如去，民其鱼矣！”留城指挥抢险，乘筏、越树、攀房，一昼夜后方由善水者救出。眷属五人死于水难。水退，即筹资筑新城于赵台山下，又增高加固万春、长春二堤。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归家途中无舟车代步，惟一子携药囊陪送，客死南阳。众于新城立刘公祠，春秋享祀。

凡是清正廉洁、心系社稷的良臣，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金州特产许多已驰名海内外。自唐代始，紫阳毛尖作为贡品已进京入朝。安康土漆在明代著名医药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载：“漆树，人多种之，以金州（安康）者为佳。”故世称“金漆”。特别是平利的“牛王漆”、岚皋的“大木漆”作为朝廷贡品而闻名于世。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雹如鸡卵，猛雨数日。二十三日，汉水涨溢，大水冒州

城丈余，全城淹没，溺5000余人，全家淹死无险者甚多。史载明嘉庆年间（1566）金州有人丁2.41万口（含汉阴），那么城市人口应该不足万人，也就是说溺亡人口过半。这场大水毁了一座城，也终结了一个时代，留下“金州之殇”的惨痛记忆。

第四集 兴安双城

一从阡陌起汪洋，便有众手拓洪荒。

更喜双城拔地起，万千桃李成栋梁。

明万历十一年（1583）洪水毁城后，金州守道刘致忠改筑新城于赵台山下，经二年完工，金州易名兴安州。清朝沿用明制，安康地区仍称兴安州。顺治四年（1647）因新城多有不便，还治旧城，置兴安总镇，理汉中府、兴安州及镇安、山阳二县军务。康熙十四年（1675），关南分守道由汉中迁驻兴安州。

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安州升为府，称兴安府，以原兴安州并汉阴地在府地设县，取“安民康泰”之意，称安康县。次年，分石泉县北部地置五郎厅（治今宁陕龙王坪），嘉庆五年（1800）更名宁陕厅，治老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分安康县地设汉阴厅，辖原境。道光二年（1822），分安康县南部地设砖坪厅（治现岚皋城关）。至此，兴安府辖安康县、洵阳县、白河县、平利县、汉阴厅、石泉县、紫阳县、砖坪厅、宁陕厅，计六县三厅。建置区划及面积与现今安康地区基本接近。

中华民国初年，地方行政建置实行省、道、县三级。从1912年起，全国废除府、州、厅的名称，一律称县，县隶属于省。自此，兴安府退出历史舞台。

回顾安康城池建设历史，要先从西城古城说起。从公元前611年楚灭庸建立汉中郡西城邑到前312年秦设汉中郡西城县，再到

北周天和四年（569），县城移建汉江南岸的1000余年间皆为土城。亦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明洪武四年（1371）甃砖石建城堤，城池的规模为“东西一里二百五十五步（古代五尺为一步大约1.7米，据此换算为933米，下同）”，“南北三百一十步（527米），周六里二十八步（3048米）”。

万历十一年于赵台山下筑新城，“周三里一百一十六步（1700米）”，两年竣工，清顺治三年毁于兵战。顺治四年（1647）复修老城，其后45年间被水淹两次。康熙三十二年（1693）大水，再次迁往新城，同时重建老城。此后，时而抗洪以城为堤，时而防攻以堤为城。嘉庆十三~十六年（1808~1811），对城堤进行整修和加高，老城范围扩大为“周长一千二百九十三丈六尺（约4公里），宽一丈八尺五寸（约5米），正楼四座，敌楼炮楼各一座，南北月城二道，城角添筑炮台六座，东南城根帮筑旱台，素土宽一丈（3.33米），高五尺（1.7米）。城东地势较低，补修墙高三丈六尺（约12米），顶宽八尺（2.6米），底宽一丈四尺（4.6米）”。新城“周长六百九十三丈四尺（2.3公里），排垛墙一千零九堵，高二丈一尺，底宽二丈，顶宽一丈一尺。四门城台四座，正楼四座，每座三间，二层四门。月城台四座，城顶围炮台八座，添建炮台六座，内四城角炮台四座，添盖炮楼。有出水沟二十八道，海漫城砖二层，马道四条”。因老城临江，交通方便，官衙、居民、商店聚集，而新城为屯兵仓库和避水之地，逐渐形成两城并连的格局，俗称南北二山、东西二关、新旧二城。

新城与旧城之间，自东至西依次为东堤、万柳堤（今解放路）、登春堤（今红卫路、金州路）、西堤（石堤）。

明、清时期，全国九起有较大影响的农民起义中，有四起曾转战安康。由于战争的

浩劫，田野农桑不兴，贫民流离失所，使安康数次几近人烟绝迹，对安康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中期，白莲教抗清起义此起彼伏。乾隆五十八年（1793），安康县滔河（今属岚皋县境）人肖贵，最早把湖北襄阳宋之清创立的西天大乘教（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传入兴安，在滔河招徒传经，逐渐发展到安康、紫阳、平利。翌年七月，兴安府先后逮捕肖贵等112人。在四川、湖北等地逮捕白莲教宋之清、齐林、樊学鸣、韩陇等几百人。宋之清被凌迟枭首示众，齐、樊、肖、韩等数十人被杀，白莲教组织遭受重创。至嘉庆三年（1798）正月兵败越岭关，战祸长达数年。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克平利，连营百余里，进入兴安府境，驻张滩、汪岭一带。陕安镇总兵左营游击赵济川，安康县知县吴靖率兵与太平军战于城东金堂寺，太平军获胜，围攻兴安府新旧二城。由东关挖地道破城。知府林映堂伪装道士，由小巷出逃，被太平军识破刺死。安康知县、陕安镇总兵左营游击赵济川、守备李万发、把总周玉祥、经制周国珩等均为太平军所杀。太平军占领兴安后，稍事休整，于正月十四日（3月3日）拔营西进，攻取汉中。

1911年10月22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兴安府。哥老会首领高庆云，联络巡防队四哨发动起义，老城内的哥老会立即响应，里应外合，安康宣告光复。此后省城派南路安抚招讨使张宝麟来安康，哥弟重要头目大都被其杀害；高庆云、胡云山亦在混乱中死去，安康哥老会活动从此终止。

兴安府时期，安康名流辈出，众星璀璨。其中主要有文学大师刘应秋、张鹏飞、董沼、王玉澍、马二南、谢玉珩，以及政军

社会界叶世倬、王希舜、温予巽、黄宽、陈德胜、印光、钱鼎、高庆云等。

一批州府职官、地方硕学潜心耕耘，修成海纳百科、贯穿古今的州、府、县志，续写安康一方的峥嵘史册。

兴安时期大办学校，推崇教育，奠定了安康崇文故地，重教之都的重要基础。集中在新城的就有关南学院、兴安府中学堂（兴安九县联中、今安康中学）、安康第一女子学堂；恒口有双桂学校（恒口小学）。以及文庙、县学（儒学）、文兴塔、奠安塔、兴贤塔等文华工程，留下值得世代珍惜的文化奠基。

以1911年辛亥革命取消州府为标志，兴安府（州）画上封建社会建置沿革的句号。无论兴衰成败、褒贬毁誉都值得我们缅怀、铭记。

第五集 安康新生

风雨如磐唱大江，多少英雄赴沧桑。

一唱雄鸡天下白，人间正道迎康庄。

安康其名，最早见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为安置巴山一带流民，取“安宁康泰”之意，改安阳县（今汉阴县）为安康县。

明末清初，相同的历史又在安康重演。一方面是北方连年战乱，百姓跟随明朝残余势力不断向南撤退、迁徙；一方面是满清政权初定，遭遇沿海仍然效忠明王朝的官民的广泛抵抗。清政府对两广、福建、江浙民众实施强制内迁，一部分移民辗转来到安康开荒垦殖。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原兴安州并汉阴地设安康县安抚流民。

从1912年起，全国废除府、州、厅的名称，一律称县，县隶属于省。1917年，因每省辖县过多，又在省下分设若干道，安康地区各县属陕西省汉中道。1922年，分平利县

南部置镇坪县（治钟宝）。1933年废道，以省辖县，10县隶属于陕西省。1935年为行政方便，陕西省又在原兴安府范围内设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专署驻安康县城东大街，下辖10县：安康、洵阳（1964年洵阳更名为旬阳）、白河、平利、汉阴、石泉、紫阳、岚皋、镇坪、宁陕县。至此，安康地区的格局形成。专署代省府行使职权，并对县实行指导监督。此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1912—1949年的38年间，安康和全国一道，经历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都在安康留下战斗的足迹，演出威武的壮歌。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安康建立第一个秘密组织——“中共安康特委”，开展革命武装斗争，配合红三军过境，发动安康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军第一纵队。1935~1937年红七十四师在安康坚持斗争，建立有20多万人口、总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1936年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与七十四师配合作战。抗战时期，安康一度成为大后方，数十万安康人民参战抗日。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部在安康布设四个军的重兵，构筑三道防线负隅顽抗，1948年4月至1950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白河、旬阳、关垭子、女娲山、牛蹄岭等40多次重要战斗，安康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作出了重大牺牲，共歼敌2.5万余人，人民解放军1300余名将士壮烈牺牲，解放了安康全境，安康人民从此结束了灾难深重的历史。

廖乾五，1886年出生于平利县龙门乡，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早期革命活动家、北伐名将、人民军队创建时期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1927年9月初，廖乾五、

周逸群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被编入由周恩来、刘伯承、廖乾五、周逸群等为成员的中央特别小组。1930年，廖乾五在湖南军委工作期间，不幸被捕牺牲。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安康贡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唯一一支革命武装。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她的前身，是由国民党军陕警二旅中沈玺亭团几次起义的人员相继会合组成、以何振亚部为基础的陕南游击纵队。1936年8月13日按照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部队在紫荆乡刘家大院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并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委，正式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西安事变”后，该部奉命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编入八路军115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期间，安康城先后遭到4次日机轰炸。其中最为惨烈的是1940年9月3日，36架日机对手无寸铁的居民狂轰滥炸。北马道庙台子一家正为小孩做“满月”，除产妇和女婴幸存外，聚会30多人全被炸死，金银巷口“福泰昌”点心铺，一家死伤7人；从老城土西门到大什字，就横陈尸体100多具。几次日寇轰炸安康，共倾泄燃烧弹、毒气弹500多枚，炸死无辜平民800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册，刻下严汉卿、廖乾五、王辛德、王泰诚、张惠民、孟俊岐、罗少伟、章健、何振亚、鲁秦侠、刘华、王范堂等不朽姓名；也留下为安康社会文化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张紫樵、荆凤翔、翁同翔、鲁长卿、凌成佑、董铭竹等人的光辉业绩。

1949年5月，中共安康地委、安康专员公署在湖北郧阳成立。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含五十五、五十七两个师）和陕南

金州人行古道及变迁

□董自常

安康文化
2019.3

在祖国的版图上，古金州（今汉滨区）位于陕西省南部，北依秦岭山麓，南沿巴山余脉，县境内山川交错，山势峻险，沟壑纵横，河流密布。古代陆路长期被称为四方塞地。南北二山群众出行十分困难，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全靠人力肩挑背扛，以步当车。落后的交通环境，致使社会文化、信息交流也闭塞不堪。

人行古道是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为了

生存，与大自然搏斗而开辟的道路。有的通过民间行人自然踩踏形成。但有的通往省府或周边的重要城镇的主干古道，都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为战争、为经商、为移民服务的需要，而广拉农夫，或由当地富商投资，先民们不畏艰险，探索开辟穿越秦巴大山的道路，兴修栈道，穿越天然屏障，最终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官道、马道、栈道和驿道，继而沿线设立驿站、驿所为官府置

军分区开始艰苦卓绝的西进作战。同年11月27日，在我党我军的统战作用下，国民党地方武装安康县自卫团2200余人宣布起义，宣告安康县和平解放，同时成立人民政府。次日清晨，安康城万人空巷，人们出城十里，“箪食壶浆”迎接人民子弟兵入城。

1912—1949年间，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安康，战乱不息，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兵匪一家，民不聊生。唯一的亮点是惠及子孙的一项大型建设工程：汉白公路。该路西起汉中北关，经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安康、平利、湖北竹溪到达白河，全长520公里，1938年建成通车。修这条公路的初衷是为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服务，但在客观上结束了安康无汽车无公路的历史。它把安康各

县、安康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是用人民血汗铸起的一座丰碑。

1950年1月，安康10县市全境解放。200万安康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光辉大道砥砺前行，走向中兴。

1988年9月，安康县更名为安康市，安康地区辖1市9县。2000年12月，安康市更名为汉滨区，安康地区更名为安康市。

2010年，安康市总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占陕西省土地面积11.4%；全市常住总人口263万人，占全省常住总人口的7.05%；辖汉滨区、汉阴县、石泉县、宁陕县、紫阳县、岚皋县、平利县、镇坪县、旬阳县、白河县共1区9县。

（作者单位：汉滨区档案史志馆）

邮传递公文等之用。在两山间的河谷区域，人们循河流地段兴修成谷道。如沿汉江逆流而上到达汉中、长安；顺江而下到达旬阳、白河至丹江的河谷道；有的人行大道逐步形成官道（也叫驰道），作为通往周边省城和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和关隘。除一般民间小道外，这些官道历代官府也将其列入管理，进行整修，以保大道通畅。

据清嘉庆年《安康县志》道路图记载，安康县境内道路有：

四至八到，东西三百里；南北六百二十里。

东至旬阳县青山铺界首七十里，至治一百二十里；

东南至平利县狗脊关界首五十里，至治一百八十里；

南至四川太平厅界岭四百里，至治四百七十里；

西南至紫阳县斑鸠关界首四百里；

西至紫阳县洞河界首二百三十里，至治二百六十里；

西北至汉阴厅简沟界首一百一十里，至治一百八十里；

又西北至汉阴厅、宁陕厅、镇安县燕子岭界首二百八十里，至宁陕厅治四百六十里；

北至王莽山北镇安县小中溪界首二百二十里，至治三百八十里；

东北至旬阳县官沟界首八十里，至省六百五十里，由山西驿路至京师四千一百一十里。

又据康熙年间《兴安州志》邮路沿人行古道前行驿站（铺）必经之路记载：

西：十五里长枪铺，二十里傅家河，四十里秦郊铺，五十里三渡铺，六十五里新建铺，八十里恒口铺，一百五里梅子铺，为汉阴界。

东：十五里桑园铺，三十里石梯铺，四十五里神滩铺，五十里二郎铺，为旬阳界。

南：十五里牛蹄铺，三十里黄洋河铺为平利界。

西南：四十五里柴庙铺，六十里凤凰铺，七十五里流水铺，为紫阳界。

北：五十里神滩河，一百里麻坪河，为旬阳界。

这些古道路图和邮路驿站（铺）的标识与记载，既描述了安康县署地距四面八方的界限，同时又确实记载县境内共有的人行古大道数量及里程。虽道路崎岖，有路难行，但四通八达。

新中国建立初期，安康县政府组织交通部门，发动群众对境内这些原人行古大道进行调整和整修后，基本情况是：

一、安平大道 安（康）平（利）人行古道，是现今我区唯一可具实考证的人行古道，留有城东南方，木竹桥、石板路遗迹残痕和屈家河村的双龙桥。经本人2018年10月28日至11月初，连续四次徒步去石板路延线询问考察，可确切推断：安平人行古道，由安康县城东南新铺子，今花园小区东侧防洪渠，距今有400多年历史的古皂角树为起点，在束家院子（姓束、回族）东侧修建束家桥，越过老壕沟，经木竹桥（现存110米长、101块石板铺设的石板路可考证）、三观殿、十字路、杨家院子、屈家河双龙桥（有石碑一块，碑文可考），全由石板铺成的石板路至华家梁达牛蹄岭，叫作“木竹架桥，石板铺路”。之后延续的道路为先民们开辟的山石路径、太山庙、县河口、狗脊关入平利县稻草街、吊楼子、徐家坝、长沙铺、陈家坝至平利县城，又延至财神庙、中坝、牛佛洞、大沟口、关垭子、佛台、江佳堰、青草坪到达湖北省竹溪县城。全长280华里。安康县境内60华里。

另据相传：四川省大宁河（今重庆市辖区）发现井盐，消息传到金州后，古金州人一时很难相信这种维系人类生存的物质会离得如此之近。于是金州的盐商也就沿此安康至平利之古道，再经曾家、牛头店至镇坪县，冒着生命危险，越峡谷险滩，穿原始森林，斗飞禽猛兽，跋山涉水翻越大巴山，苦行月余，才从大宁背回第一袋盐食用。此后金州的盐帮迅速崛起，最大的盐帮由50多名背夫组成。每年农闲时，大批的农户也都结伴入伙，翻大巴山，过鸡心岭，到大宁河背盐，从而形成从大宁河到镇坪至金州（安康县）“一泉流白玉，万里是黄金”的盛况。然而，据传，由于背夫的辛劳，鸡心岭一带常有白骨沿途可见，许多背夫都带着干粮和发财的希望，却再也没有走出大巴山。

又据明朝成化年间，在沿途乡绅和盐商倡导之下，坚强的安康人民决心打通巴山盐道，夷之险阻，这条全长700多里的重岭古道百步九折，无声地彰显着金州人民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

二、安汉大道 安康人民为了穿越秦岭，早在秦汉到明末，先民们就向秦岭进发，冲出屏障。开辟通往宁陕、石泉与长安子午道相接后直达汉中的安汉大道。这是安康县最早出境，跨越秦岭的古旧道路，是安康道路建设史上的鼻祖。具体走向是由安康城西关过汉江西津渡（今七里沟渡口）至江北，经长枪铺、神仙街、王彪店、恒口铺、铁岭关，入汉阴县双乳铺、蒲溪、涧池、汉阴县城、平梁铺、马池、石泉县城、曾溪河，入西乡县的子午镇、三郎庙、西乡县城、马宗滩、沙河坝、五堵门、至城固县城、沙河营、十八里铺达汉中。全长约720华里。安康县境内约90华里。

这条网络道路历数千年而不朽，旧称“新子午道”。但真正形成安康古道交通网络

是在清代中后期。然而，清政府顺治元年（1644年）迁都北京后，遂以京师为中心，兴安府（安康）为繁荣当地经济，在地方政府的资助下，广征民力，历数十年，相继接通安旬河谷道，经平利、白河等驿站、所，形成了关中与陕南的官马驿路的大循环道至北京城。

安汉“新子午道”古道的形成，为100多年后的安康交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参考依据。如：民国27年（1938年），国民政府修建的汉白公路、1970年，建成的安旬公路，大部分都是沿着这条千年古道修建，成为千古存史的依据。

三、北路（西康大道） 由安康县城西关出发，过中渡（今中渡台）后向北直行，古时称北路，也有称西（安）康（安康）大道。经唐套、老鼠嘴、九里岗、官殿、关垭、进入旬阳县麻坪河，再到赵家湾经两河关、青铜关、冷水河、镇安县城、屹塔寺、石坪、到达柞水县、银盘街、大峪口、至杜曲抵长安（西安城南）。这条人行大道全长720华里，安康县境内约60华里，路面宽不足5市尺，全线随山、随河、随沟就原，崎岖不平，跨沟趟溪，有路难行。虽如此，却系安康县通往省城长安的主要人行干道，沿途政府设置驿站、驿所较多，作为邮路马班、步班传递文件的重要结点。

四、恒西大道 恒（口）西（安）大道由恒口老街出发北上，经杨家营、运溪河、古木岭、大河口、紫荆河口、马家坪、千沟口（太坪乡）、火石庙、干沟河口入镇安县象元、狮子沟、枣树滩与北路（西康大道）主干线汇接后直达西安。大道全长720华里。县境内约280华里。

五、五西大道 五（里）西（安）大道由五里出行北上，经丁家营、王家湾、西沟河、草庙梁、谭坝、火石庙、老庄子、沈家

沟埡，达旬阳县的赵家湾后与北路（西康大道）主干人行大道汇接抵西安。大道全长720华里。县境内约90华里。

六、安城大道 安（康）城（四川城口）人行大道由西关出发西行，经吉河口、张家院子、板庙子、天山、田家坝达平利县泗王庙、百溪街、银河街、狮子坝、洛河街、铜钱河口、獐子河、刘家坪、花梨坝、温水砭、洪家坪、八仙、大湾、入镇坪界平溪河埡后，再入四川城口县境祖师观、双天坝、向水坝、李家坝、流星坝、石坊坝、修济坝、王家坝达四川省城口县（今重庆市管辖）。大道全长420华里。县境内70华里。

七、安万大道 安（康）万（四川万源）人行大道，由安康城西关过汉江西津渡（今七里沟渡口）出发，经长枪铺、神仙街、王彪店、腰埡子、相子埡、学房店、流水店、正义进入紫阳县蒿坪河、仁河口、瓦房店、芭蕉河口、牌楼、高滩、大坝、鹰嘴岩、毛坝、鲁家坝、堰沟砭，入万源境达万源县城。大道全长560华里。县境内120华里。

八、安岚大道 从城区西关出发，经沙沟、吉河口、神滩河、紫荆沟口、梁家埡、矿石岑、高家坡、陈家老屋、烂泥湾、郑家湾、石家机、长子沟，入岚皋境佐龙、香子坝、新华、花坝街、黄泥坝、薛河坝、大口街、茅坪、蔡家坡至岚皋县城。该古道路面狭窄，一般在1至2米左右。大道全长180华里。县境内香河口90华里。

九、安旬大道 安康通往旬阳人行大道，由城东出发沿汉江南岸而下，经太山庙、杨河沟、徐泉庄、兰家沟、石梯铺、周家河、神滩、丁家湾、白龙庙入旬阳境力加坝、庙嘴、陈家嘴子、新建、吕河口达旬阳县城。大道宽度1.3米不等，全长140华里有余。县境内60华里。

上述9条人行大道形成实为不易，除先民们凿山开辟和民间物流交际踩踏自然形成外，历代朝政对道路管理也十分重视，尤其通往长安省署的西康大道（北路）、通往汉中的安汉大道（旧称新子午道），通往平利乃至镇坪达湖北、四川的巫溪的安平大道等，为了保证商品流通和政府文书（信件）通过驿站、驿所的正常传递，在大道通行困难时，强行征招农夫、脚夫募捐集资整修，以维持道路通行。

此外，县境内通过民间在生产、生活的活动中，自然踩踏以及开辟的羊肠小道密布，与主线相连接形成网络，多用于民间商品、文化交流之通道。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行大道不断得到整修和改建，以达到便捷交通之目的。民国时期，迫于战争之需要，国民政府决定修建汉中至白河公路，将安康通往汉中的人行大道和安康通往平利至湖北竹溪达四川的人行大道，大部分古线段被利用（注：下篇详述），小部分线段废弃。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工作，于1951年~1955年间，先后对上述九条人行大道进行扩建整修。1958年至1978年，党和政府为改善群众落后的交通面貌，大兴公路建设：安岚公路建成替代了安岚人行古道；安旬公路建成替代了安康至旬阳达白河的人行河谷古道；恒紫公路建成替代了恒口至紫阳的人行大道；西（安）万（四川万源）公路建成，与汉白公路在石泉交汇，替代了安康至西安的人行主古道，群众出行更加方便。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全县保留利用的人行大道尚有恒口至大河、叶坪至宁陕、茨沟至东镇达旬阳县麻坪乡，以及至今还保留可考证的安平古道“石板路、双龙桥”等等。

（作者系安康文史学者）

超然物外德如山 积利於民善成林

——观“藏一角”有感

□牛谦才

2019年5月12日，是笔者第四次走进藏一角博物馆。

藏一角博物馆大致分为：邮海大观（邮票）、古今通宝（钱币）、摭券天地（票证）、书道丹青（字画）、书卷芸香（书籍）五大类。此五大类藏品，是徐山林先生于2005年70岁生日时所捐赠给当时安康历史博物馆的藏品。

2013年10月，安康历史博物馆迁到江北新址，安康市政府决定将藏一角在原址扩建改造，独立设馆。2017年5月，徐山林先生将自己继续收藏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所捐赠的藏品又第二次捐赠给藏一角博物馆。至此，新增文房汇宝、大千拾趣、诗情书韵、碑版精拓、精华长卷5个展室。展室扩大到10个，藏品由原来的11837件增加到12237件。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奇珍异宝，亦难一网尽收。从此意义上讲，整个馆藏藏品，仅是大千世界中的冰山一角。无疑，藏一角的定名精准到位，亦含低调与谦虚之意。

然而，人生短暂，岁月匆匆。从个人角度讲，收藏种类如此之丰富，且品位之上乘，可谓多而全，全而博，博而精。从精神层面看，倾其所藏，慨然捐赠于生养自己的家乡，由私而公，使之回归于社会，大众受惠，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如此慷慨捐赠，其大德善举，在全省乃至全国，亦实属罕见。

当今，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习近平总书记倡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进藏一角，就是品读经典，学习知识，了解历史，提升人文素养。就以方寸邮票而言，世界各国都把最具代表性、纪念性和引以为豪的事物印在邮票上。它已成为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的小百科全书。

在邮海大观展室，中国早中期的清代和民国邮票达227枚。另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邮票，多达275枚。截止1999年底，全国解放后共发行850余套邮票，这些邮票从多方面反映了我国的政治活动、经济建设、文化艺术、民族风俗、著名人物、奇花异卉、珍禽异兽等等，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50年的光辉历程。

在港、澳、台邮票展室，可以看到共30片，238枚邮票，包括12个首日封和纪念封，23枚小型张、5张明信片。特别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纪念封，截至2003年底，我国先后与世界上16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徐山林先生收藏了144个建交封、4个条约封、2个纪念封和一个复馆封。这151个封上都无一例外地印有中外两国国旗。弱国无

外交，弱国受欺凌。看到这些建交封，让人由衷地为祖国日益强盛感到骄傲和自豪。

二

货币与人们的劳动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货币已有数千年历史。在古今通宝展室，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尚无文字记载的贝币开始，我国货币不断演进，内容十分丰富。殷商以后，货币以金属铸币为主，形式多种多样，有蚁鼻、布币、刀币、圜钱、半两、五铢、通宝等等。货币上的文字有篆、隶、楷等多种书体，从奴隶社会初期的贝币到历代王朝的各种代表性货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独具风格的货币文化，同时也增进了人们对人类历史演进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知识。

民国时期的纸币展出有119张、银元和铜钱40枚。民国时期的纸币或硬币，都很混乱。硬币有孙中山当政时发行的，有袁世凯当政时发行的，还有黎元洪当政时发行的，更有地方各省自造的。纸币有国民政府发行的，也有许多省市发行的。1935年国民党政府将多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权，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四家国有银行，但先后发行的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等在市场面市后，受到老百姓的强烈抵制。不少老人在观展后回忆说：解放战争后期，金圆券已无法流通，市面上通行得是“以盐为宝”。由于当时的所谓国有银行烂造纸币，失去民心，加快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倒台的步子。

新人民币是值得中国人民骄傲和自豪的货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统一发行人民币，作为新中国的唯一货币，50多年来已发行了4套，第5套也已上市流通。同时还发行有金属辅币、流通纪念币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至2000年《迎接新世纪》为止的61枚流通纪念币，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纪

念币，这些货币是国家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有力见证。

三

第三展室遮券天地，首先进入观众眼帘的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实行配给制度时发行的粮票和布票。其中民用粮票261种、军用粮票56种、工种粮和购粮卡28种、油票29种，饲料票40种，粮票最小面额为半市两。布票442张，绝大多数以尺寸计量，少数省区以厘米计量，当时物资匮乏程度可见一斑。这些最具历史价值的藏品，时时勾起人们对衣食窘困时代的沉重回忆。尽管人们当时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但依然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其力量源泉就是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总结经验教训，带领全国人民最终战胜困难，渡过难关。

物资紧张不仅是粮油布，甚至买一只水杯也得凭票供应，包罗万象的供应票不计其数，搜集齐全很难，粮油布票证是当时维持基本生活的主要票证。年轻人应该懂得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讲：“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福利彩票是一种以兑奖为手段，以募集资金为目的，以救助孤、幼、老、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为宗旨的公益事业。中国福利彩票中心自1987年成立以来的十余年中，募集资金超过百亿元，兴建公益事业十余万个，救助社会弱者千余万人。与上列粮油布票比，福利彩票的设计更加精美，内容丰富，集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充分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珍贵的收藏价值。笔者统计，展出的1993年至2000年间发行的各种福利彩票达602张。彩票大部分面值2元，少部分为1元、3元，兑奖券最低为10元，最高8万元，还有100元、1000元、2万元不等奖额。1998年夏，长江流域及东北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当年发行抗洪救灾

福利彩票多达94张，每张面值5元。包括其他彩票在内，徐山林所捐的彩票全部没有刮奖，票面刮奖位置依然完好，其奉献精神令人折服。同时也保证了彩票的完整性与观赏性。

全国名胜古迹门券展出有472张，涉及景点372处。门券在20张以上的省市有北京市21张、上海市20张、四川省20张、辽宁省21张、浙江省22张、山东省22张。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徐山林故乡陕西省多达67张。这些门券面值大都在20至50元不等。最高的浙江淳安千岛湖2005年门券高达80元，其次是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263米90米观光票65元。陕西秦俑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门券1元，此后由20元、30元攀升至65元。相对于名山大川、名城名镇、名寺古刹而言，不少红色旅游景点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浙江南湖中共一大纪念船、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系列景点渣滓洞、杨虎城牺牲地松林坡、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以及延安中央书记处旧址等，门券为参观纪念券，门票无面值，即免费参观。游览祖国名胜古迹，是人们精神文化上的重要需求。从2018年开始，全国各大景区相继降低门票价值。藏一角展出的门票，无疑对推动旅游发展大有裨益。

四

书道丹青展示的是徐山林捐赠的64幅书画藏品，包括钟明善、尹瘦石、吴三大、贾平凹、雷珍民、刘自犊、宫保成、黄钟等大家的书法作品，张仃、方济众、刘文西、王西京、方颢秦、苗重安、杨晓阳、乔玉川、罗国士等人的画作。2007年，徐山林又捐赠出省内外书法名家书写的他创作的古诗，真、草、隶、篆各体书法作品31幅。与此同时捐出的还有27幅碑版精拓包括汉到南宋摩崖9幅，曹魏和北魏摩崖7幅、唐碑拓3幅、北宋碑拓2幅、清代诗画和书法5幅，以及郭沫若行书《司马迁祠题诗》碑拓。

书法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民族特点的文化载体。尤其是古摩崖和碑拓上的书法绘画，更为珍贵，原拓往往被视为真迹。包括上列书法名家、绘画名人，他们的作品往往可遇不可求。

在2017年的续捐中，展出的有汉铭文、云饰瓦当17块，还有于右任书“农专”青砖1块。瓦当属高古艺术，今人所见的琉璃瓦当是仿古现代瓦当，多用于仿古建筑。

五

徐山林捐赠的7611册图书，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经济、法律、人物传记、地方史志及各类工具书等九大类。

当年孔子的弟子在编纂《论语》时，将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放在第一句，表明孔子本人对读书学习的高度重视。读书学习，是人们获得知识与经验的重要途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徐山林一生不光担任过省级领导职务，还是一位文化底蕴深厚的诗人和书法家。这无不得益于他的阅读人生。他捐赠的一册册图书，犹如一面面镜子，不仅照出一个人的气质情趣、精神境界，更照出了他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读书，对整个社会书香风气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徐山林捐赠近万册图书，旨在造福家乡，培育励志英才，为今日及未来的安康提供营养。

参观藏一角博物馆展品，对徐山林的奉献精神感触颇深，笔者特意撰联于留言簿：“大仁大智大善举，宜国宜民宜子孙”。同时走访馆长肖利英得知，藏一角博物馆还制作了流动展板，在偏远乡村学校设立“博物、博人”文化教育活动基地，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文化教育。

藏一角博物馆无疑是安康的一道靓丽风景。“走，到藏一角去”，这是安康人的文化底气。

（作者单位：汉滨区档案史志馆）

从茶马古道上走出的紫阳先民

□周平松

一直以来，陕南就流传“湖广填陕西”的传说，紫阳也一度成为四方流民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形成了五方杂处，土著无多的局面。然而，也有我们的紫阳先民走出大山，远在四百多年前，在异地他乡开拓他们的家族历史……

一日，县档案史志局来了两名风尘仆仆的男子，年龄小的大约四十来岁，年龄大的可能有五十岁左右，都一脸倦色。接过介绍信一看，上面写道：

兹介绍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总工会纪委书记朱万俊等二同志，前来紫阳了解该县明朝时期人口迁徙情况。请查找县志及介绍紫阳政史资料。

落款是景泰县总工会。陌生的县名让我们来了兴趣，在地图上搜寻了许久，才找到它的位置。景泰县位于甘肃省中部，东临黄河，西接武威，南邻白银、兰州，北依宁夏、内蒙古，地处黄土高原与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为河西走廊的东端门户。距陕西南部的紫阳有千里之遥。在一番寒暄之后，我们的交谈开始了。

故事起源于一次续写家谱的活动。据家谱记载，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他们的祖先从一个叫紫阳堡的小地方出发，翻山越

岭来到甘肃中部长城脚下屯垦戍边。后来娶妻成家，生下了两个儿子，历经四百多年的生存繁衍，形成了一个四五千人的庞大家族。聚居在白银市的景泰等两个相邻县。朱氏子孙在兴旺发达之后，动了寻根问祖的乡思。这次续修家谱的过程中，根据家谱里唯一的线索“紫阳堡”一路追寻到了这里。由于不知道紫阳的具体地点，他们一行四人乘火车走了整整四天，先从甘肃坐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访到了宝鸡，经宝鸡又奔到汉中，最后才到安康，坐班车到紫阳。我们问：为什么不在网上查查呢？也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啊。同时也暗自钦佩他们的执着精神。

翻阅《紫阳县志》：

明朝中期，统治者为了对付陕南流民起义，明政府为了控制汉江并截断川陕间的这一重要通道，于正德五年（1510）在任河嘴设置了紫阳堡。属于军事设施，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正德七年（1512），左都御史洪钟建议将紫阳堡升为县。获准。割金州西南、汉阴东南境置紫阳县，设治所于紫阳滩之左，并建文庙，学廨、未建城垣。

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疑问。朱氏

祖先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紫阳堡出发，这时候已经建县了六十多年，从行政区划来讲，应该称紫阳县，而不应该称之为紫阳堡了。如果根据人们的称谓习惯，可能就指任河嘴这个设堡的小地方。那么寻找的范围也缩小了许多。但是朱氏究竟属于老户呢，还是后来流民呢，也让人无法得知了。因为在紫阳置县之初，全县分为五里，居民仅一百四十七户，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才增加到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四人。据在紫阳做过清知县的诗人江开在《紫阳竹枝词》中写道：

前明正德年辛未，设县分疆尽陡坡；
老户只存三十七，至今川楚客头多。

说的是自明朝禁山政策实施之后，紫阳就“老户无多了”的现状。四方流民纷纷落户扎根，尤其是经过明末清初的多次兵燹之后，老户更是荡然无存。通过清朝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后，湖广、江南等地的流民就成为紫阳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大量的朱姓族人落户紫阳，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开拓史。并大量散布在任河，汉水各处乡镇。但不复是朱姓老户的后裔了。

另外一个让人感兴趣的是，他们的祖先当时是怎样走出去的？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条件下，背井离乡跋涉数千里来到遥远的边境戍边。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当我们比照地图结合县志资料方才恍然大悟，他们会不会从著名的茶马古道上走到目的地呢？

“茶马古道”是指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

而紫阳茶在唐代已经列为朝廷贡品，

“山南茶”经过茶圣陆羽《茶经》著述而名闻天下。宋代开始实行茶马法。自明至民国，紫阳茶运销西北，多先集结于汉中、西乡。然后按褒斜道经留坝、凤县、两当到达天水，到天水以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清水到达庄浪等地，另一路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达临夏。再北上即可到达长城。这是当时一条紫阳茶的运输线路，属于茶马古道的一部分。朱氏祖先很可能沿着这条曾经繁盛一时的古老商道到达甘肃境内的边陲要地。同时我们又想，他有没有经商的可能呢？可以这样设想，他曾经是无数茶商当中的一员，由于种种原因他流落到了甘肃河套地区长城附近，在这里定居了呢。

太多的疑问由于历史的久远和资料的缺乏，无法找到答案。如今的紫阳人由于这两位不速之客的到访，知道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白银市还散落着几千紫阳先民的后裔。无论我们的先民以何种方式走出紫阳，无论是戍边，还是经商，到最后都不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存在，为湖广移民大规模进入紫阳开发后，又陆续有紫阳土著走出大山提供了重要佐证。

不知不觉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两位来访者时而欣喜时而失落。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论证朱氏祖先的具体发源地，但是发现了祖先是从一个山水秀美的人间仙境走来，心愿足矣。

临走，他们感谢我们的热情接待，让他们感到了亲人久别重逢般的温暖。说此次续写家谱完成后，一定赠送一套给县档案史志局。并且还要组织家人来紫阳看看。我们送上真诚的祝福，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和他们依依惜别。

（作者单位：紫阳县档案史志局）

我替母亲上三线

□ 李春芳

1969年全国三线建设进入高潮期，有三线任务的社队全民总动员，高桥区又要从两个公社抽调400名民兵，组建成三个民兵连一个民兵营，宿营紫阳县太月乡悬鼓湾（今向阳火车站）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公社规定每户至少要有一名主要劳动力参加，当时我父亲在外工作，弟弟春平才8岁，我14岁，家里只有母亲是主要劳动力。母亲不愿向干部求情，自己主动报名参加。

那是一个初冬，天气灰蒙蒙的，似晴非晴，阵阵山风夹杂着几丝寒意，将已经凋零的树叶一片片地吹落下树。那天早晨母亲就要出发了，背着一床破被子，一个洋瓷盆，一双碗筷等行李，俨然要出征迎战的那种姿态。母亲临走时对我说：“春芳，要把平娃子经管好，猪儿每天要喂两遍”。母亲走院坝坎下，回头喊了一声：“平娃子，我走了……”。春平在一旁若无其事的玩耍，既不哭也不笑，没有一点母子离别的留恋之情。我们望着队伍中的母亲，目送到对门的山间小路转弯处，直到看不见为止。

傍晚夜幕降临，空旷的山野寂静得使人窒息，村头大柿树上有一只猫头鹰发出忧伤的叫声，漆黑的夜晚显得更加阴森。煤油灯

下，我们兄弟俩一声不响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没有什么话说，悲切和伤感油然而生。我们不知道母亲走后的日子怎么过，也没想过今后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第二天春平背着小书包照常到何家堡小学读书去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母亲上三线后，本应继续读初中的我只好辍学，和春平一起撑起一个家的门面。弟弟天天上学读书，我在家养猪喂鸡，挖地、种洋芋包谷，一样都不落，早晚依然炊烟袅袅，只是没有父母的日子过得凄苦艰难，时刻担心别人欺负。1970年4月，到了春荒生活困难时节，多数家庭断粮了，公社安排的救济粮折子一时拿不到手，我家也一样，仅剩一碗包谷面。那天早晨我对弟弟说：“下午放学回来自己煮饭吃，那点包谷面要吃两顿，我到妈那里去弄吃的，明天就回来了。”弟弟只点头不言语。我沿着权河、任河岸边的小路一直往前走，大约步行60多里的路程来到龙潭民兵连，连队驻扎在与瓦房店隔江相望的汉江边上的月池沟，营房除当地老百姓几间瓦房外，其余全是牛毛粘和芦苇席搭建的简易公棚。我到女子排找到妈了，一五一十地说了家里的情况，母亲一再

掩饰难过的心情，但眼里还是冒了泪花。我对妈说：“春平明天就没吃的了，你回去吧，我来顶替你”。妈说：“要得，我们找到连长说一下”。连领导同意了，我留下，妈回家。

龙潭民兵连共计三个排九个班，连长把我安排在一排二班，每一个班一个通铺，班长见我个子小把我安排老民兵中间睡。下午领了铁锹、钢钎等工具，开始正式上工参加劳动。民兵连有很多优越性，虽然不发工资，但管吃管住，一日三餐有两个大馒头，一碗玉米稀饭，还有粉条汤、咸萝卜，加上紧张而有序的兵营生活，我感到有生以来的幸福和惬意。当时太月公社的悬鼓湾，驻扎了一个铁道兵团、一个学兵连和高桥民兵营，主要任务是修建向阳火车站以及与襄渝铁路配套工程——紫渝公路。军民近五千余人，从月池沟到毛家台拉开了长达五公里的施工场面，在醒目过道处都贴有“三线建设要抓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大幅标语。那时所有人都知道：“襄渝铁路不修好，毛主席睡不着觉。”整个施工靠人海战术，工地没有机器轰鸣，只有人的喧哗声和劳动吆喝声，民兵们手持铁锹、十字镐、架子车等劳动工具在各自施工工地劳动着，个个衣衫烂晒，汗流浹背，没听到有人发牢骚，再苦再累，都喜形于色的快乐地劳动着。晚上铁道兵部队为民兵连放映《南征北战》《地道战》《渡江侦察记》等电影，有时学兵连给民兵连演文艺节目。在那缺吃少穿的岁月中，民兵们激情燃烧在三线火热的建设工地上，涌现出许多“铁姑娘排”“突击过硬班”，一面面先进红旗不断地进入先进连排班组。

我们民兵连除了不军训外，组织建制和军队一样，作息时间同部队相同，每天早晨

起床、开饭、下午收工都以军号为准。龙潭民兵连担任毛家台公路施工任务。此地段有千多米的施工面，一半为土方，一半悬崖陡壁。我们宿营地距离工地有4公里路程，每天早晨必须六点起床，八点到达工地准时开工，下午六点收工，没有星期天，更没有节假日，天天照干不误。我所在民兵排承担着开山放炮的任务，主要工具是钢钎和八磅锤，每天都在悬崖上打眼放炮。

八月三伏天，太阳红炎炎火辣辣的，坐在那里不动也是一身汗，民兵们的衣裳上渗透出像印了地图的盐斑。晚上连队召开动员大会，要大干“红八月”，要求赶工期，加进度，提速度。从那天起中午吃饭在工地，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我们连要在一月内要打出12个大炮洞子的任务，名叫“猫洞炮”。规格为直径60公分，深3米，装炸药200公斤。因全是石山，每进一点都相当困难，当炮洞进入一米以上后难度就更大了，排长选择个子小的钻进洞子掌握钢钎，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有力气的在外面轮八磅锤。猫洞中的小炮眼要打30公分左右，每次爬进炮洞需要两个小时，把炮眼打好，再装上炸药，点燃导火索后才急忙爬出来，鼻子眼窝糊满灰尘，引来工友们的阵阵欢笑。炮洞里虽然尘灰重，但里面却很凉快，对于我来说算是非常轻巧活儿。苦干了不到一个月，我们连队的炮洞任务全部完成。放炮那天营里和连里领导都来了，警戒线放到5公里以外。几吨炸药同时引爆，巨大的爆破声地动山摇，响彻山谷，一排排岩石瞬间崩塌而下。全连民兵为爆破成功欢呼雀跃，提前收工开饭，每份饭还加了几片猪肉，菜汤里多漂了几点油腥。民兵们兴高采烈，我们感到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傍晚我和几个工友在月池沟小石潭里美美地洗了一个澡，几十天疲劳被山泉冲洗得无踪无影。

1970年12月，县政府下达征兵动员令，要从各个民兵连中征集一批新兵，我响应祖国的召唤就地报名应征，这一年由于征兵数量大，身体合格人员少，于是就放宽年龄限制，我身体样样合格，就是体重斤两不够，接兵领导把我一看说：“这小子挺精灵的，斤两不够不要紧还要长的”。接到入伍通知书没几天，就在民兵连换上了军装。12月28日，龙潭民兵连敲锣打鼓把我们这批新兵送到县人武部。到了部队才知道，我们部队的兵种是工程兵，除练兵打仗等军训外，主要任务是修筑工事和修建地方公路。说来也巧，我从百姓到解放军，从民兵到工程兵的身份转变只是一瞬间，而工作性质却是一样，部队转战南北，总是与开山放炮、施工劳动联系在一起，按时髦的话说，都是

为了祖国的建设，这个命运安排，我无怨无悔感到十分骄傲。

义务兵满后我退伍了，当时襄渝铁路虽然还没有正式通车，但在紫阳境内能听到火车鸣笛声。回家时坐上一辆解放牌汽车沿着紫渝公路到权河，看到曾经施工地段已宽敞的公路。我思绪万千，临走时铁路、公路还是个毛坯子工程，仅仅两三年时间就通车了。在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在这么短时间里能完成如此伟大的工程，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次证明了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伟大论断的正确性，我庆幸是自己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作者单位：紫阳县文广局）

（上接71页）因此有了“禅茶一味”的妙语。

刚刚冒出来的茶叶，嫩嫩地，鲜鲜地，如绿云一般浮在茶树顶端，与下面墨绿色的老叶片形成鲜明对比。和风细雨中，叶片上的水珠随风而动，珠圆玉润，呼之欲出，鲜美娇嫩得不忍直视。一双双或握过锄头或拿过钢笔或敲过键盘或操过锅碗瓢盆的手，在鲜嫩的绿芽间上下翻飞，是那样地开合有度，收放自如。他们旁若无人，犹如画家作画，农人插秧，专注得好像在创作一件绝版的艺术品，站在一边欣赏的人，感觉是那样多余和别扭。细雨如轻纱，似薄雾，像幔帐，淅淅沥沥，飘飘洒洒，落在碧绿的茶叶上，那声音，大者如蚕吃桑叶的清音，小者像春风拂柳的细语，这天籁之音荡尽的不仅是茶山的风尘，还洗涤着人们内心的浮躁和尘埃。

我走近一位漂亮的采茶女，跟她攀谈起来。我问她，你们采茶时为什么不唱歌

呢？她微微一笑，你是电视看多了吧？电视里那些一边采茶一边唱歌的画面，多是做着给别人看的，而我们采茶，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时间就是金钱，采起茶来脚下要稳，眼睛要灵，手上要快，精力要高度集中，哪还顾得上唱歌？

听了茶姑的一席话，先前一直未解的疑问豁然开朗，我曾经见到的茶山，美则美矣，却少了真气，缺了地气。再看眼前的茶山，春雨的洗礼，云雾的滋养，春风的爱抚，与茶农真实的生活天人合一般地融合在了一起，显得是那样真实、清新和圣洁，一如秦巴深处不事雕琢、一尘不染的少女，令人美目惊魂，这美，来自于朴素，来自于自然，而正是这朴素、自然的美，才是真美，是大美。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

思想让文字熠熠生辉

□ 钟长江

时至今日，振宙先生先后出版了诗集《心虹》，散文随笔集《心影留痕》《心灵的探访》《小言无愧》《一叶集》《阅微缀琐录》，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诸多好评。诗人陈敏在《独守品位》一文中称其作品“表述的更在于一种理性、一种思考，一种对人生，对世俗，对社会整体的拷问与审视，尖锐而警醒，超越了那种山水世情画面凌绝而立……”作家李春平在《时代的思考者》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个社会，有的人只长个子不长脑子，有的人只长嗓门儿不长声音，有的人只看事物不思考事物，有的人身体健康地活在世上，思想却一直没有出生。振宙不同于他们。振宙善于看，善于思，善于质疑，善于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向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振宙的与众不同之处了。”“紫阳这么小个地方，出了不少的人物……我见到个紫阳人叫黄振宙的，一肚子文化，满腹经纶，谈起文坛的事，见解精辟，一针见血。我引这位黄先生为同类，我对他说，幸亏你的双脚被捆在紫阳，所以只能应了古人这‘江湖居士闲处志’一句话，倘放在安康，你就是安康的人物，倘放在西安，你就是西安的人物了。”（高建群《汉江今夜从枕边流过》）

故乡永远在心中

在伟大祖国的版图上，北有九曲黄河，南有万里长江，在黄河、长江之间，横亘着绵绵秦岭、巍巍巴山。秦岭、巴山之间夹裹着一条大河，由西向东，直奔长江，这就是被人们誉为“中国的莱茵河”的汉水。从紫阳县城乘船上溯60公里，两岸峭崖缓缓向后退去，江面便变得非常非常的宽了，涌卷的涡流，像朵朵怒放的牡丹。原本是要直直的向东流去，突然往左一拐，北行三五里，又回头往南，迂回一个大大的内弓，复向东流。南面的一脉山便成了天然的屏风，上面松柏参天，莺啼鹿呦。北面就形成了一个扇形的盆地，上面坐落着一个古朴的小镇，振宙先生就出生在这里。

小镇虽小，名气却大。相传汉王刘邦西进汉中，率大军路经此地，见此处风生水起，山林茂密，水草丰美，土地肥沃，遂决定在此屯兵。兵士一夜之间兜土筑成一座城池。据考古发现，汉王城境内的马家营、白马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早期的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到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列，他们显示着汉水上游原始先民们开创了旱地农业的先河，推动着最古

老的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许是灵山秀水滋养了他，许是悠远文化浸润了他，振宙先生笔下的文字，既温润可人，又棱角分明；既诗意盎然，又犀利睿智；既妙趣横生，又博大深沉，无不显出独特的文化品位和独特的文化特征，具有一种超脱的浪漫情怀和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虽说不上字字珠玑，可也篇篇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振宙先生对养育他的故乡，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这种感情，就像你我身边的瀛湖，湖面波平如镜，湖底激流涌动。他试图用文字记载过去，歌唱当下，诠释未来。在他的笔下，故乡是一幅中国画，宁静幽远，山水闲适。“水一打弯，山就劈出一厢小小的空阔，南岸陡陡的，不高。山水切得很紧，峭壁栽入水中，刀削了一般。北岸缓缓仄仄，斜斜地昂拔着，峰顶似乎离天很近……不知哪年哪月，稀稀落落的房舍就聚到了这一隅平地上，于是，有了南岸的画屏，有了北岸的小街，有了码头有了水上驿站，有了供漂泊的人供撵山的人歇息的小栈和酒家。”（《小街》）而在《故乡琐记》中，他记录下了不能忘却的记忆，文中留过东洋的王先生，精通日、英两语可只派上一回用场，那就是与因飞机坠毁而降落河滩的美国飞行员的对话。貌似平实，其实有许多欲言又止，让人深长思之。

振宙先生对故乡的爱，是一种大爱，穿越时间和空间。让我们倾听他笔下的《乡音》：“乡音，是一种温馨，一种亲切，也是一种牵挂，一种漂泊的回味。乡音其实也是雨，也是雪，也是春天的明媚，也是秋日的黄昏……是柴扉张开的吱呀声，是橹浆的欸乃，是燕子的呢喃，是掠过的鸽哨，是雷鸣，是花蕊绽开的私语……”这一字一句无不拨动着情感的闸门，无不使人缱绻缠绵浮想联翩，无不让人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故乡。“我们的‘乡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到了省会，乡音是以“县”界定的，到了京都，乡音又是以“省”界定的，出了国，乡音是以“母语”界定的，而登上了月亮的探险者，又是以地球上的一切语言甚至声响作为‘乡音’的。”这就是作家的大气和高蹈之处了，天地和谐，世界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心愿，正如云层上面都是阳光。

如果说振宙先生对故乡的爱是刻骨铭心的，那么他对亲人的爱则是魂牵梦绕催人泪下的了。“在‘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日子里，痛哭常常在梦中得以放纵，梦中的父亲还是那样的疲惫不堪，每次远游都是天涯海角，都在荒芜末路上；梦中的海洋很辽阔，漂泊的永远是父亲，而我却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常常在海岸的至高处，望着父亲的孤帆渐渐隐去……”（《怀念父亲》）文笔朴素炽热，真实地勾勒了一个质朴、倔强、孤独并且志存高远的底层知识分子的人生履痕，他忍辱负重，心存善良，却对生命有着执着的热爱和操守。在这里，亲情已不是一己私情，而是被放大到对传统人格的尊重，对人文世事的关怀，对社会与人的关系的思考。振宙先生的父亲是当地中学颇负盛名的语文教师，在含辛茹苦抚养儿女的同时，也为家乡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材，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这个多种生命形态构筑的世界里，每一个生命的来来往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恒久，还是短暂；它的诞生、存在、亲情、爱情，甚至死亡，都是我们体验生命过程中不可复制的一道道风景线，是红尘世界里灵与肉精心镂刻的一幅幅独立的画面。在情感色彩强烈的认知下，寻找我们精神的家园，栖息我们奔波的身心，剔除我们世俗的陋见，寻找生活在我们心灵留下的一道道生命的划痕，是现代人、尤其是思考者们审美的目光投射出来的一种深切的关注。

故乡情结，坦露振宙先生心底最温柔的

部分。那些涓涓的思念，悠悠的怀想，款款的放牧，犹如隔岸的歌声，明灭的渔火，朦胧的月光，拍打着瀛湖船头的轻浪……

文学是道不是器

振宙先生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我们今天所谓的读书人，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称之为“士”。余时英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分八个专题介绍了士的起源、流变、发展以及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承作用。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申明的那样，“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有着特殊含义，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这样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在其具备多么深厚的专业造诣，更不是凭学历和学术职称；而在其是否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是否有着将个人理想与天下理想合一的精神追求，是否具备强烈的关怀精神、忧患意识和独立的思想、品格。“振宙的平民思想、忧患意识、常识立场、真切的生活感悟，都使他的‘符号’具有一定的感染力，透射出强烈的责任感，这是作者的大幸，更是他能继续操持文学的真正动因……正是基于常识的拥有，他才可能将生命的感情转化提炼为一种理性一种‘大家体验’，一些篇什能够在自然中达到以小见大的境地；‘平实，或许是真正的崇高’。作者以平和的心境写出犀利的杂文，在嘻笑怒骂中仍不失关怀之情，这是他的本真，也是他行文的一个特点，这特点源于他对‘大我’意识的自觉，源于对意识的准确把握，源于思想的宽

泛和理性的突兀；在那些充满智性的散文里，作者始终能抓住事物的本质，高扬理性，追求思辨，能把真切的生活感受与现实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思考，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敞开’，从而显示出作为一个常识立场者应有的文化品位。”（李辉新《常识—思想的参照》）

在中国古代，读书从来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或只与个人兴趣有关的活动。尽管历史上不乏闲云野鹤式的隐士和恃才居傲的狂士，但读书一直与当代政治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知识阶层的主流士大夫，读书的最低理想是“修身、齐家”，也就是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最高理想则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要求“达则兼济天下”。在这里，“穷”和“达”只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读书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则始终和那个既高尚又高远的“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孔子说：“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则将孔子的读书见道发展为读书殉道，他斩钉截铁地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为读书人设置了一条以身殉道的不归之路，显示了比孔子更为积极的入世精神。是的，这的确是一条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乃至牺牲个人自由和生命的不归之路。从太史公的忍辱著史，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从王国维的沉湖求节，到顾准的孤路苦行，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无不展现出中国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以血泪为读书作注的历史。

“有人说写作是一种自娱活动，在一定范围里自娱自乐是成立的。但这种自娱必须遵守人类大的规则、大的价值取向。一个人的写作如果仅仅是‘抽屉文学’，怎么自娱

都无伤大雅。因为这类文字尚在隐私之内，无人窥探就不是东西，正负效应都是没有的。如果文字刊发出来，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人们要‘消费’它，其质量优劣、品位高下都会作用于他人，假如你是为虚假文化推波助澜，为精神堕落摇旗呐喊，为自己那点一文不值的‘名利’而不惜出卖人格，污染精神，糟蹋母语……那么，你努力一份就有了一分的罪过。如果真是这样，难道你还要坚持说这是‘自娱’么?!”（《心影留痕》座谈会上的发言）“寻找文学的尊严不仅成为必要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文学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说它幸运，是因为今天的文字已经有了回归和独立的趋向，在相当程度上拔出了‘利于器’的沼泽，‘道’的曙光初见端倪，这是文学本真的前提……”（《寻找文学的尊严》）“我们能看到的是《讲话》自发表以来，一直被为数不少的人误读，或断章取义或为我所需，‘高举’之下认识不尽统一。所以，《讲话》正如作者的思想体系一样，既要考虑当时具体背景，又要完全准确地加以理解。否则，本难正源难清，甚至继续沦为抢手的‘器’。还‘器’为‘道’是尊重伟人、尊重自己、尊重艺术、尊重实际的前提，也是繁荣文艺创作，构筑社会主义文明，完成复兴大业首要的必须加以解决的根本问题。仰视一代伟人的精神丰碑，是一种忠诚；冷峻地审视这个丰碑审视其辐射所带来的作用，依然是一种忠诚。位卑未敢忘忧国，有此境地，冷热都是相宜的。”（《理性高于一切》）

思想的张力和人身处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远古的思想家由于身处蛮荒之世，物质匮乏，加之又值文化初创阶段，其思想很少受尘世羁绊，因而往往能够“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很难想象今人能够写出庄子《逍遥游》那样飘逸神骏的奇文。与古人相

比，日益繁盛、忙碌、拥挤的现代社会以及愈来愈职业化的社会分工，使现代人的思想空间显得日益狭小、逼仄。面对职业化的社会分工、商业化的社会生活的双重挤压，我们只能感到思想的极度疲惫。也许我们还未曾意料到，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不仅已经对人类的思想造成巨大冲击，还潜伏着对人类自身的极大威胁，而挽救人类的只能属于人类的思想。当卡斯帕罗夫面对那台每秒能运算两亿次的令人生畏的“深蓝”计算机的时候，每秒只能判断三步棋的他是凭什么与机器抗衡的？人的记忆能力不如电脑，运算能力不如电脑，储存能力不如电脑，联想能力不如电脑，将来，电脑的推理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乃至决策能力都可能超过人类，人类岂不会为自己创造的这个异物所控制、统治？然而，再万能的机器永远也不会思想。电脑只会联想，思想只属于万物之灵的人类。只有思想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由飞翔的精灵。它为人类的历史作证，它是读书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类不能一刻没有思想，读书人不能一刻没有思想。

诗性与理性交响

书也便如同人一样，并非每一本书都会使得你想和它交往一生。很多书读过便了，放下它，便像放下了你的昨天，它或许是你明天的养料，但你不会念念不忘地想着它。

然而有些书，却是不可能放下的，哪怕作者本人都放下它乃至否定了它，而你，却总会在某个时候想起它，再去找它，读它，与它对话，赋予它新的活力——于是，它便又一次成为你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契机，一个促使你生长也和你一道生长的伙伴。这样的书，我才称它为良师益友。恰如茫茫人海里吸引你目光的人不会太多一样，这样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书，也不是那么多。我想，不是

好书太少，而是我们的生命太有限：如同只有把人类抽象地当成朋友，我们才能具体地去爱其中的一部分一样。

振宙先生的书不适合一口气读完，它需要读者的思考、思索和体悟。也许你会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或者一个失眠的秋夜，找出一本捧读一番。书中对故土山水的依恋，对亲情友情的怀想，对社会善良的礼赞，对现实丑恶的鞭笞，对人文的关怀，对崇高的托举，充满了理性，充满了思辨，充满了哲学，无一不展示出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沉甸甸的力量。贾平凹曾说：“诗自在我们心中，诗人并不是作诗的人。诗应该充溢着整个世界，无论从事何种事业，要取得成功，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心中永远保持着诗意，那将是最重要的一条。”振宙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一位以他的生活和写作向我们昭示生命之诗的诗人。他是从人格出发，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的，是爱培养了他的品格与美感。对他来说，写作就是人格的实践活动，这种追求人格与艺术创作一致性的品格，使他拥有了经典意义上的艺术生命。与其说他找到了散文随笔这一形式，不如说这一形式正好适合他，适合他那罕见的质朴，适合他对存在的追问，以及他对生命万物的关怀和爱。

振宙先生笔下的文字，因诗意而灵动，因思想而飞翔。“故乡小镇就躺在汉江的拐弯处，就藏在巴山的皱褶里。夜里，随着某人最后一声呵欠，小镇便浸入死寂……报晓的鸡，见地炉坑的板儿裂了微亮的缝儿，这微亮的光线也是从木板儿门木格儿窗中折来的，它便从地下高高地啼一声，隔壁笼中的鸡炉坑里的鸡一声接一声地长啼起来，于是，小镇便醒了。”（《晨雾》）田园牧歌是令人愉悦的，而理性的反思更令人警醒。“反思‘五四’，就是反思百年来我们文化的‘解构’与‘建构’。目的在于文化和思想的

建设。梳理与批判、否定与光大……”（《关于“五四”》）“就文化建设而言，我们唯有在‘执经达变’中清晰自我，在喧嚣中学会安静，在迷津中秉持心烛，在文化自觉中亲和母语。懂得敬畏，才能自信。有信仰才能有尊严。因为，这理那理，返璞归真才是至理；千象万象，揭示本质才是真相。唯有这样才可能澄明寰宇，还原真诚，端正人心。”（《阅微缀琐录》自序）面对这些质朴、硬朗、富有警策力的诗性光泽和理性思考的文字，那种对事物本质的抵达，那里面所包含的灵魂和人格力量，应该使这个时代的许多沉迷于商业化写作的人自感愧怍。形成了他生命的根基，形成了他精神生活的风景，也形成了他对周遭世界的现代文明的批判。

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文学退入社会的边缘成为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人退却了，一部分人仍在坚守，举世滔滔，而为写作而写作者依然站立在洪流之中，坚守着自己认定的高地。振宙先生就是一个坚守者。他遭遇过困惑，遭遇过苦闷，遭遇过误解，遭遇过挫折，但他挺住了，“挺住意味着一切”。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意志，是构筑精神大厦的物质基础。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司马迁惨遭宫刑著就《史记》，屈原饱经潜毁赋出《离骚》，韩非被囚受困遂为《孤愤》，左丘明双目失明乃成《左传》《国语》。“人就是从困境中一步步走来的。因了困境，我们才聪明强健起来，我们的思想和创造才能有今天的灿烂辉煌；因了困境，我们才需要爱呵护爱培植爱滋润爱，我们才懂得了谦虚懂得了取法自然；因了困境，我们才有了力量和信心的厚积而薄发，才有了‘符号’的发明和修订……”

（作者单位：紫阳县文联）

肩挑的岁月

□ 惠军明

小时候吃水困难，全村只有一个自来水笼头供水。村民们接水排起长龙，村路上也多了来来往往挑水的人。一根扁担，两只水桶，不同的步履，挑水的乡党们看不出有多少负重感。

后来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吃水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我家的地势高，村里地下水管安装不太合理，自来水时有时无，吃水依旧有些困难。这样的情况在村北很寻常，无奈我们村北人便要到别家去挑水，挑水的任务主要是爸爸妈妈完成的。爸爸是一名中学教师，在农村是受人敬重的。爸爸好面子，性格有点内向，不喜欢到别家去打水。但每当他见到家里两口大水缸空空如也时，便默默挑起担子走向村头。爸爸虽是教师，但干起农活儿来有板有眼，从不落人之后。据我观察，挑水其实并不轻松。每次接满两桶水后，爸爸就会抬起扁担，用垂下的铁钩分别挂住铁桶，右手抓着扁担前面的铁链，左手勾住扁担后面的铁链，目的是为了防止水洒。然后两腿扎马步，肩膀用力上挺，努力将担子撑起。挑水时，爸爸的头低垂，双眉微锁，步履迅疾但略显沉重。路上他从不休息，一口气将满满两桶水担回家。走到自家厨房，他小心翼翼放下担子，长长吁一口气，一手用力拎起水桶，一手扶住桶

底，水便哗哗流进大水缸。一口大水缸可以容纳六桶水，倒满两口水缸爸爸需要往返六趟。爸爸是个急性子，做事执着认真，每次都要挑满两缸才休息。爸爸的身影进进出出，整个屋院都回荡着水桶的叮叮咣咣……

当爸爸上班不在家时，家里缺水，挑水的重担便落在妈妈身上。妈妈身材瘦小，挑水很是吃力。满满两桶水她根本担不动，每次只接多半桶。妈妈力气小，挑水时不如爸爸步子稳健，走路有些摇晃，水时常洒落出来，看得人很揪心。

我和弟弟长大了一些，渐渐懂得了分担。家里缺水时，我们俩常常去抬水。找了一根结实的木棍，好像是核桃木的吧，我们俩一前一后，合力抬着一桶水慢慢踱步往回走。一桶水的重量大约四五十斤，我们俩小孩即使抬着也很费劲，常常是一步三歇。抬完一桶水笨拙倒进水缸，发现它们依旧很空，于是再次出发……

时光如水，很多年过去了，世界变化迅速，但家里自来水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善。家里缺水时，爸爸妈妈依旧到村头别家去挑水。当我十八九岁，长大成人了后，心想也该锻炼锻炼了，为家人出份力了。闲暇时，我便自告奋勇去尝试挑水。从小见过无数人担过水，那些动作要领早已熟烂于胸，加上

力气变大，觉得自己不成问题。接满两桶水，挂好铁钩，调整好步态，长呼一口气，挺腰抬肩，大喝一声“起”。本以为我会轻松挑起扁担，但悲哀地发现，我竟然挑不起来。再咬牙加把力气，水桶终于离地，但那种沉重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试着走几步，两只水桶晃荡得很厉害，根本不受我的操纵。可能是没有掌握好平衡，可能是挑担子肩膀的位置不对，我步履踉跄，摇摇摆摆，扭东扭西。桶里的水随着摇摆不断溅落在地上，我一路走一路洒，村路上到处是水的痕迹。路上多了几个村民观众，他们指指点点揶揄着我，笑得前仰后合不亦乐乎！我满脸写满窘态，硬着头皮前进，尴尬极了！

好不容易将那担水挑回家，发现水已经洒落了一半。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我才体验到挑水竟然如此艰难！挑水不仅需要足够的力气，也需要恰当的平衡技巧，长期的劳动锻炼，不断地尝试摸索，才能将二者巧妙融合。后来我又经过多次尝试，挑水虽然进步了一点，但依旧不尽人意。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我来说却是如此之难！

爸爸妈妈数十年如一日，长年累月肩挑重担，为家庭默默付出，确实不容易啊！他们肩挑的岁月，定格在时光里，温暖了我的记忆！爸爸妈妈，你们二老辛苦了！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征 稿 启 事

为凝聚各方智慧，促进安康文化资源与硒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融合，助力安康富硒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升安康富硒品牌软实力，《安康文化》开办了“富硒文化”专栏，现向社会各界诚意征稿，欢迎踊跃参与。

一、征稿内容：需围绕与安康富硒文化有关的各类信息展开记述。内容可包括硒资源的科普、富硒资源的利用、富硒文化的探究等，也可突出展示与安康富硒茶、富硒魔芋、富硒药材等特色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地域文化资料(记事或记人均可)。

二、征稿体裁：论文、故事、小说、散文、体会等均可。

三、稿件要求：

1. 来稿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2. 来稿文图资料均须真实可靠，观点新颖，数据准确，文字精炼，文风得体。
3. 文稿内容包括：文章题目、作者姓名、正文、作者单位、联系地址和电话。论证和考证性文章还应附注参考文献。文内引用应注明资料来源，包括：作者、论著名称、出版社或刊名(或什么年代的古刻本)、出版或发表时间、页码等。配图应注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关键要素。

4. 来稿文责自负，不得抄袭。

5. 本刊一般只接收电子稿，请以U盘或E-mail的形式送达。不退原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6. 本刊属赠阅刊物，无稿酬，请谅解。

7. 所投稿件若在国内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请予说明。

本刊地址：陕西省安康市南环路33号安康学院江南校区图书6楼东

电 话：0915-3291018

E-mail：akwh4296@163.com

本刊郑重声明：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摘自《安康文化》××年××期”，并按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依法追究其责任。在本刊登载的文章，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浅谈二轮志书章节分类的精准

——以《岐山县志（1990—2010）》谣谚内容为例

□ 陈平军

中指组2008年9月16日发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十二条对地方志书的篇目设置及分类明确规定：“篇目设置符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基本要求，科学分类与现实社会分工（现行管理体制）、全志整体性与分志相对独立性的关系处理妥当。整体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类目的升格或降格，使用适当。标题简明准确，题文相符，同一门类各级标题不重复。”

但是，编者在具体行文中的理解及做法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总认为只要大致类别不出格，大类的从属关系正确就没有问题，而对属于篇章节里面的从属关系不必作严格要求，这就相当于在一个大笼子里把属于一个笼子里面的东西随意搁置，不管笼子里面的事物的具体隶属关系，表面看起来门类归属正确，实际在具体的章节归属和类别的从属关系方面进行模糊处理，这就造成在章节从属关系上处理不当。

比如，笔者手中的《岐山县志（1990—2010）》里面的第二十八编社会，该编分人民生活、民族宗教、风俗民情、社会美德、谣谚五章进行叙述，接下来是二十九编方言，分语音、语法特点、词汇进行叙述，我认为在这里将谣谚放在社会编里面就不妥。理由如下：

民谣、谚语、歇后语及儿歌等，多以方言形式出现，具有浓郁的方言特色，既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广泛流传的通俗语言，又是社会环境、民间意识的反映。民谣是由原始的民歌发展而来的一种大众之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别于上层社会主流文化的“潜流文化”，成为中下层群众的专用文体，反映了普通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呼声，是人们对当时社会和政治某些事务或现象喜怒哀乐的高度概括，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民谣则是人民总结生产、生活经验和前代教训的结果，具有较强的劝诫性。收载谣谚能够从特殊的角度体现志书的时代性和地方性。

民谣具有集体口头创作的特征，属于方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形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形式完备的民歌体；一类则短小精悍，一般以两句为基本格式，也有是数句且句式参差不齐的。现代民谣具有更自由的表现方式，“顺口溜”作为代替民谣的一个更广义的称谓，已逐步为一般人所接受。一些民谣形象地反映地方风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社会现象如万花筒般五彩缤纷，民间相应产生和流传有大量的顺口溜，部分曾被各报章杂志引述。不少民谣具有俏皮、夸张、幽默的语言，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万象，对不良现象产生了讽刺针砭的效用。志书载入这类民谣，增强了可读性及存史价值。志书要注意征集具有时代特质的民谣。收录民谣要注意保持其民间创作的原生态真实性，不应任意加工，甚至率意创作。同时，要注意甄别，对一些不健康的顺口溜尤其是带有猥亵、迷信色彩以及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顺口溜，应坚决删除。对于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顺口溜，应作简明扼要的注释，以明确其反映的是什么背景下的问题。

谚语是熟语的一种，是方言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内容大多反映人生哲理和生活、生产经验。谚语的内容十分丰富，可

称为民间格言或处世秘诀。志书记载谚语应将其适当分类，分类繁简可视收录的谚语内容及数量而定。

收录谣谚，可酌收一些本地通行的条目，但要突出地方特色，不能凑数。在记载上要求真，讲求原汁原味，遇到不会写的方言词语，宜慎重对待，可以记音，也可以方言同音字加注。采集者不宜随便进行修改，避免失真。对于民间流传广泛的儿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特色、鲜明的方言特色的，也应注意收入志书。不少新编志书在方言部分收入歇后语。征集歇后语入志，要求必须具有本地特色，尤其是有浓厚的方言色彩。

毋庸置疑，虽然谣谚也属于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的根本属性还是属于方言，在方言编里面叙述，更为妥当。所以作为志书编修者不是只掌握了大部类的归类以及从属关系就能做到类为一志，还要在章节所包含的内容上进行详细认真的分析，在具体章节的从属关系的处理上也要做到精确到位不出格，才能让读者在使用志书的过程中觉得志书严谨。只有做到从部类到章节归属都精当了，编修出来的志书才能给人以思路清晰，从属关系科学的感觉，也才可能成为精品佳志。

（作者单位：紫阳县档案史志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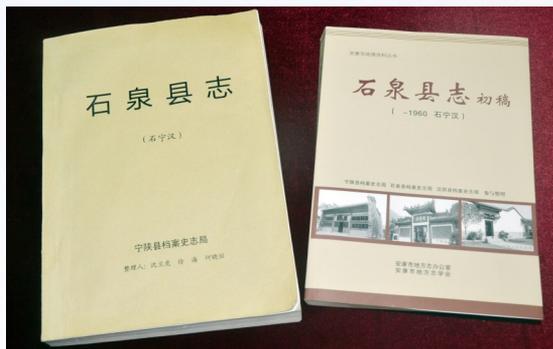
直笔著史续文脉 修志问道启未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安康市地方志成果综述

地方志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世代传承。

一、建国初期对编修新方志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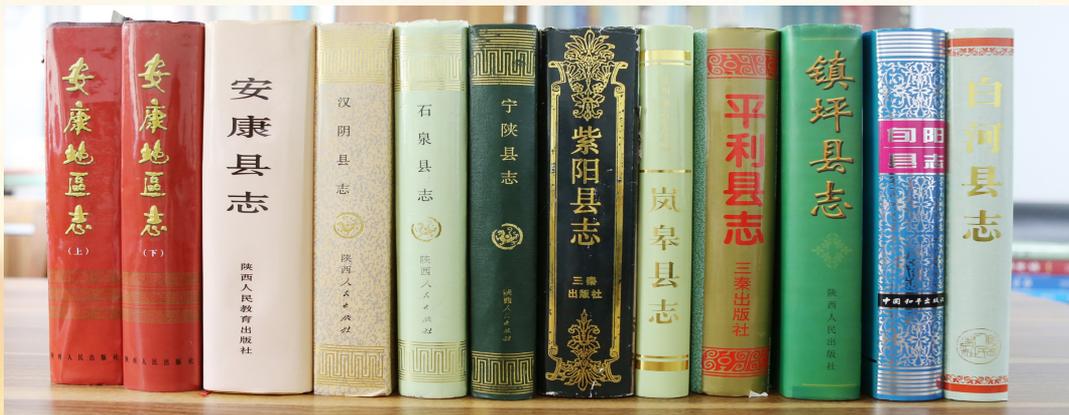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编纂新方志工作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倡导下开展起来。安康地区部分县也对编修新地方志做出了尝试。1959年，旬阳县纂成《洵阳县志续编》（初稿）；1960年，石泉县编修了《石泉县志（—1960）初稿》（手写稿），保存了特定年代的部分珍贵资料。



二、在改革开放中收获地方志工作突破性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地方志工作迈入新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安康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响应全国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即第一轮修志工作）要求，相继成立了地区、县级地方志机构，全市地方志工作在机构编制、志鉴业务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地方志工作相关规定逐步颁布实施，安康地方志工作迎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全面发展期。安康首批社会主义新方志问世，安康地区、安康县、汉阴县、石泉县综合年鉴创刊。截至2006年，全市地方志系统完成了《安康地区志》及县志11部，各类年鉴60余卷，累计出版各行业专业志书117部；各类地情书籍120余种。



《安康地区志》及第一轮10部县志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部分第一轮部门志、专业志

安康第一轮修志（规划内）成果及获奖情况表

类别	志鉴全称	编纂单位	主编	志书出版时间/年鉴创刊时间	获奖情况
志书类	《安康地区志》	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牟广钧	2004.12	
	《安康县志》	安康市(县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高家骅	1989.11	全国新编地方志 优秀成果二等奖
	《汉阴县志》	汉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丁荣德 姚开芳	1991.12	全国新编地方志 优秀成果二等奖
	《石泉县志》	石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李佩今	1991.12	全国新编地方志 优秀成果三等奖
	《宁陕县志》	宁陕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张光明	1992.10	
	《紫阳县志》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樊光春	1989.10	陕西省新编地方志 优秀成果三等奖
	《岚皋县志》	岚皋县志编纂委员会	郑功荣	1992.07	陕西省新编地方志 优秀成果二等奖
	《平利县志》	平利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陈维满	1995.06	陕西省新编地方志 优秀成果二等奖
	《镇坪县志》	镇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彭兴礼	2004.07	
	《旬阳县志》	旬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张 沛	1996.12	
	《白河县志》	白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艾文仲	1996.07	



三、在法治化进程中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市地方志办公室深入贯彻落实《条例》精神，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第二轮修志工作。



《安康市志》（1991—2010）编修工作动员大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工作，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多次对抓好地方志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并将地方志业务扩展为“志、鉴、网、馆、库、刊、会、研、用、史”十业并举。2016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陕西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纪念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十周年、《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发布一周年座谈会



安康市“中国梦·家乡美”地方志业务知识技能竞赛

年)》(以下简称《发展规划》)对进一步落实《规划纲要》提出了明确要求。面对新要求和新的挑战,市地方志办公室坚持“志鉴为本、开发为要、服务为基、创新为魂”的工作理念,加大依法治志宣传力度,不断改进修志编鉴工作方法,奋力冲刺“两全”目标,坚持修志为用,大胆探索创新,努力搭建为安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新平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方志信息化等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

(一) 依法推进第二轮志书编纂工作

1、市志编修工作稳步推进。2011年10月21日,《安康市志》(1991—2010)编修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全面启动了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经过多次催稿、重新查档和对各部门、各单位报送志稿的反复审改,2018年,完成市志总纂任务。



2、县区志编纂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2015年,《旬阳县志(1989—2009)》成为陕南首部正式出版的二轮县志。截至2019年6月,石泉、紫阳、岚皋县第二轮县志均已出版,《汉阴县志》《宁陕县志》《汉滨区志》《平利县志》通过终审,《镇坪县志》报终审,《白河县志》完成初审。



编纂出版的二轮县志，县区年鉴



《石泉县志》复审会



《岚皋县志》复审座谈会



《紫阳县志》复审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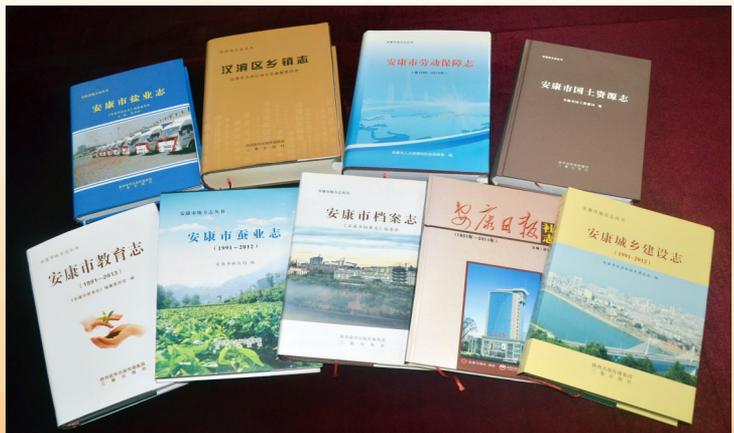


《汉滨区志》修改座谈会



《白河县志》修改座谈会

3、专业志、部门志编修势头良好。进入二轮修志工作时期，安康市县区专业志、部门志编修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6月，已出版的有安康市《城乡建设志》《国土资源志》《教育志》《卫生志》《公安志》《司法行政志》《工商管理志》等12部及各县区专业志10余部。其中《汉滨区乡镇志》为全省首部综合类乡镇志，《云雾山志》为陕南第一部山志，《安康蚕业志》《熨斗镇志》等特色专业志均为创新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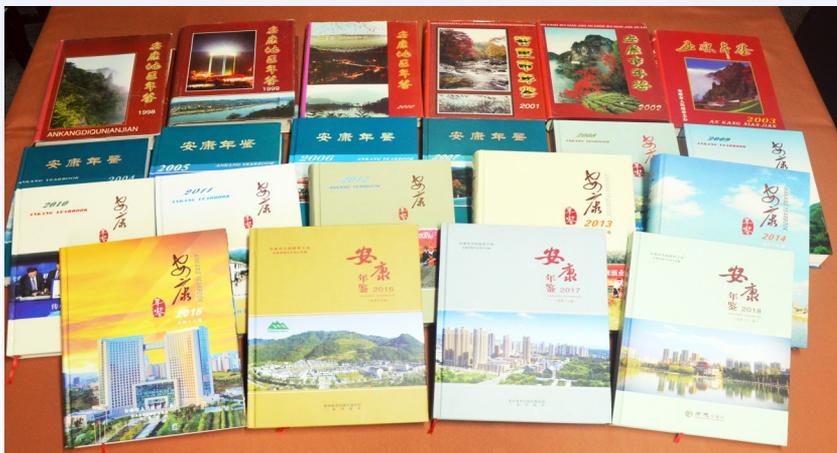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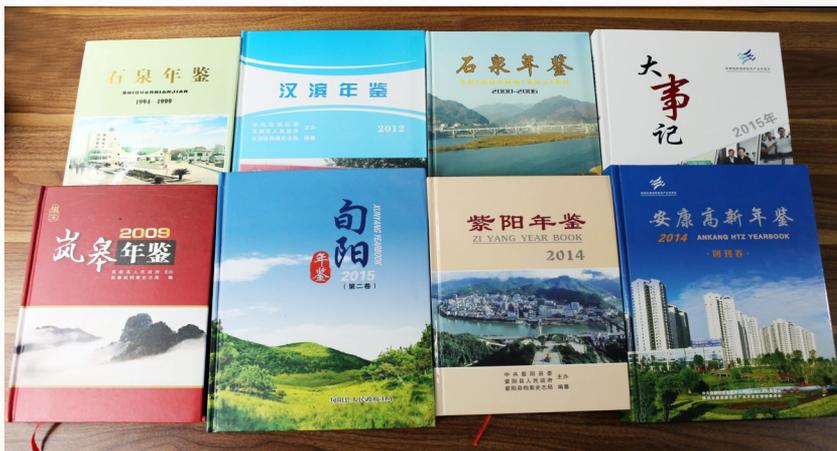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二) 综合年鉴编辑实现全覆盖

《安康年鉴》已连续出版21卷，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全市各项事业年度发展情况。2015年，实现公开出版。2017年，市地方志办公室提请市政府印发《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完成全市县区综合年鉴全覆盖工作的通知》，于当年底实现了县区综合年鉴编辑全覆盖。



《安康年鉴》(1998卷—2018卷)



部分县区年鉴、大事记

(三) 科学开发利用地情信息资源，发挥存史资政功用

1、地情资料研编成果成为资政宝库。2006年至2019年，市地方志办公室充分发挥自身在地情研究方面的优势，在搜集整理地情资料的同时，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地情书刊及专著，积极参加各级各部门的规划方案评审会，为各级各部门提供地情信息，为决策部门提供资政服务。其中包括编辑出版以地域文化研究为重点的品牌文化期刊《安康文化》；地域文化研究相关文章精选《安康文存》；市级史鉴性人物期刊《安康英才》；应对重大洪水泥石流自然灾害的工作专鉴《庚寅之殇——安康市“7·18”抗洪救灾恢复重建工作实鉴》；《安康佛教文化》《安康道教文化》《安康历代名人录》《安康百业史话》《安康老城漫步》《安康民间美术调查》《旅游因文化而精彩》等10余部特色地情专著；《紫阳民歌文化研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或参与编纂出版的部分地情书刊、专著

究》《中国汉调二黄研究》《安康民俗研究》《安康民间文学选辑》《安康方言调查研究》等高水平非遗和民俗研究专著。受市民政局委托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安康卷）的编纂。参与了《寻源——叩问秦山汉水纪行》《文化名人看安康》《安康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铭记7·18》《走汉江》等书籍和影像作品的策划、审稿。从历史文献及地情资料中整理出部分生动故事，举办了两届“坚定文化自信 促进新风貌建设 安康故事调讲会”，选送的4个故事在全省决赛中分别获得二、三等奖，并已在“学习强国”、陕西省干部网络学习平台进行推广。



2018年9月28日，“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陕西故事 促进新风貌建设”安康故事调讲会在安康宾馆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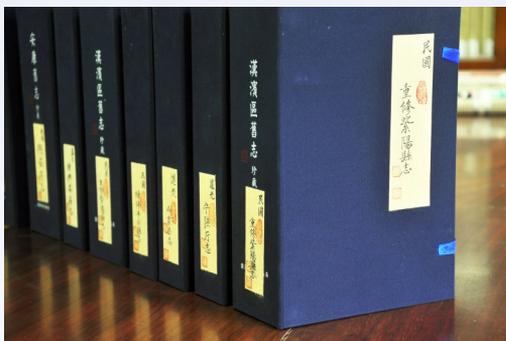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旧志整理工作成绩位于全省前列。2013年，市地方志办公室专门设立旧志整理中心，积极推动全市旧志整理点校工作。已累计收集整理安康市历代旧志书31种200余套(册)，另在安康方志馆中收藏陕南旧志150余种。



安康方志馆旧志整理中心



安康方志馆收藏整理的部分旧志

3、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市地方志办公室已完成历代旧志、一轮省市县志、部分二轮志数字化1000余部，制作光盘2000余张；完成20余部年鉴、《安康文化》、15部地情资料书籍的数字化，收集并数字化老照片及地情资料照片10000余幅，为建设市级数字方志馆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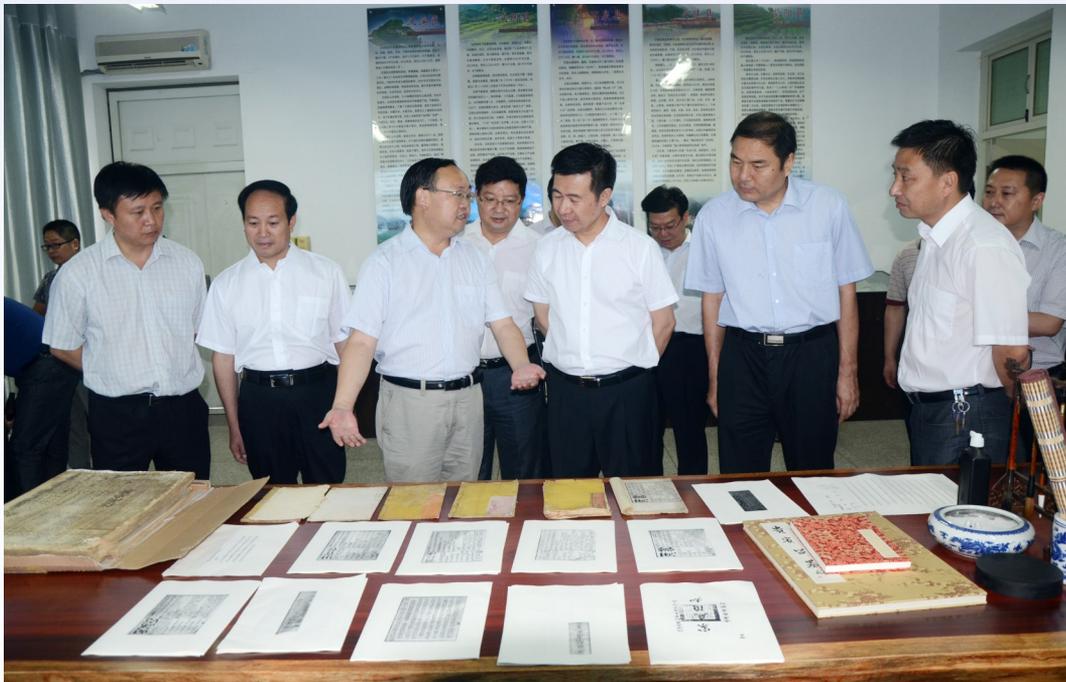
安康方志馆收藏整理珍贵影集，记录了安康40年的发展变迁

(四) 成功创建市情教育新平台——安康方志馆

2013年，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采取“地校合作”创新模式，主动与安康学院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安康学院图书馆、汉滨区档案史志局合作建设成陕西省首家市级方志馆，并在市上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2016年落实了机构编制。2017年，市方志馆完成升级建设。同年，建成全省第一个区级方志馆和第一个县级档案史志馆。10月30日至11月1日，全省地方志馆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安康市召开。安康各级方志馆建设思路和建馆模式得到与会领导和同仁的高度肯定。安康方志馆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表彰为全国方志馆建设先进单位。2018年，安康市在全国方志馆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就安康方志馆建设模式做了



交流。截至2019年，安康方志馆藏展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展出市情教育展板、图表100余幅，馆藏地方志和各类地情文献20000余册。市、县区方志馆累计接待市内外团体60余个，参观阅览2万多人次，在展览展示、资料查询、编纂研究、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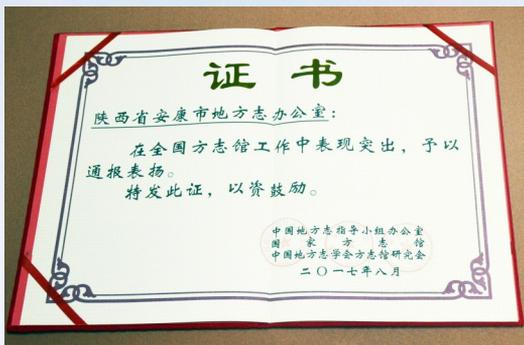
2014年7月4日，市委书记郭青（前排右三）到安康方志馆调研指导



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全省地方志馆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安康召开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017年8月，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被评为“全国地方志馆建设先进工作单位”



安康方志馆开展义务市情宣讲活动



安康方志馆序厅



安康方志馆收藏的旧志和各类地方志书



安康方志馆年鉴馆内展藏的4000余册地情书刊



安康方志馆收藏整理的部分家谱家训



安康方志馆历史名人画像厅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安康方志荣誉录

全国地方志馆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全省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汉滨区档案史志局

石泉县档案史志局

宁陕县档案史志局

紫阳县档案史志局

岚皋县档案史志局

旬阳县档案史志局

陕西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冯佳随 姚舜杰

杨小莉 沈兰虎

张焱 鲁晓敏

陈平军

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蔡晓林

全国地方志馆建设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安康市优秀共产党员

柯昌平

全国地方志馆建设先进工作者

李百富

全国方志馆优秀讲解员
陕西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首届十大修志能手

胡阳

陕西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第二届十大修志能手

薛正华

陕西省第三届十大修志能手

张霞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论断使我们坚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工作在新时代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忠实履行新时代赋予的新的光荣使命，切实践行存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修志理念，全市地方志系统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深化修志机制创新，拓宽读志用志渠道，努力为安康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